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第七屆立委選舉的

多層次分析

Local Political Ecology and Constituency Servic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7th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李映霖

Ying-Lin Lee

指導教授：鄧志松 博士

Advisor: Chih-Sung Teng,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January, 2013

謝辭

黨工子女出身的我，一直以來希望寫篇結合學術與實務經驗的文章，總覺得父親為黨為國辛苦三十餘載，其寶貴的經驗與閱歷應留傳下來，但我本無意從政，無法克紹箕裘，故苦思許久之後，決定寫一些有關選舉研究的文章，俾將所學、所見所聞結合父親的實務經驗，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下來，俾對學術能有所貢獻之餘，亦能對實務有所助益。

興趣廣泛如我，曾念過中文系、政治系國際關係組，迨大四時，才轉投政治理論中有關投票行為研究的懷抱，但其時由於仍放不下對法律的憧憬，以及對統計量化的著迷，因此，我不顧家人意見毅然決然選擇念了國家發展研究所，為的是爭取更多時間，繼續鑽研我感興趣的領域，並期待有朝一日，我能從中理清自己到底想要什麼，真正感興趣並打算一輩子以此為生的志業與領域為何。

其後，我選擇了統計研究，並努力去學習校內外相關課程，也如願擔任統計教學助理兩年，更能學以致用，運用多層次模型進行此篇文章的分析，過程雖然辛苦，但卻甘之如飴。我由衷感謝從碩一開始，便教導我空間計量方法的鄧志松老師，除了讓我開拓了對計量模型的視野，亦教會我如何撰寫一篇好的學術論文。同時我也感謝經濟組的辛炳隆老師，從碩班到博班的計量課程，教授磨礪我的量化能力，亦給了我許多對未來規劃的寶貴意見，辛老師的認真與風範，我會永久銘記在心。

而政研所的洪永泰老師，雖非我的口委，但其不吝於額外花費時間閱讀我的「萬言書」並提出建議與鼓勵，讓我著實感動，洪老師的許多學術看法與主張更與我相契合，與老師聊天往往是我最快樂的時光，其傳奇故事更是我一直深自期許與惕勵的典範。當然，我也感謝我的口委之一的張佑宗老師，感謝他對我論文所提出的寶貴意見，以及對我的認真給予肯定。而另一位口委吳親恩老師，與師

母李鳳玉老師，自大學到研究所一直十分照顧我，給予我不論在學術或是未來規劃的諸多建議，感謝鳳玉老師的啓蒙之恩，我很開心我第一次接觸統計，就有幸遇到她，老師的鼓勵一直是我繼續鑽研統計的動力，而親恩老師不論在我於中研院擔任兼任研究助理時，抑或是後來論文寫作時，其所付出的關心與設身處地的著想，甚至還幫我修改中、英文的題目，更讓我點滴在心，能夠得此良師，夫復何求，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最後，我要再度感謝我父母，其實我一直對他們懷有濃濃的歉意與不捨，由於想要嘗試的領域太多，始終沒一個確定的方向，讓他們一直擔憂於我的未來，對此我深深地感到抱歉，並感謝他們對我無止盡的包容與關愛！我只能說，不論我最後選擇哪一條路，我都會努力前進，雖不太可能會是律師、司法官或一般公職，但必定亦能夠有所作為，以光宗耀祖，不負期許！至於我男友豪駿，我很慶幸能覓得如此良伴，不論在生活或學術層面都能支持著我，並在相互的討論與詰辯中激盪出火花，在所學領域上截短補長，如果沒有他，我想我無法順遂地完成此篇論文，感謝他的無怨陪伴與無由支持，謝謝～～「歸燕橫寄彩雲暮，烏鵲繞樹幾時窮，洛水清波年年有，只因魂夢與君同」。這是我睽違五年後在碩士生涯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詩作，送給你，豪駿！

李映霖 壬辰年歲末 於永和寒舍

摘要

在 2008 年第七屆區域立委改成單一選區制之後，不論實證研究或實務均曾指出，選區規模銳減不但沒有帶來兩黨競爭模式，反而造成國會選舉地方化的現象，選區服務的重要性更甚以往。而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探討，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是否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影響力。故筆者結合個體選民特性與總體選區的環境系絡資料進行「多層次多項勝算對數模型」(The multilevel multinomial logit model)分析，俾釐清改制之後，選區服務作為投票取向之一，其與地方政治生態間的關係為何，以及如果實務上各候選人普遍重視選區服務的話，為何選區服務無法無往不利地凌駕於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之疑問。

研究顯示，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是否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影響力確實不容忽視，蓋選區規模的銳減，的確讓某些原本傳統上認為會促使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投票的環境系絡角色，為之一變。且實務上立委所強調的「里長級服務」，事實上亦僅對經社程度較低的選民具有顯著的吸引力，而當選區政黨競爭程度愈大時，政黨因素與候選人形象的影響性即可勝過選區服務，甚至人際網絡因素更可以透過選區宗教動員的力量，進而凌駕傳統社會中選民偏好以選區服務取向投票的現象。

關鍵字：地方政治生態、投票取向、選區服務、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人際網絡、多層次多項勝算對數模型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	6
第四節 章節安排	7
第二章 文獻回顧	9
第一節 選區服務在立委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	9
第二節 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	15
第三章 研究設計	28
第一節 研究架構	28
第二節 研究資料	41
第三節 變數建構與測量	44
第四節 估計方法	60
第五節 研究限制	66
第六節 研究假設	73
第四章 研究發現	81
第一節 第七屆立委選舉之樣本分布	81
第二節 第七屆立委選舉的變異數分析	85
第三節 第七屆立委選舉投票取向的多層次分析	87
第五章 結論	102
參考文獻	107
附錄、	
附錄 一 依變項原始問項次數分配表	135
附錄 二 依變項選民投票取向分類與原始問項回答對照表	139

附錄 三	樣本選區分布與其實際獲勝政黨	140
附錄 四	問卷題目原始問項	143

圖表目次

圖 3-1	研究架構圖	41
表 3-1	「政治涉入度」的因素分析整理表	50
表 3-2	個體層次自變數整理一覽表	56
表 3-3	總體層次自變數整理一覽表	59
表 3-4	追蹤樣本的樣本代表性檢定	71
表 3-5	研究假設整理表（僅列出主要解釋變項）	79
表 4-1	個體層次自變項資料的敘述統計表	82
表 4-2	總體層次自變項資料的敘述統計表	83
表 4-3	選民投票取向分類的次數分配表	84
表 4-4	收入、教育年數、政治涉入度與投票取向的變異數分析	86
表 4-5	選民投票取向之多項勝算對數分析	89
表 4-6	選民投票取向之零模型分析	90
表 4-7	選民投票取向之多層模型分析（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	9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選舉投票行為研究的領域中，分析選民之所投票支持所選候選人的原因，不僅有助於瞭解選民心中對候選人的想法，更可藉此釐清其與政治人物間的政治連結，瞭解選民與候選人間的互動關係，因此，選民投票取向遂成為極其重要的研究議題。而在第七屆區域立委選舉改成單一選區制後，以實務上來說，因選區應選名額銳減，造成選民對候選人的課責強度愈形增加，¹使得政治人物不論黨派均將基層選區服務，視為是勝選與否的第一要件，而紛紛採行以選區服務為主、中央問政為輔的選戰策略，甚至有候選人發出「首長級的對決，里長級的服務」之慨，²選區服務的重要性更甚以往。如在之前藍大於綠的高雄市第七選區，國民黨籍候選人邱毅雖擁有全國性的高知名度，但卻因疏於地方經營，竟意外輸給前市議員、默默勤跑基層的民進黨籍候選人趙天麟，跌破眾人眼鏡。可見選區服務在選民心中的重要性，似乎凌駕於政黨因素，甚至超過候選人的知名度等形象。

然而，有學理卻指出，基於單一選區制「機械性因素」與選民「心理性因素」

¹ 同意此立論的學者認為，由於單一選區下選區明確，係屬「人物的投票制」（雷競璇，1989:132-133），候選人與選民之間較容易產生直接性連結，降低政治課責度的成本，而候選人亦會為了極大化選票，積極爭取該選區利益與重視選民服務，避免標榜特殊意識形態及訴求，故實乃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關於這方面的探討可參閱 Downs(1957:115-117)、Enelow & Hinich(1984:8-13)、Ordeshook(1986: 160-175)、Norris(1997:308)、雷競璇（1989:132-133）、王業立（2004）等的研究。

² 如許多新聞報導指出，在單一選區制下，中央民代的選舉已演為「首長級的對決，里長級的服務」，形成所謂選舉的「地方化」現象。如立委高思博將上屆「七分中央，三分地方」的選舉策略，轉變成「八分地方，二分中央」，另外如李文忠、李昆澤、翁重鈞、趙永清等人亦不分黨派的強調在新選制下，地方「選區經營」的重要性已超越中央「問政形象」，李文忠甚至指出：「單一選區造成『中央民代地方化』現象，選民對大建設不在乎，反而更關心立委有沒有處理隔壁違建或門口違規停車的瑣事，如此整天跑攤會讓立委無心『國政』，對台灣民主將很不利。」（林新輝，2007）。

的趨使下，³應會造成兩黨制的形成（Duverger, 1966），⁴無形中會增強政黨的重要性；且細部來看實際選舉結果的話，亦可發現選區服務並非在每一個選區皆能無往不利地發揮效果，尤其在某些選區，選區服務與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之間的關係即顯得撲朔迷離。

以候選人形象為例，所謂「刺客效應」替一向習慣倚賴人際網絡動員與選區服務得票的國民黨，在第八屆立委選舉中打出不錯戰績，如在作為長期民進黨執政的臺南市，即有國民黨候選人蘇俊賓以其良好形象挑戰民進黨籍的前臺南市長許添財，雖功敗垂成，但卻為國民黨在臺南的選情展露曙光，甚至，國民黨臺中市立委候選人江啓臣更「突圍」民進黨地方老將成功，顯示候選人形象似乎也在選民心中佔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甚至有時在選情愈艱困時更可以凌駕於對手的選區經營成效，發揮意想不到的功效。

而以人際網絡來說，如在另一個身為民進黨鐵票倉的農業縣市——臺南縣，即尚有國民黨籍候選人李全教仍然憑藉人際網絡的動員，拿下高於總統候選人馬

³ 「機械性因素」（mechanical factor）其指涉的是相對多數決制本身會導致代表性失衡的問題，通常第一大黨會產生「過度代表」（over-representation）情事，佔有「席次紅利」（seat bonus），即席位率高於得票率，其餘漸次遞減，第三黨代表性不足尤為嚴重，稱為「低度代表」

（under-representation）（Duverger, 1966: 224-226）。而「心理性因素」又有學者將其稱為「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複雜投票」（sophisticated voting）或是俗稱「棄保效應」，意指當選制本身的「機械性因素」（mechanical factor）被選民所認知時，尤其是那些原本支持第三黨候選人的選民，因不願其選票被浪費，故會傾向將選票轉授予原本不支持的兩大黨中較不厭惡的一方，以防止其最厭惡者當選，此即是所謂的「心理性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Duverger, 1966: 224-226）。（Spafford, 1972: 129-134; Riker, 1986: 34-35; Cox, 1997: 69-98; Karp et al., 2002; 謝復生, 1992: 18; 黃秀端, 2002; 王鼎銘, 2003; 王業立, 2006）。

⁴ 此法則提出後引起不少學者的爭論與修正，如 Douglas Rae(1971)認為相對多數決制雖非導致兩黨制的充要條件，但除非有地區性強大少數黨存在，否則相對多數決制是與兩黨制密切相關的。Riker(1982)則主張單一選區是形成與維繫兩黨制的充分條件，除非全國性小黨（或第三黨）在地方選曲上是兩大黨之一，如加拿大，或是任何一政黨在選舉中係處於康多賽贏家(Condorcet winner)的地位，如印度。而 Sartori(1986)則更進一步指出，除非選民高度的意識形態化，以及政黨體系高度結構化，單一選區才具有「引導」兩黨制的作用，否則僅可以「維持」但無法「產生」兩黨制。故實應將所謂「杜弗傑法則」視作種「傾向法則(tendency law)」或是「杜弗傑假說」(Duverger's hypothesis)，而非亙古不變的定律(law)。另外，Downs(1957: 124)也認為相對多數決制下由於「勝者全拿」(winner take all)，會傾向縮小至兩黨競爭局面。而 Duverger(1986)本人亦基本上同意上述這些看法。

英九得票率的例子，讓其競選對手——曾經執政八年並多次獲選全臺施政冠軍的老縣長陳唐山，著實捏了把冷汗。顯示雖同樣是選情艱困，但在農業縣市中，人際網絡動員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似乎較候選人形象更能與選區服務表現相抗衡，雖仍不足以撼動選區服務在選民心中的關鍵地位，但人際網絡與選區服務間的關係卻值得吾人進一步探究。

由上可知，立委選舉改成單一選區制後，選民對候選人選區服務表現似乎愈趨看重，但在不同地方政治生態的選區中，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和人際網絡等因素，似乎仍然對選民投票行為扮演一定程度的影響，不至於全如政治人物所想般，光以「里長級服務」即可擄獲選民支持進而勝選，但也不似學理所言，已邁入政黨競爭的單純趨勢。然而現有文獻卻主要聚焦於改制後政黨因素在選舉中的作用，而忽略實務上選區服務在不同選區環境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不同類型的選民對選區服務相較其他如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人際網絡等投票取向間的偏好態度。

因此，本文研究動機在於，如果在實務上，即便各候選人均普遍視選區服務為勝選的關鍵因素，但選區服務仍舊無法對所有選區的選民投票抉擇扮演指導性角色，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決定選區服務在選民心中的地位，進而影響投票抉擇？而選區服務相對其他投票取向來說，究竟是對哪些選民才會產生優勢性的影響作用，又對哪些特性的選民不具吸引力，因而使其偏好其他特定的投票取向？其在不同的政黨競爭程度、產業結構等地方政治生態下，所作出的考量行為是否又會相同？如果不同，那環境系絡對其影響力又是為何？是直接、間接，又或是兩者兼具？凡此種種，均值得吾人進一步地探討與釐清。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地方政治生態，係源自於政治生態學（ecology of politics），⁵指的是地方政治中，互動共生的行為個體和群體，與地方政治、經社文化等環境之間的動態互動體系（趙永茂，1998：307）。誠如 Lazarsfeld 等人（1948, 27）所言，「一個人的政治思維乃是取決於其所屬的社會環境」，故選民之所選擇支持該候選人背後的思維考量，遂多少會受到其在特定地方政治生態中所處的位置、所接觸到的對象和訊息等的影響。而在第七屆立委選舉改制之後，原本複數選區制下的「離心誘因」（centrifugal incentive）被所謂相對多數決制（plurality system）下的「向心誘因」（centripetal incentive）所取代（Cox, 1990），選民愈容易將注意力與選票集中在兩大候選人身上（王業立，2001：13-26），⁶使得政黨的重要性在一對一對決的選舉中無形中被增強，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似乎也因政治全國化（political nationalization）⁷的來到而逐漸降低。

然而卻有實證研究指出，改制所帶來的選區規模降低，亦使得選民聚焦在兩大候選人的同時，對立委的課責強度愈趨增強，且因立委有較明確與小範圍的地理區域，而使其有更強的動機耕耘選區、建立個人票源（黃秀端，1994），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反而有「地方化」的趨勢，不僅選民對選區服務益發重視，連帶立委亦比複數選區更傾向強化選區經營（盛杏媛，2008）。如張佑宗、周宛蓉（2009）即發現第七屆立委選舉的單一選區制，雖限縮台灣的政黨數目，形成兩黨政治局勢，但在國、民兩黨的平均得票率變異上，全國差異則日漸縮小，地方差異卻逐

⁵ 依法國社會心理學家西蒙尼特（D. Simomnet）認為，是種特別強調大環境和個人、集體的關係，以及社會互換的集體活動現象（Simomnet，方勝雄譯，1989，轉引自趙永茂，1998：307-308）。

⁶ 亦即候選人為極大化自身選票，會調整其立場往光譜中間移動，減少極端立場的提出，且選民基於棄保效應亦容易將選票集中於主要兩大候選人（通常為兩大黨候選人）身上（王業立，2001：13-26）。

⁷ 有關「政治的全國化（political nationalization）」或稱為「政治全國一致化」，係 Schattschneider(1960: 78-96)、Stokes(1965)、Sunquist(1973)等於 1960、1970 年代所提出，係指不論是政黨體系、政黨組織或是競選策略活動（包括選舉議題）乃至於選民政黨傾向，皆有逐步邁向整合一致化的趨勢，其操作型定義如下：第一、代表政黨在全國可獲得跨越地理區的選民聚合一致性之支持。第二、各不同地理區之間，對於同一股政治力量的作用力，呈現出極為類似或是一致性的反應（Claggett, Flanigan, and Zingale, 1984, 80；蔡佳泓，2008：198-222）。

⁸ 同註釋 1。


漸擴大，政黨或候選人非但無法提出全國性議題、政策予選民做抉擇，候選人反而愈趨轉向個人選區的鞏固與經營，顯示「政治的全國化」並未因選制變遷而到來，國會選舉反而產生「地方化」的趨勢。可見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非但未因單一選區制的採行而減弱，連帶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更加有探究的實益，選區服務與地方政治生態間的關係亦值得吾等進一步地分析。

然而弔詭的是，不論過去或是現行有關立委選舉的學術研究，卻甚少注意到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更遑論將焦點置於選民之所偏好選區服務而非其他特定投票取向的背後形塑成因，這亦是為何國內外對於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類型始終無一致定論，或謂經社程度與政治涉入度愈高者，或謂經社程度與政治涉入度愈低以及居住在農村地區者愈容易以選區服務作為抉擇候選人主因。蓋特定選民主動與立委接觸、表達自身意見，並不意謂其必定會以此作為投票取向，其可能會在與其他立委候選人比較之後，選擇以候選人的形象或是政黨因素作為投票考量。因此，倘若忽略其他投票取向的相對影響力，將可能對偏好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類型，歸結出彼此不一致的結論。

舉個例子來說，國內徐火炎（2005）曾以認知動員的概念指出，國內政治涉入度較高的選民仍對不同政治立場（尤其是統獨）的政黨，具有強烈的認同傾向。故此時即便其較常與候選人接觸、反映自身意見，但實際投票時，卻可能仍以政黨因素作主要考量。尤其在立委採行單一選區制之後，在選民將焦點集中在主要的兩大候選人身上時，選民會愈審慎地選擇自己最重視的人選條件，此時，研究什麼類型的選民會以此取向投票相較其他因素，則格外有意義。再加上改制之後，實務上各候選人普遍愈趨重視選區服務，亦有實證研究指出國會選舉地方化已然來臨，遂使得深入瞭解究竟什麼樣的選民在哪種環境系絡下，會如候選人所想般以選區服務為投票取向，又是何種選民在哪些情境下認為候選人形象仍較選區服務重要、甚至僅基於棄保心理而以政黨因素投票等等，即顯得相當重要，著實有

進一步探究的必要性。

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係透過對第七屆區域立委選舉的研究，瞭解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候選人在實務上普遍重視選區服務，那哪些類型的選民會如候選人所想般，基於選區服務而投票？哪些類型的選民不會？又是什麼投票取向能凌駕於選區服務？以及選民之所以如此考量，背後又究係受到不同環境系絡因素（如農村地區）的何種影響，包括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效果。此不僅在理論層次上，有助於進一步瞭解區域立委選舉中，不同選民類型對選區服務的重視態度，更可釐清此種態度取向在不同地方政治生態中的變化模式，捕捉不同系絡群體間的因素異質性（casual heterogeneity），以彌補過去相關研究文獻的不足；且在實務層次上，亦可進一步釐清為何候選人重視的「里長級」選區服務，其成效無法普遍呈現在各個選區的選舉結果上，反而有時會輸給對手所強調的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動員。



第三節 研究範圍

今針對本文在分析標的與時空範圍上的界限說明如下：

（一）就分析標的上

由於本文研究動機係從實務角度出發，探求不同地方政治生態對不同類型選民之所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其他取向投票的影響模式，故有別於傳統針對候選人勝選因素的綜合評估或是僅從立委角度針對選區服務對其當選或連任影響作探討。因此，本文係以選民對候選人投票取向為分析標的，並以選區服務作為其中比較的參照組，至於其他有關選區服務對立委勝選或連任的影響，以及選民的「投票意願或動機」（即選民為何前往投票）、選民最後「投票抉擇」的方向（即選民

具體所投對象)等,因均非本文關心範圍,遂不進行討論。

(二) 就時間與空間範圍上

由於本文係以「選民投票予所選立委候選人主因」為依變項,而該問項僅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選後面訪(簡稱 TEDS2008L)的追蹤樣本涉及,而 2012 年問卷亦然,故筆者考量研究所需,遂僅以 2008 年第七屆 TEDS2008L 的追蹤樣本作為觀察對象,而不另行擴及 2012 年第八屆立委選舉,探討第七屆到第八屆立委選舉的長時間變化趨勢,此係為時間上的範圍。

而在空間範圍上,原本本文使用的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選後面訪(簡稱 TEDS2008L)的追蹤樣本資料所涵蓋的選區共計 47 個,但由於本研究使用的多層次分析涉及跨層次效果,故樣本結構較為複雜,實有重新調整之必要,⁹而為同時兼顧檢定力與估計法,並考量到本文以總體系絡效果與其和個體選民特性的交互作用效果為探討核心,故將著重第二層組間樣本數,並將組內樣本數設定至少 20 筆以上的門檻(即每個選區至少抽 20 人),而將組數調整至 33 組(即總體層次共抽 33 個選區)。因此就空間範圍來說,本文實際上係以 1195 筆總樣本,合計 33 個選區作空間上的觀察範圍,並試圖推論至全台灣 73 個選區,¹⁰特此合先敘明。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本文之所以研究此主題的動機(第一節)與研究目的(第二節),以及研究範圍(第三節)和本文章節安排(第四節)等。

⁹ 詳細調整情形請參後文第三章第二節有關研究資料中的「資料樣本結構的調整」部分。

¹⁰ 故並不包含平地與山地原住民的複數選區。

第二章：文獻回顧。第一節係先針對既有文獻有關選區服務對立委選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以及其他重要投票取向的簡單回顧，俾對選區服務作為選民投票取向之一，其在立委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清楚認識；再進一步介紹過去文獻曾指出哪些因素會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包括選民自身特性與外在環境系絡因素，俾對本文主題有初步完整的瞭解。

第三章：研究設計。闡明本文研究架構（第一節），並針對資料來源及其樣本結構作說明（第二節），再針對所涉及變項進行建構與測量（第三節），並介紹所使用的估計方法（第四節），最後再論及研究限制（第五節）與研究假設（第六節）。

第四章：研究發現。透過蒐集來的資料先進行基本的樣本分布介紹（第一節），再透過變異數分析初步探討選民特性與其投票取向間的關係（第二節），最後再以多層次模型進行嚴謹的因果檢證，並依分析結果檢視本文的研究假設（第三節）。

第五章：結論。總結全文重點並作相關檢討。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由於本文的研究目的係探討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相較其他投票取向重視與否的背後成因，以及哪些投票取向能凌駕選區服務。但由於過往研究不常注意到究係是何因素影響到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其他特定取向投票，甚至對偏好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類型莫衷一是。故在文獻回顧上，本文遂先針對既有文獻有關選區服務對立委選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以及其他重要投票取向的簡單回顧，俾對選區服務作為選民投票取向之一，其在立委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清楚認識；其次再介紹過去文獻曾指出哪些因素會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包括選民自身特性與外在環境系絡因素，俾對本文主題有初步完整的瞭解。

第一節 選區服務在立委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選區服務的內涵與其重要性

選區服務（constituency service）顧名思義係指民意代表對選區之個人、團體乃至於地方政府所作的幫助，又約可分為兩部分，一則是「個案服務」（case work），係指協助個人代為向行政機關處理問題；另一則是「計畫協助」（project assistance），指的是幫助選區向聯邦政府爭取各種經費補助或是公共政策（Fenno, 1978:101）。而黃秀端（1994）則認為「選區服務」實際上可指涉民意代表為選區選民所作的任何工作，即所謂「選區經營」，¹¹故不一定侷限於上述所謂的「個案

¹¹ 故依照黃秀端（1994）的定義，「選區服務」實際上即係「選區經營」，蓋其均指涉民意代表為選區選民所作的任何事情（高世垣，2001）。

服務」與「計畫協助」，¹²如參加婚喪喜慶、人事請託關說、冤屈平反等皆是。許志鴻（1986）則是進一步將選區服務定義為「凡是在連任動機的驅策下，民意代表為滿足選區選民的需求，而採取可能為選民爭取到實質利益的回應行為」。

而選區服務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係源於經社環境的變化以及行政權的擴展，使得選民對議員的服務需求愈趨加深與看重，國會議員為了極大化選票，遂紛紛調整其角色定位，改以選區服務為主，而非早期著重的立法問政（Parker, 1986:58-114; Cain, Ferejohn and Fiorina, 1987: 98-117）。如 Fiorina（1977）的研究顯示，自 1960 年代起，選區服務使得候選人「邊際選區」（marginal constituency）的比例逐漸降低，蓋其可讓民意代表增加 3%到 5%的選票；Parker（1986）的研究亦顯示，選區服務係選民常提及喜歡該選區候選人的主因，且選區的競爭對手亦很少以其選區服務作為攻擊的標的；而 Arnold（1990）亦發現，由於立法問政須採取一定的政策立場，故在討好部分選民的同時，亦容易得罪另一部分選民，其所爭取來得選票支持反不如選區服務來得多且穩固，故議員往往較著重選區服務表現。國內學者亦對此得出同樣的結論，蓋選區服務是奠基於選民與候選人「直接的連結」（direct link），係種一對一的親密關係（盛杏媛，1999），故對選民產生的效益感受最大，亦容易使其對候選人自身產生依賴感，建立特定票源。故不論在複數選區亦或單一選區中，選區服務一直是候選人或選民關心的焦點。

如在過去複數選區中，黃秀端（1994）曾指出，由於候選人僅須獲得相當低比例的選票即可當選，故其有極強動機去表現自我，遂傾向以選區服務作為鞏固自我票源的手段；而愈小規模的選區相較於中型或大型規模選區來說，選民對其會有更強烈的企盼，甚會企圖透過影響親友投票或是連署罷免等方式作為獎懲區域立委選區服務良莠的手段（羅清俊，2008）。甚至在單一選區制下，正由於應

¹² 黃秀端（2004）亦依照 Eulau 和 Karps（1978）對「代表」內涵的回應分類，將諸如個案服務、婚喪喜慶等視為是「服務回應」，計畫協助等爭取地方利益者視為「分配回應」，至於其他如提供政府各種小冊子或文件給選民、寄節慶賀卡、贈送小禮物等則視為較傾向於「象徵回應」。

選名額銳減，選民對候選人的課責性因此集中且強化，故單一選區的制度特性雖有利於兩黨政治的形成，透過兩大黨間的相互競爭，形成看似政黨取向的「課責政治」。但事實上，由於選區服務可透過候選人平日的選區耕耘營造出「直接聯繫關係」，其主體係屬候選人，而非其所屬政黨，故不僅容易使得選民對於候選人之情感認同大於所屬政黨，更是其能否順利當選的保證（村松岐夫、伊勝光利與中豐著，吳明上譯，2005；黃信達、王建雄，2010）。即有學者發現美國在單一選區制施行後，在以連任為前提之下，不論初選還是正式的大選，選民益發重視對候選人的選區經營甚於國會問政，且候選人亦有漸趨強化選區經營的傾向（Mayhew, 1974a），而有所謂肉桶立法（pork-barrel legislature）¹³的現象；甚至有研究指出，那些接受過選民服務或是預期該候選人得以對自己有幫助的選民，愈發傾向將選票投給該候選人，且此投票回饋不受政黨認同的影響（Cain, Ferejohn and Fiorina, 1987）。曹瑞泰（2005）在對日本選制研究中亦指出，即便是在單一選區制下，候選人仍係有培養個人選票的誘因，且勝出的候選人多半是擁有強力後援會，選區服務亦是當選的重要因素。

由上可知，以立委選舉來說，單一選區制下選民對選區服務的重視程度顯然比複數選區來得大，但尚有不少研究認為選區服務仍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投票取向，除了選區服務之外，仍有其他重要因素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抉擇，以下即對此進行相關文獻介紹。

（二）選區服務與其他投票取向間的關係

有研究指出，即便在單一選區制下，候選人會更重視選區服務，但這並不表示政黨力量正在式微，原因在於誠如前文所言，選舉制度的改變，使得原本複數選區制下的「離心誘因」（centrifugal incentive）被所謂相對多數決制下的「向心誘

¹³ 其係指立法委員間彼此為藉由爭取選區利益進而博得選民好感，而紛紛以互惠式的同意，達到最後同蒙其利的肉桶分肥現象。

因」(centripetal incentive)所取代(Cox, 1990),選民愈容易將注意力與選票集中在兩大候選人甚至是兩大黨身上(王業立,2001:13-26)。再加上各政黨亦僅會在選區中提名一位候選人,將無形中強化政黨對決的競爭氛圍,使得選民基於「心理性因素」的趨使下,更容易將選票集中在兩大黨提名人選身上(Duverger, 1966),因而增加政黨因素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不僅除了政黨認同之外、選民基於對特定政黨不認同¹⁴而來的策略性投票,或是對政黨議題的關注等,均會使其更傾向以政黨因素作為投票抉擇的主因。如吳親恩、李鳳玉(2012)即透過對第七屆立委選舉研究指出,因黨投票(party vote)仍是目前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最關鍵要素,其重要性更甚過基於候選人選區服務、形象等因人投票(personal vote)¹⁵,其中,因黨投票中又以政黨認同最為重要。

此外,另有文獻認為,選區服務的重要性會受到選區都市化程度的高低以及是否爭取到地方派系支持的影響(蔡佳泓,1996;陳昭凱,1997),因此選區服務的影響力係相當有限。當選區都市化程度愈低時,則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動員固然重要,然而當都市化程度愈高時,候選人形象(candidate image)¹⁶即變得相當重要(無論有無地方派系支持)(陳昭凱,1997);且胡佛、陳德禹等人(2001)

¹⁴ 所謂「特定政黨不認同」係指選民對某一個特定政黨長時間持續且不輕易改變的厭惡感,且此種厭惡感並非一時政治表現所致,而是長時間的歷史情境所形塑(莊淑媚、洪永泰,2011)。其係相對於「政黨認同」而來,只是政黨認同強調的是選民對特定政黨的「歸屬感」,而特定政黨認同則強調的是「厭惡感」,兩者均屬於選民對政黨情感認同的表現。如Crewe(1976)透過對英國的研究發現,有部分選民是「討厭敵對政黨程度遠高於對自己政黨的喜愛」的「負面型選民」(negative voters),Rose和Mishler(1998)則將此種「選民無論如何絕對不會投給此政黨」的情形稱之為「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至於形塑成因則大多認為與一國的歷史情境有關,如長期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但理由或有不同,有學者認為在後共產國家中,由於選民的政治信任感低,並不信任政黨或是政府機構,故傾向於在調查中僅表達出自己絕對不會支持的政黨,而非正面表達對某一政黨的認同(Rose and Mishler, 1998);有學者則認為其係出於民眾累積自過去長時間對一黨專政下該政黨施政的種種不滿而來的反感情緒(Estrada, 2004)。

¹⁵ 所謂因人投票(personal vote)即係指選民的投票支持係基於候選人個人形象特質、出席活動、國會投票紀錄與選區服務等任何有關候選人評價的因素(吳親恩、李鳳玉,2012)。

¹⁶ 候選人形象係指候選人魅力與魄力、正直、清廉、誠信、親和力、問政能力以及包括外表、風格和學經歷等個人背景因素(Miller, Wattenberg, and Malanchuk, 1986;黃秀端,2005;吳親恩、李鳳玉,2012)。

亦透過對第四屆立委選舉研究發現，教育程度愈高¹⁷以及年齡愈低的選民，愈傾向以候選人個人特質等取向進行投票抉擇。故有不少文獻認為，在經社環境與選民結構變遷下，尤其在大眾傳媒興起之後，候選人形象相較於政黨認同或是選區服務而言，其更能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爲(Brody and Page, 1973; Kelly and Mirer, 1974; Hellweg and Dionisopoulos, 1989; Nimmo and Savage, 1976; 胡佛、游盈隆, 1983; 陳義彥, 1994; 梁世武, 1994; 傅明穎, 1998)。

而除了政黨認同、候選人形象之外，尚有研究認為人際網絡動員亦是另一個足以影響選民投票行爲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過去國內外有關「人際網絡」的文獻研究主要有兩大脈絡，一為過去對「地方派系」¹⁸研究中有關「人際關係網絡理論」的部分，¹⁹二則是西方哥倫比亞學派所強調的社會取向投票論部分。前者主要強調的是藉由「關係」(Kuan-hsi/ Guanxi)²⁰連繫過程所具有的緊密性與延展性(費

¹⁷ 蓋有學者發現，不同背景屬性的選民心中自有一套評估候選人的圖像標準，進而影響其對候選人的情感和之後的投票抉擇，因此當選民教育程度愈高時，愈會運用此種思維結構來評斷候選人並進行投票選擇(Kinder and Sears, 1985; Miller, Wattenberg and Malanchuk, 1986)。顯示選民對候選人形象評價的思維係相當具結構性，而非如早期學者所認為是種短期、片斷與非理性的特殊反應。蓋早期學者認為，候選人形象僅係候選人在所謂的形象塑造家包裝之下藉以操弄選民認知的產物，故選民在此種狀況下對候選人的評斷往往流於膚淺的風格與長相的標準(黃秀端, 2005)。如早期密西根學派會將其視為是選民對政黨偏好的反射，是種個別特質(idiosyncratic)和短期因素，不僅不如政黨認同來得重要，那些以候選人人格特質作為投票基礎的選民亦往往被視為是非理性的(Converse, 1964; Page, 1978)。

¹⁸ 由於台灣早期實係移民社會，因此，地方政治生態實際上是種以族群主義、家庭主義、宗族主義為主的具閉鎖性的農莊經濟社會(趙永茂, 2001)。這種內部靠血緣、地緣來維繫彼此情感的親親性(nepotism)社會雖看似和諧共榮，但同時卻易型塑我群與他群的敵我意識，造成整體社會或政治社群的分歧與割裂。因此，在推動地方自治與基層選舉之後，此種社會面的分歧遂極易透過正式政治資源的制度性分享管道上綱為在政治上的結盟依據，形成在地方政治上一種非正式的權力團體——「地方派系」。

¹⁹ 研究地方派系另一個途徑是所謂「恩庇—侍從理論」(patron-client Theory)，其最早源自於人類學，著重在早期地方派系與國民黨威權政府在垂直式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的「利益交換」特點，故主張地方派系是藉由國家機器此一國民黨威權體制(即恩庇者)的權力運作與制度性安排，透過獨佔性經濟利益的施與，作為換取地方扈從者(即地方派系)選票支持的籌碼(陳明通、朱雲漢, 1992: 90)。

²⁰ Jacobs (1992: 90) 認為中國社會中的「關係」(Kuan-hsi/ Guanxi)有別於西方社會的「關係」(relation)，其係人與人間因共識或認同的連繫(ties)，或因血緣、姻緣、地緣、學緣等而存在，故其稱為「關係基礎」，並因「感情」維繫的有無與深淺(即俗稱「人情往來」)，形成所謂「關係價值」，憑藉此種「關係價值」，政治上的聯盟(即派系)才有可能。

孝通，1993：27-31），透過動員「人情」網絡來達到政治拉票的目的；²¹後者則是強調基於人際溝通所帶來的群體壓力²²，以及透過媒體社群網絡所帶來的資訊偏差²³，對選民投票行為所造成的重要影響力。因此人際網絡因素對選民投票抉擇所扮演的角色，主要環繞在人際互動以及人情關係之上，甚至僅是擁有共同屬性標誌（shared attributes）即可（如出於原鄉情結而來的情感認同），故主要係在人際關係較緊密的農村地區較能發揮作用（吳芳銘，1996；趙永茂，1996、2001；張世澤，2000；曾國鈞，2001；王金壽，2004a、2004b；鄧志松、吳親恩，2008：50-87；蕭怡靖、黃紀，2010a），且相較於其他投票取向來說，教育程度與社會地位愈低、年齡愈高者，愈容易受到人際網絡動員的影響（胡佛、游盈隆，1985）。

綜而論之，雖然選區服務在立委選舉中的重要性已普遍獲得學界所支持，但尚有一些文獻認為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依然對選民投票行為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尤其選區服務僅在特定環境系絡下對特定社會屬性或政治態度的選民較具有吸引力。故筆者以下即針對過去曾論及哪些特性的選民與環境系絡（可統稱地方政治生態）會重視選區服務的相關文獻作詳細檢閱，以爬梳出

²¹ 如 Jacobs（1992）曾強調，除了上述「關係」（Kuan-hsi/ Guanxi）的存在之外，更需以「感情」（affective component）聯繫（即所謂的人情往來）作為政治聯盟的中介變項，如此形塑成的「關係價值」（即親疏與否），才能進而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誠如涂一卿（1994）所言，中國社會中常見的人情往來（或稱人情債）係建立在「欠」與「報」的規範上，有「欠」才要「報」，能夠「欠」，表示彼此有信任（trust）和信用（credit）的存在，以相互支撐著時序，使得關係網絡具有延續性與穩定性。因此，「關係」成爲一種資本，「人情」成爲一種投資，不僅可以累積，也可以回收，至於投注多少、何時償還、以何種方式償還等，則須視兩造的關係人如何互動與提出（吳芳銘，1996）。

²² 如 Mutz（2002）即曾提出「重疊網絡」（cross-cutting networks）的概念，從個人政治網絡的特性此一角度重申人際衝突壓力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並強調政治的模稜兩可（political ambivalence）與社會責任（social accountability）這兩種社會心理機制會對選民投票行為產生影響，認為選民處於衝突的網絡中，尤其是與人面對面的情況下，雖會理性看待並容忍反對意見，但爲了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發生，破壞原有社會關係，故會限制自身的政治參與或是延遲投票決定，反之，若處於相同網絡之下，則會更加強化原先立場，此外，選民亦會傾向建構相同氛圍的社會網絡，以減少不一致的衝突（轉引自張佑宗、趙珮如，2006）。

²³ 社會取向投票論發展至 1990 年代後則開始強調人際網絡所帶來的資訊效益（Bartels, 1988; Popkin, 1991; Westlye, 1991; Beck et al., 2002），主張由於資訊來源本身即多少帶有偏差性，再加上資訊成本的存在，以及選民自身能力的限制，在有限理性之下，當選民依賴某一資訊來源時，便會促其作出利於一方的偏好抉擇，因此人際互動已經成爲政治資訊與規範傳遞的媒介之一（Huckfeldt, Plutzer and Sprague, 1993），Beck 等人（2002）更透過研究顯示，人際溝通網絡、媒體偏差及政黨或組織偏差，均會對選民投票抉擇產生相當的影響力。

具體的影響成因及其影響機制。

第二節 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

前一節曾簡要提及不同地方政治生態會對選區服務的重要性造成影響，本節則主要是繼續對此部分作更系統性的介紹，以瞭解哪些地方政治生態會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而在行文脈絡上，筆者將其分作屬於選民自身特性，以及外在整體環境系絡兩大層面回顧，茲述如下：

（一）選民自身特性的影響

曾有學者透過探討何種類型選民會尋求民代服務的研究指出，年紀較長、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因有多餘時間與金錢進行政治參與，故不僅愈會跟國會議員接觸、反映自身意見，亦較具有尋求民代「個案服務」的經驗（Johannes, 1984: 25-33；高世垣，2001）；然而 Cain 等人（1987）則發現，經社地位較低的選民，卻反而較希望國會議員偏重選民服務而非國會的立法問政；Ramseyer 與 Rosenbluth（1993）亦認為，選區服務此特殊利益（particularized benefits）²⁴的交換互惠模式，並不能打動所有選區選民，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較高、白領階級的浮動選民（floating voters），通常係以國家整體經濟指標來投票，過度強調特殊利益反而會讓其徒增反感。即有研究指出，此類知識水準不高、生活物質條件較差的選民，由於較關心日常生活的切身利益，故較具有「工具利益導向」的投票動機，以期望他所支持的候選人，日後可以成為請求協助解決私人問題的對象，甚至可用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高世垣，2001；趙永茂，1989：64-65）。如高世垣（2001）發現，收入愈低的選民，愈傾向以選區服務進行投票抉擇，而收入愈

²⁴ 所謂特殊利益（particularized benefits）係指此項利益是給予某些特定個人、團體或地區者，故不具普遍性。其意義係等同於前文提到的「計劃協助」（黃秀端，1994）。

高的選民即使在接受個案服務之後，亦不見得會在選舉時以選票回饋該候選人，顯示那些可能會與立委接觸、主動反映自身意見的選民結構，確係不等同於平常生活即高度依賴、會將選區服務視為日後投票抉擇關鍵的選民結構。

此外，亦有研究指出，政治涉入度（Political involvement）²⁵愈高的選民，也是常跟國會議員反映自身意見、尋求民代服務的選民類型之一（Johannes, 1984: 25-33；高世垣，2001）。如 Dalton（1984、2002）曾提出「認知動員」（cognitive mobilization）²⁶的概念，並以所謂政治涉入度加以詮釋，認為其除了包括民眾所具有的政治參與及關切政治等興趣與動機的心理傾向之外，更指涉其所擁有處理政治事務的技巧、資訊、能力及資源。因此，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愈擁有理解與處理政治資訊的知識能力與技巧，故往往較主動與議員接觸，並反映自身意見，而較不會依賴政黨指令或外在人際網絡的影響而決定投票抉擇。Campbell 等人（1960）亦認為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愈傾向為是「理想中的獨立選民」，係擁有關心政治、對政治感興趣，且資訊豐富等特質。²⁷

但亦有文獻指出，正由於政治涉入度高者較具備豐富的政治資訊與判斷能力較強，故政治涉入度愈高者較能注重在政黨政治之下，政黨所扮演的制衡角色，並可理性區分政黨對本土意識的提出係基於對本土化的尊重抑或是對族群分化的操弄，至於政治涉入度低者則較關心攸關自我生活的切身利益，如地方基層建設等（陳惠鈴，2007）。

²⁵ 所謂政治涉入度係指選民自身藉由政治資訊汲取及公民參與等作為，所體現出的對政治事務所持有的關注與認知程度（Inkeles, 1974）。Mayer（1962）曾指出，政治涉入度的指標包含政治知識的高低、對政治的興趣，以及對政治議題或選舉結果的關心程度，且此幾項指標彼此係相互關聯的。

²⁶ 認知動員係指選民因教育水準的提高與大眾傳媒的普及，而具有較強的認知與處理政治資訊的能力，進而能夠主動且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投票抉擇（轉引自徐火炎，2005）。

²⁷ 另外，亦有學者從傳播學角度切入，主張當人們對某一主題有較深入的涉入感時，會自認對該主題的瞭解深入，並傾向認為其他人會比自己容易受到媒介相關議題報導的影響，而有所謂的「第三人效果認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產生（Davison, 1983; Mutz, 1989）。如臺灣一項對選舉新聞的研究即發現，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從媒體得到的資訊即愈多，亦愈常和他人討論政治選舉議題，且會自認為對該議題較為瞭解，其第三人效果認知亦更為強化（胡幼偉，1997）。

此外，徐火炎（2005）在對 2004 年總統大選研究中，透過藉由「政治討論」、「政治關心」、「遊說他人」、「政治知識」、「選舉訊息的接觸」所建構出的認知動員綜合指標，²⁸發現認知動員程度愈高的選民，對於泛藍或泛綠的認同強度亦顯著愈高，此結果恰好與上述 Dalton（1984、2002）對歐美國家研究的結果相反。徐火炎認為其之所以這樣，在於臺灣二戰後雖同樣歷經如同歐美般從「物質主義到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變遷，但在公民的政治參與上，卻是從解嚴之後邁向民主化時代的競爭性政黨政治新局，故呈現出「政黨組合」（party alignment）²⁹，而非「政黨解組」（party dealignment）³⁰的現象。換言之，認知動員程度較高、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對不同政治立場（尤其是統獨）的政黨，反而會產生較強的認同傾向，故不同於歐美國家所呈現出的獨立選民。

簡言之，過去文獻雖大都認為政治涉入度的高低與其之所偏好以選區服務取向投票之間的關係密切，但國內外對其影響方向係無定論，或謂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較積極去蒐集相關政治資訊、並主動與立委接觸、提供政治意見，故應較重視選區服務，而非依賴政黨指令或週遭親友的言論；或認為政治涉入度愈高者，愈重視並能理性判別政黨的作用，與其所提出的議題；也有研究指出，所謂政治涉入度高者，只是由於具有強烈政黨認同、對政治抱有較高熱忱，遂傾向主動蒐集相關資訊，因此對政黨的偏好仍係較強。³¹因此有關政治涉入度愈高者的投

²⁸ 而有關探討政治涉入度或是認知動員測量指標的文獻，歷來主要聚焦的重點在於受訪公民是否擁有參與政治事務的興趣動機、資訊以及相關的能力技巧（徐火炎，2005），故舉凡「教育程度」、「選舉訊息的接觸」（如閱讀平面新聞、報章、觀看或收聽電視及廣播、參與選舉活動等）、「政治興趣」、「政治關心」、「是否與人討論政治或其討論的頻率」、「政治知識」、「是否遊說他人」等皆曾經作為其測量的指標之一（Mayer, 1962; Inglehart, 1970、1977; Dalton, 1984; 徐火炎，2005），只是因著實際資料蒐集的限制或是研究目的而有不同的指標選擇。

²⁹ 所謂「政黨組合」係指選民依附集結在不同政治立場的政黨旗幟下，而逐漸產生政黨認同的政治心理（徐火炎，2005）。

³⁰ 所謂「政黨解組」係指選民的政黨認同普遍降低或傾向於不具黨派的政治心理（Inglehart, 1990; Dalton et al., 1984）。

³¹ 有關政治資訊接觸度高的選民可能有兩種，一種為選民本身即不具明顯政治傾向，故傾向「普遍廣泛」地蒐集各家新聞報導；而另一種則是本身即具鮮明政黨認同，而以該政黨認同「選擇性」地閱聽吸收符合其偏好的議題資訊。

票取向是否傾向選區服務，仍猶有爭議，有待進一步分析。

此外，過去文獻曾指出，由於政黨認同的式微導致跨黨投票的增加，再加上獨立選民（independent voters）³²的日益增多，造成選區服務重要性漸趨上升，現任者也因此愈容易連任（Jacobson, 1983; Burnham, 1975），遂使得過去 Campbell 等人所主張「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影響力逐漸下降。³³而以國內來說，陳譽文（2011）則透過對 2008 年立委選舉研究發現，具有泛綠或泛藍政黨認同相對於中立者，係會顯著傾向以「政黨因素」進行投票，而非「候選人因素」。顯示國內仍無面臨政黨解組的現象，跨黨投票的機率仍不高，且獨立選民的確較重

³² 所謂「獨立選民」，顧名思義係指「不具穩定政黨認同或偏好」的選民，亦可稱作「中間選民」或「中位選民」（Dennis, 1988b; 許文賓, 2003），其類型主要可分作兩類，一類是「舊獨立選民」，或稱「冷漠型獨立選民」，指的是一群長期缺乏穩定政黨認同，且對政治欠缺興趣與涉入感、消極與不理性的選民（Campbell et al., 1960; Burnham, 1970; Dennis, 1988; 吳重禮、許文賓, 2003; 葉銘元, 1994; ；）；另一類則是「新獨立型選民」或稱「理想型獨立選民」，則意謂除了缺乏長期穩定的政黨認同之外，尚具備高度政治興趣、積極且理性的選民（Meyer, 1962; Burnham, 1970; Pomper, 1975; Shively, 1979; 莊天憐, 2001）。如莊天憐（2001）即曾指出，國內獨立選民的主流類型已逐漸由早期的冷漠型獨立選民過渡到政治知識及政治涉入感較高的理想型獨立選民，且以其選民屬性來說，前者冷漠型獨立選民多以女性、60 歲以上及教育程度愈低者為多，然而後者理想型獨立選民則係以男性較多（唯此種差距正逐漸縮小中），且多分布於 30 歲至 39 歲、教育程度較高者，至於在省籍、族群認同或是統獨立場上，則不管是冷漠型亦或是理想型獨立選民，均無顯著差異；而以投票取向而言，獨立選民選舉投票時較傾向候選人取向，而非政黨因素，且理想型獨立選民投票時則較冷漠型獨立選民傾向於政見取向，而非傳統關係取向。

³³ 申言之，Campbell 等人在 1960 年出版的《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一書中指出，其主張由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入手，以所謂漏斗狀因果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的建構來說明「政黨認同」係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長期也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並認為此種個人心理上的「自我主觀認知」，係透過不斷「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過程而逐漸形成對政黨的歸屬與依附感，且選民對政策與領導者的態度，以及對團體和個人利益的認知，皆有依其「政黨認同」發展的傾向，其存在更不侷限於正式黨員，甚至不需要持續的政黨支持（Campbell et al., 1960: 121-123），而透過此長期穩定的政黨情感（partisan alignment）更可計算出一個投票常模（normal vote），處於常態水準之外的變異情形則可推定為是短期因素的影響（Converse, 1966），如對候選人及議題的評估、競選活動、以及和朋友家人的討論等。而國內有關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行為影響力及其背後形塑原因的討論研究，亦是不勝枚舉，主要有三點論述，第一、臺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主要肇基於國家認同與族群意識的差異，而並非如同國外社會階級等的分歧（何思因, 1994; 徐火炎, 1991、1993; 陳陸輝、耿曙, 2008, 陳義彥, 1994; 游盈隆, 1994; 傅恆德, 1996; 吳乃德, 1996; Yu, 2004; 蕭怡靖, 2009、2010a）。第二、有關政黨認同分布穩定度的探究，以及政黨認同對投票抉擇的影響，一般認為，國內具政黨認同的選民，普遍維持五成至六成左右，且政黨認同者選舉時多半傾向於固定支持所認同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徐火炎, 2005; 蕭怡靖、游清鑫, 2008; 林瓊珠, 2008; 包正豪, 2009; 蕭怡靖, 2009、2010a; 吳親恩、李鳳玉, 2012），遂有「政黨鐵票」之謂（包正豪, 2009）。第三、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極其深遠，並與若干政治態度、競選議題與心理認知關係密切，舉凡統獨立場、國族認同、政府施政評價、政治功效意識、政治涉入度、分裂投票與分立政府等制衡觀點，不一而足（吳重禮、許文賓, 2003: 103）。

視選區服務等候選人因素，而非政黨因素。³⁴

而有關族群意識與統獨立場，陳譽文（2011）曾透過研究發現，在控制政黨認同之後，就族群認同而言，在 2004 年總統選舉中，自認中國人或是台灣人者，相對於兩者皆是的選民，係顯著傾向以「政黨因素」而投票，而非「候選人因素」；而對統獨立場來說，在 2008 年立委選舉中，傾向獨立相對於維持現狀的選民，在投票取向上亦較顯著偏好以「政黨因素」而投票，而非「候選人因素」，然而傾向於統一相對於維持現狀的選民，卻在投票取向上並不顯著偏好以「政黨因素」而投票。可見在控制選民政黨認同之後，選民的族群認同與統獨立場仍會影響其投票取向，且唯有具備鮮明中國意識或臺灣意識，以及贊成獨立的選民，愈傾向以政黨因素投票，甚至可以凌駕選區服務等候選人因素。³⁵

（二）選區環境系絡的影響

誠如 Jones、Johnston and Pattie（1992, 344）所指出，「個別選民在政治上的被社會化並非『真空的』（vacuums），其必定會在各種社會系絡中學習他們的政治態度」。³⁶因此本文此處文獻回顧即分別從選區中「政黨競爭程度」、「政黨版圖」、「產業結構」、「宗教動員力」以及「地理區域」五大層面切入，以期全

³⁴ 值得一提的是，因陳譽文（2011）該篇文章係將選區服務包括於「候選人因素」此一政治連結之中，故具有泛綠或泛藍政黨認同相對於中立者，係會顯著傾向以「政黨因素」而非候選人因素投票，某種程度可視為是政黨認同者重視政黨因素甚過於候選人選區服務等因素。

³⁵ 值得一提的是，因陳譽文（2011）該篇文章係將選區服務包括於「候選人因素」此一政治連結之中，故具備鮮明中國意識或臺灣意識，以及贊成獨立的選民，愈傾向以政黨因素而非候選人因素投票，某種程度可視為是該選民重視政黨因素甚過於候選人選區服務。

³⁶ Stipak 和 Hensler（1982, 169-171）亦指出，環境系絡對個人政治活動的影響實可區分成「影響中介」（influence-mediated）與「認知中介」（perception-mediated）兩種途徑，前者強調系絡（context）效果主要是透過人際間的互動在運作，故著重人際的溝通與資訊傳播等「個人網絡」（network）；後者則認為個人對外在特定環境的感官知覺係會隨著時間的耳濡目染而逐漸自我形塑，故此種「社會系絡」（social context）的影響力未必需要透過實際上的人際互動才得以形成。而兩者主要差別即在於前者所強調的「個人網絡」（network）係個人主動建構的交往範圍（individually constructed），而後者強調的「社會系絡」（social context）則是外在環境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建構，係種結構上所加諸的（structurally imposed）個人生活空間（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因此，網絡雖是由個人所自願建構的選擇性活動範圍（張佑宗、趙珮如，2006：1-38），透過個體資料的問卷調查即能展示，但仍多少會受到整體社會系絡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的影響，而此多半須藉由總體資料的形式才能呈現（如產經結構、政黨競爭程度）。

方面地探討環境系絡如何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偏好態度。

1、政黨競爭程度與政黨版圖

「政黨競爭程度」與「政黨版圖」係同屬選民投票行為研究中最常被人分析論述的主題之一，兩者有所關聯但又不盡相同，蓋政黨競爭程度愈小，即意謂著該區政黨版圖勢力愈強，只是政黨競爭程度較強調政黨間的相對勢力，而政黨版圖則多半聚焦於特定政黨的絕對勢力，與其所帶來專屬於該政黨的選舉效果。

申言之，以政黨競爭程度來說，過去文獻曾指出當政黨競爭程度愈高時，選民益發重視候選人的形象（黃秀端，2005），蓋當政黨競爭程度愈高時，一則意謂著雙方在該選區並不具備任何顯著地政黨優勢，此時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遂成爲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所在，故當所有議題政見趨中以爭取選票極大化時，候選人形象即成爲吸引中間選民的焦點；二則當政黨競爭程度愈高時，媒體對選情關注程度亦愈高，各候選人即容易藉由攻訐、爆料或抹黑對手，來爭取媒體曝光率與打擊對手形象，以爭取更多選民的注意與青睞，因此政黨競爭程度愈高的選區，選民愈可能傾向以候選人形象作爲投票取向。

而當政黨競爭程度愈低的話，此時即意謂著該區係屬某政黨的政黨版圖，將容易形成穩定、利於該黨的政治氛圍，故選民會傾向以政黨認同或選區服務作爲其投票取向（吳重禮、譚寅寅、李世宏，2003；蕭怡靖、黃紀，2010a）。蓋政黨版圖若以「內生性影響」（endogenous effects）角度來看，³⁷係屬環境系絡所具有的

³⁷ 申言之，「政治版圖」指的是藉由政黨得票率釐清該黨得票強弱、穩定與變遷的地區分布現象，而其在過往選舉研究文獻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則可依認識論進一步區分爲「個體論」與「結構論」兩種，前者認爲政黨版圖僅係屬性相似的選民作出相同政黨抉擇所呈現出的被動地理差異，故強調政黨版圖仍須以其中成員政黨支持傾向是否穩定作前提，否則即僅係「相關性影響」（correlated effects）的結果，後者則認爲政黨版圖係環境系絡效果主動影響地域內成員投票行為的結果，因此多半聚焦於結構效果而非成員政黨傾向穩定與否，故主張以「內生性影響」（endogenous effects）觀點來看待政黨版圖。而前者係以徐永明的區位推論模型（Ecological Inference Model，簡稱 EI

結構性影響，故當政黨版圖勢力愈鮮明時，此時由於在日常生活中易形塑利於該政黨資訊傳播的政治氛圍，選民與該區立委或地方首長亦可能藉由選區服務的頻繁接觸，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關係（蕭怡靖、黃紀，2010a），故具有「強化」甚或「同化」該區選民以傾向該政黨的偏好進行投票抉擇。³⁸自是，當選區政黨競爭程度愈低、某一政黨版圖愈具優勢時，此時選民即會傾向以政黨認同或選區服務作為其投票取向。

而以政黨版圖來說，歷來文獻探討重點除了上述強調因政黨的相對優勢所帶來的政治氛圍影響之外，即係基於特定政黨版圖的絕對優勢所帶來的獨特選舉效果。如吳重禮等人（2003）曾提出賦權理論（empowerment theory）³⁹的概念，以解釋民進黨之所以在南部勢力屹立不搖，原因在於其係扮演了弱勢團體利益代理人的角色，並提升其政治參與度，因此民進黨賦權效應較高的區域，選民愈趨向支持民進黨候選人；反之，民進黨賦權效應較低的區域，選民則傾向支持國民黨與親民黨候選人。換言之，民進黨由於係以本省籍、本土化、政治改革等形象崛起，某種程度上較國民黨來得具「草根性」與「親民」，其對南部農牧人口較多、經社水準居於劣勢、寄望改變現狀的地區選民亦更具吸引力。因此當其政治菁英

Model) 為代表，後者則以洪永泰的「整體資料輔助模型」(Aggregate Data Assisted Model, 簡稱 ADAM) 為代表。

³⁸ 值得補充的是，關於政黨版圖在影響個人投票行為的方向上，若仔細觀之，歷來文獻實際上又可分為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政黨版圖具有「強化」該區選民以其政黨認同進行投票抉擇的效果；另一種說法則進一步指出政黨版圖不僅有強化該區選民以其政黨認同進行投票抉擇，甚至可藉由系絡屬性影響到資訊傳播的偏差方向，進而達到「同化」該區不具政黨認同或是政黨認同與其政黨版圖優勢相異選民的投票抉擇。然而有部分文獻卻指出，當選民的政黨認同居於該地區政黨版圖的弱勢時，便會傾向主動建構一群志同道合的個人網絡，以解除被疏離與孤立的壓力，故友伴團體（peer group）遂成為這些政治異議者的保護傘（Finifter, 1974）。如張佑宗、趙珮如（2006：26-28）即發現居住在本身支持政黨較弱勢地區的選民反倒會比居住在本身支持政黨較強勢地區的選民，有更高的機率會投給本身所支持的政黨。賴進貴等（2007）亦指出即便環境系絡會造成空間聚集的現象，但不可否認仍有所謂「政治孤島」的存在。顯見以目前學術研究來說，仍以前者「政黨版圖會強化該區選民以其政黨認同進行投票抉擇」的說法較不受爭議，但不論是哪一種，政黨版圖所具有的内生性「政治氛圍」的影響效果，係無庸置疑的。

³⁹ 所謂「政治賦權」或謂「政治整合」係強調當某些弱勢團體菁英取得若干政治公職（諸如地方行政首長、民意代表席位、地方政府教育委員會席次）之後，且掌握政治權力的時間愈久，其對於政治決策過程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進而激發所屬團體成員的政治態度、積極參與政治事務。

憑藉政策訴求、選舉策略，甚至個人魅力以贏得選舉掌握公職之後，即可藉由施政與領導效能，刺激弱勢團體成員參與政治的意願，並激發與吸納部分潛在選民的認同和支持（吳重禮、譚寅寅、李世宏，2003）。

由上可知，選舉競爭程度（不論候選人或是政黨）愈大時，即意味著雙方實力的勢均力敵，此時即會刺激選民傾向以候選人形象作為投票抉擇時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反之，當競爭程度愈小時（即某一政黨版圖愈大），選民則愈容易以政黨認同或選區服務進行投票抉擇。且民進黨之所以在南部長久保持穩定的政黨版圖優勢，係在於其以弱勢團體利益代理人的角色，藉由利益分配與參政權利的賦予，而取得選民的支持與認同。

2、產業結構

質言之，產業結構不僅往往影響選民接收資訊的便利性與多元性、體現一都市化的程度，更影響個人所擁有的人際網絡型態。國外曾有研究認為，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由於選民與政府的接觸愈頻繁，因而造成選民尋求選區服務的數目增加（轉引自黃秀端，1994），黃秀端（1994）亦透過國內研究發現，臺北市立委紅白帖的數量雖居全台之冠，其次才是臺北市以外的北部，南部數量反而不如預期來得多；但其由訪問立委過程中卻發現，臺北市立委對選區服務的壓力卻不如中南部立委來得大。其認為可能原因在於臺北市立委知名度較高，故慕名而來的人眾多，但也因為選區性質使然，故憑藉問政形象即可當選，而南部農村地區選舉因往往依賴樁腳與家族宗親，故其請託對立委的壓力自然較大，遂造成農村立委雖收到的紅白帖數量不多，但卻對「選區服務」的感受壓力較大。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文獻雖認為選區服務對都市化程度較低的農村地區選民較具吸引力，但同時亦指出，農村地區亦利於人際網絡的動員（蔡佳泓，1996；

陳昭凱，1997）。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農村社會由於經社水準較差，資源相對短缺，人民接受訊息及自我救濟的管道與能力亦相對較少，故傳統上較倚賴及需要地方當權者不論物質或非物質的「給予」，並由於農村居民較重視人情關係，人際互動亦較緊密，故容易在選舉時藉由已在平時透過選區服務打下的基礎，繼而進一步再透過人際網絡的動員，來達到擴展票源的效果。此種藉由結合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動員的競選策略，即過去傳統上俗稱的組織動員，係地方派系主要的選戰策略（黃光國，1988；吳芳銘，1996；趙永茂，1996）。然而即便組織動員係地方派系所擅長，但亦有文獻指出，農村地區因上述特色，其選民本來就較重視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動員，故在經社環境變遷、地方派系式微之後，選區服務仍然是立委最重視的工作，而是否爭取到地方派系的支持，以利更進一步的人際網絡動員，則變得不再那麼重要（高士垣，2001）。⁴⁰

可見，農牧產業結構雖同時利於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動員，但並不意味著兩者係不可區分，也不代表候選人能同時運用這兩種選戰策略，須視候選人本身所擁有的資源與人脈關係而定，但通常選區服務係候選人主要採行的——不論有無爭取到地方派系的支持（陳昭凱，1997）。然而這是否意味著農村地區選民對選區服務的重視程度已然凌駕於人際網絡動員，故使得立委逕自強化選區服務即可達到勝選目的，則有待進一步地分析。

3、宗教動員力

誠如前文所言，過去文獻曾指出經社發展程度不高的傳統地區，其選民愈容

⁴⁰ 申言之，高世垣（2001）曾透過研究指出，區域立委針對各代表工作在爭取選票的重視程度上，係以選民個案服務最為看重，第二是立院的問政表現，第三則是為地方爭取建設，而有關得到派系支持與得到財團支持對爭取選票的重要性來說，則是最低（其中前者又高於後者），且立委對得到派系支持的重要性看法最為分歧，顯見各立委普遍不認可爭取派系支持進行動員才能當選，且彼此看法亦大相逕庭，但究係是何因素導致候選人態度不一，文中並無進一步地探究。

易重視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故早期地方上政治勢力即常透過各種與當地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管道或機制，插足地方政治事務。如趙永茂（1998b）即指出，地方派系尤擅常透過社會權力途徑，達其利益與政治權力的鞏固，如爭取寺廟管理委員、董監事、主任委員、董事長等職位，以提高地方形象，並擴大其結合與保護網絡，鞏固其政治利益與影響基礎。⁴¹蓋台灣早期實係移民社會，因此地方政治生態實際上是種以族群主義、家庭主義、宗族主義為主的具閉鎖性的農莊經濟社會（趙永茂，2001）。故不論是基於看天吃飯的農漁生活需要，亦或是寄託心靈、團結宗族使然，原鄉、泛靈信仰等遂成為人們日常社會中寄託精神生活的重心所在，而廟埕遂成為當地鄉親閒暇時活動、聊天下棋的聚集場所，不僅周圍商店、攤販林立，亦定期舉辦廟會活動，使得廟宇成為鄉下的商業以及藝文活動中心，甚至扮演社區民眾議論公共事務、傳播社會消息的「資訊中心」之角色。也因此，國內早期地方政治生態係以「寺廟」為核心所展開，其所具有的團結與整合功能，更使其蘊含龐大的社會動員力，遂成為地方派系競相拉攏滲透的對象，更有不少政治人物利用補助廟方活動、廟宇修葺、巨額善款捐助等名義，以競相爭取廟方支持，企圖透過對特定群體（即廟方與信徒）進行選區服務的方式，來增加票源。

42

此外，何鴻明（2008）則透過對大甲鎮瀾宮媽祖信仰與地方政治生態間互動模式的研究指出，近幾年來寺廟的固定儀式幾乎以政治人物為主祭者，⁴³而每年固定一次的年度盛事——遶境進香，亦吸引不少意欲從政參選的政治人物前來擔任主祭官、扶轎、點燃起馬炮等象徵性的宗教儀式，除了增加新聞媒體的曝光度、

⁴¹ 如何鴻明（2008）研究指出，大甲、大安、外埔三鄉鎮的地方派系生態，即會影響到大甲鎮瀾宮所產生的董監事派系色彩。

⁴² 當然，香火鼎盛的寺廟所具有的可觀香油錢收入、基本資產，以及藉由遶境進香賦予週遭店家經濟效益所帶來彼此的合作商機等，亦是使其成為地方政治人物覬覦介入對象的原因之一。

⁴³ 有關政治人物除了身兼董事長及臺中縣立委的顏清標之外，立法院長王金平、立委劉銓忠、張花冠、縣長黃仲生、市長胡志強、縣議員姚應龍、林素真等，包括附近縣市的彰化縣長卓伯源、嘉義縣長陳明文及副議長張明達外，甚至是國、民兩黨大老，如呂秀蓮、蘇貞昌、游錫堃、馬英九等亦曾出席並擔任主祭者之一，地方政治人物參與者更是不計其數。

增加其在信眾心中的印象分數之外，儀式角色的重要性亦往往象徵其政治權力地位。且廟會慶典中的「宴客」更是臺灣民間最重要的人際關係網絡的展現空間，即如同西方誇富宴般，除了彰顯聲勢、取得公開認可並宣揚地位之外，更是種「人情債」的互動模式（何鴻明，2008），舉凡遶境前夕的起馬宴（又稱起駕宴）、神明生日、舉辦平安醮典等活動，其有關宴客人數、宴請名單、座位順序安排等，不僅體現交際手腕與影響可及範圍，更透過宴客中的「給予（即邀宴）」、「收取（即赴宴）」和「回報（即日後報答人情債）」之間，建立起綿密、龐大的人際關係網絡。

王順民（2007）亦認為，本土宗教因所具有的包容性與整合功能，加上其對信徒所擁有的宗教信仰力量，遂使其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而成爲政治人物攏絡、藉以展現個人地位和塑造形象、進行選舉動員的對象，故多半「政—教相通」。此外，袁易（1994）更指出，對地方神祇（Territorial Cults）的崇拜，維繫或復甦了當地居民傳統價值與忠誠度，並透過大規模的祭祀盛典，迎神賽會、修祠造廟等，壯大了宗族網絡的力量，不僅可透過共同方言、共同祖籍、共同信仰和共同風俗習慣的紐帶，強化社群意識與凝聚力，更能形塑強大的社會動員網絡。

由此可見，宗教動員力一直對選民投票行爲扮演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其所具有的意義係有兩層：第一、透過自身作爲地方聚集與資訊傳播的功能，藉由居民與居民間、神職人員與居民間的互動過程，建立起一套人際關係網絡，不僅可表彰一地的風土民情、社會文化的發展型態，亦在地方上扮演重要的人際交流平臺；第二、正由於宗教具有廣大的動員與集結能力，使其往往亦成爲政治人物透過對特定群體（即廟方與信徒）進行選區服務、藉以獲得龐大信徒支持的主要對象。這也是爲何國內早期地方政治生態係以「寺廟」爲核心所展開，蓋其所具有的動員力量，係爲其之所以成爲政治人物競相拉攏滲透的主因。

4、地理區域

黃秀端（1994）曾透過研究指出，臺灣地區雖交通發達，往來頻繁，但各地風土民情仍有所差異，故不同地區的選民對選區服務的重視態度亦會不盡相同，如南部地區選民即較北部地區選民更為重視選區服務。而劉嘉薇（2008）則在對2006年不同地區縣市長選舉分析中，發現雲林縣與高雄縣則較傾向於人際網絡及經濟投票，且高雄縣人際網絡對投票抉擇的影響高於臺北縣，至於高雄縣、雲林縣的選民對地方建設這些民生議題則顯著較為關注，可見地域差異對選民投票取向似乎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性，且南部地區選民似乎較重視地方性施政表現以及人際網絡因素。徐永明（2000、2008）即曾以所謂「南方政治」或「北藍南綠」稱呼此種因地域差異所導致南北選民投票行為大不相同的現象。⁴⁴

然而，卻有部分文獻對地域政治是否存在抱持懷疑的態度，其認為所謂「南方政治」或「北藍南綠」的現象，係肇基於產業結構、亦或是所謂選民結構的不同（如族群或階級差異），故地域本身並不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蕭怡靖、黃紀，2010a；耿曙、陳陸輝，2003；洪永泰，2003）。⁴⁵如蕭怡靖、黃紀（2010a）曾透過多層次分析檢證2008年第七屆區域立委中選民的投票行為，發現之所以造成選民投票行為呈現北藍南綠的分布差異，實際上肇因於選區的產業結構，而非如徐永明、林昌平（2008）單純透過時間序列總體資料研究所顯示出的地域差異，然而該文卻僅針對產經結構作分析，而無控制地域上的差異，故實際上仍是無法解決徐永明、林昌平（2008）研究中，在控制地域效果之後，產經結構對選票分布反而喪失顯著解釋力的疑問，更無法正面回應長久以來存於學術研究中有關地域

⁴⁴ 申言之，其強調由於南北文化、歷史發展等的不同，因此「南方政治」或「北藍南綠」等「地域政治」的現象是存在的，地域差異可作為有效理解政黨版圖的重要因素（徐永明，2000；徐永明、林昌平，2009）。

⁴⁵ 故此些學者認為地理區塊差異無法用來解釋政黨版圖的形成。

政治是否存在的爭論。

由上可知，地理區域雖似乎會對選民之於選區服務偏好態度造成影響，但透過其他有關地域差異對投票行為影響的文獻可以發現，地理區域之所造成選民對選區服務態度不一，是否真係源於地區差異，亦或產業結構，猶令人存疑，值得吾等進一步思考分析。

綜觀上述有關選區服務與其他重要投票取向在選民投票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節），以及地方政治生態如何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偏好態度的相關文獻（第二節），不難發現學術上對於重要投票取向的認知係非定於一尊，且不同類型的選民有其特定的投票取向，多數文獻認為選民的經濟水準、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等會影響其對於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而選區的產業結構等都市化發展程度也會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的需求，只是對於影響的方向均尚無定論。故本文即希望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第七屆立委改制之後，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重視與否的確切成因，又是哪些投票取向能凌駕選區服務，以及更重要的形塑選民如此偏好的環境系絡因素，俾徹底釐清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此章主要分成六節，即研究架構與研究資料、變項建構、估計方法、研究限制與研究假設，俾完整說明本研究如何基於研究需要，建構出其間概念的因果關係，以及如何實際運用資料和統計方法，來檢證變項間的統計關係，俾釐清本文研究主旨。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係探討在國會選地方化之際，既然實務上候選人如此強調選區服務，那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相較其他投票取向的偏好態度，以及哪些投票取向能凌駕選區服務，而選民之所以如此考量，背後又究係受到不同環境系絡的何種影響，包括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效果。

因此，筆者將本文定位為初探性研究（pilot study），蓋過去研究多半係單純聚焦於選區服務對立委當選或連任影響的重要性，而鮮少論及選區服務作為眾多投票取向之一，其與地方政治生態間的關係，然而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僅僅分析選區服務對勝選的影響，將不再能夠滿足研究者對於立委改制之後，如果實務上各候選人普遍重視選區服務的話，為何選區服務無法無往不利地凌駕於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的疑問。因此筆者認為，以選民角度分析形塑其對選區服務相較其他投票取向偏好態度的背後成因，包括選民特性與外在環境系絡因素，係勢在必行。故本文係以選民投票取向為分析標的，並以選區服務為其中參照對象，再嘗試結合選民個體資料與總體環境系絡資料進行「多層次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今針對研究模型中的分析標的及各主要解釋概念說明如下：

（一）分析標的

誠如前文所述，本文重點在於釐清既然實務上候選人如此重視選區服務，那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選民傾向或不傾向以選區服務表現來投票，又是什麼投票取向能凌駕於選區服務。因此，本文爲了更貼近實務選情，除了參考胡佛、游盈隆（1983：225）對投票取向的定義，將「選民投票決定的原因」視爲投票取向的概念型定義之外，⁴⁶並在投票取向的分類上，基於研究主旨的更有效分析，將其定性爲「選區服務」、「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以及「人際網絡」四大類進行研究。今將各項概念內涵說明如下。⁴⁷

第一、「選區服務」，本文主要援用黃秀端（1994）對「選區服務」的定義，即指涉民意代表爲選區選民所作的任何工作，並參酌許志鴻（1986）所認爲「凡是在連任動機的驅策下，民意代表爲滿足選區選民的需求，而採取可能爲選民爭取到實質利益的回應行爲」的說法，將「選區服務」視爲「民意代表爲選區選民所作的任何有關利益回饋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筆者認爲此處的「利益」可泛指「非物質性」與「物質性」兩者，因此，舉凡個案服務、計畫協助，甚至是參加婚喪喜慶、人事請託關說、冤屈平反等皆屬選區服務範疇。

第二、「政黨因素」，即所謂「因黨投票」（party vote），泛指任何基於政黨因素所作的投票行爲，如政黨認同、特定政黨不認同等情感連繫以及政黨議題等任何有關政黨的考量理由。

第三、「候選人形象」，即「因人投票」（personal vote）中，有關候選人魅

⁴⁶ 其認爲投票取向係選民在作成投票決定時，所依據的內在感受或價值所反映出的特定取向，即所謂選民投票決定的「原因」（胡佛、游盈隆，1983：225）。

⁴⁷ 而值得一提的是，筆者之所以不將投票取向概分爲選區服務與非選區服務二大類，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僅分兩大類將不容易有效探知在改制之後，選區服務相對其他投票取向間，背後所吸引選民的屬性類型是否有所差異；第二、倘若細部分析實際選戰，將不難發現仍有候選人主打政黨對決、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動員，因而所吸引到的選民，其投票取向亦會有此差異，故細分投票取向將助於釐清國會選舉地方化後，在選區服務愈趨重要的時候，究係什麼樣的地方政治生態會趨使哪一類型選民反而重視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故如此劃分誠基於更有效分析研究主旨的考量。

力與魄力、正直、清廉、誠信、親和力、問政能力以及包括外表、風格和學經歷等個人背景以及候選人所提議題政見等。⁴⁸

第四、「人際網絡」，係指投票行為是基於人際交往過程中的從眾心理、資訊偏差，或是人情債償還下的「欠」與「報」的互動等原因，甚至包含單純因共同屬性標誌（shared attributes）而來的認同心理，如同鄉、同宗等。故其影響過程是否涉及物質利益交換係非重點（因中國人基於民族性，往往由於有事相託，而習慣施以小惠作為答謝），蓋真正打動選民投此一票的往往不是表面的禮尚往來，而主要是人際交往過程中的從眾心理、資訊偏差，甚至是一種信任與信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之所以將「人際網絡」獨立歸為一類，不僅係因過去不論國內外研究文獻，均曾論及人際網絡因素對選民投票行為影響的重要性，更是基於在現今時空變遷下的立委選舉中，對於人際網絡相較選區服務，其所吸引到的選民類型是否有所差異，以及其與背後環境系絡的互動模式是否相同的興趣使然；且考量到過去國內有關「人際網絡」的研究多半出自於「組織動員」而來，

⁴⁸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將傳統上屬於「候選人議題與施政表現」中，有關候選人的「議題政見」以及「中央問政」表現，均劃歸「候選人形象」底下。其原因在於，以前者來說，由於議題政見在性質上多屬於候選人對未來願景的規畫，雖然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後續具體的施政表現，但在區域立委選舉中，因重要性本不如總統選舉來得大，且候選人人數眾多，遂使得媒體對個別立委候選人的議題政策無法也不會多加關注，選民得藉此蒐集相關訊息的成本亦隨之增加，故多半直接藉由政黨認同或是過去具體的選區服務表現來決定投票偏好，亦可減低所需要為候選人政策跳票所負擔的風險，因此選民遂對候選人在地方上選區服務表現較為重視，使得候選人在立委選舉中，較少提出議題政策供選民選擇，而即便有候選人提出政見議題，通常係與候選人自身形象相符（潘律民，1993；廖益興，2004），甚至有時提出的目的即是為了強化選民對自身的形象認知，故本文不將候選人議題政見獨立一類，而是將其劃歸到「候選人形象」底下。以後者來說，候選人中央問政傳統上雖可視為候選人施政表現的一環，但因區域立委係屬中央民意代表，其職責與角色誠有別於行政首長，其所具有的施政表現——「中央」立法問政以及「地方」選區服務上，無論就性質或是所吸引的選民屬性來說，中央問政均與候選人形象較為接近，而不同於地方選區服務。如吳親恩、李鳳玉（2012）的研究指出，不論在廣義性質或是實際觀察資料的相關性上，中央問政績效均與候選人清廉、堅持政治理念等形象較為相近，故相當程度可歸納為同一面向，而有別於選區服務；而就吸引的選民屬性來說，過去文獻亦曾發現，真正需要及重視選區服務的選民，係那些知識水準不高、生活物質條件較差、對日常生活切身利益較為關心的選民，其之所以投票也是基於「工具利益導向」因素，故有別於關心中央立法問政能力與形象的高教育程度和經社條件的選民屬性。因此筆者認為，中央問政表現實際上可看作是一種候選人特質「能力」的展現，然而「選區服務」則較取決於候選人自身對選民服務「意願」的有無或是強度，兩者係大異其趣，故宜將候選人施政表現中的中央問政劃歸於「候選人形象」此類型內，而有別於候選人地方性的選區服務。

但兩者實質上係略有不同，更遑論「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在本質上即有明顯差異，故自成一類分析有助於釐清「選區服務」相對於「人際網絡」在現代立委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

蓋過去對組織動員的分析大都源於早期國民黨威權體制下對地方派系的研究，而分為著重「利益交換」特點的「恩庇—侍從理論」與強調人情關係的「人際關係網絡理論」兩大研究途徑。然而考量到現今經社環境的變遷、民智的開展、政黨政治的確立以及司法體制的漸趨完備、獨立和金融機構的改革等，派系政治已逐漸式微，「恩庇—侍從理論」所側重的「利益交換」模式亦在目前臺灣社會的選舉中逐漸喪失對選民投票行為的關鍵影響力，過去地方選民不論是基於公益或私益的需求出口，更已日趨轉移到民意代表身上，變成「選區服務」的一種，形成所謂「工具性利益導向」的投票動機（趙永茂，1989；高士垣，2001），以往與派系樁腳私相授受的情形遂愈來愈少見。反而是「人際關係網絡理論」中所著重的情感連繫此一「關係」取向，依然在選舉中扮演若干角色，其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性亦從過去到現在仍持續引起國內研究者的注意。

因此，本文為求全面性的探討在現今立委選舉中，人際網絡因素相對於選區服務，其背後所吸引的選民類型以及所受到選區環境系絡影響的因素是否仍相同，俾透過釐清人際網絡和選區服務在現代立委選舉中的差別，來凸顯並勾勒選區服務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其與地方政治生態的互動面貌。自是，本文所探討的人際網絡投票取向，係從較廣泛的角度來討論，實與傳統有關組織動員的論述內涵有所差異，蓋一則本文已將組織動員中，有關利益交換互惠（如個案服務等）的部分抽離，轉移到選區服務範疇，並將剩下來的人際關係網絡理論與西方的社會取向投票論綜合成廣泛的「人際網絡因素」來探討。

（二）解釋因素

在本文研究中，以個體層次來說，鑒於既有研究對於偏好以選區服務取向投票的選民類型，多半聚焦於經濟水準、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上，但究其實際，國內外文獻在有關其對於選區服務的實際影響方向卻無一致看法，因此本文為求釐清，遂將主要解釋因素設定為「經濟水準」、「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三項，並把其他可能會干擾解釋因素與分析標的間因果關係的因素（如年齡、有無政黨認同、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但非本文關心重點者視為個體層次控制因素，俾釐清在現今立委選舉中，究係是何因素影響選民對於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至於在總體選區環境系絡部分，則將能體現政治氛圍的「政黨競爭程度」、能體現經社發展程度與生活形態的「產業結構」，以及能代表一地社會文化特性的「宗教動員力」設定為主要解釋因素，並把「泛綠政黨版圖」、「地理區域」視為總體層次控制因素，俾釐清環境系絡因素對於選民之所傾向特定投票取向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效果。今介紹其間因果關係如下：⁴⁹

1、個體層次

誠如前文所言，有文獻指出，經濟社會地位與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其愈會跟國會議員反映自身意見，但同時另有文獻卻認為其也較不容易被立委所提選區特殊利益而打動。蓋此些知識水準不高、生活物質條件較差的選民，由於較關心日常生活的切身利益，故較具有「工具利益導向」的投票動機，以期望他所支持的候選人，日後可以成為請求協助解決私人問題的對象，甚至可用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顯示經社程度愈高的選民雖較常和立委接觸、反映自身意見，但實際

⁴⁹ 誠如蕭怡靖、黃紀（2010a）所言，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的選區，雖因應選制改革而進行重劃，但仍無損選區環境因素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解釋力。蓋早於2005年6月任務型國民大會即已通過選制改革修憲案，立法院亦隨即於2006年1月取得選區變更的同意權，故立法委員對於新選制下的選區劃分、選區的人際網絡、選戰策略等均有充足的時間因應與籌備。況且多數選區在2006年底前已經確定，其餘選區最晚亦在2007年1月底定，也讓政黨及擬參選人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時間，去針對2008年1月的立委選舉作準備。

上會重視甚至以選票回饋的卻是經社程度愈低的選民。

而以政治涉入度而言，過去文獻在有關政治涉入度對於選民之所偏好以選區服務取向投票的影響方向係無定論，或謂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較積極去蒐集相關政治資訊、並主動與立委接觸、提供政治意見，故應較重視選區服務，而不依賴政黨指令或受到外在人際關係的影響；或認為政治涉入度低者則較關心攸關自我生活的切身利益，如選區服務，而政治涉入度愈高者，反而較重視並能理性判別政黨的作用，與其所提出的議題；但也有研究指出，所謂政治涉入度高者，只是由於具有強烈政黨認同、對政治抱有較高熱忱，遂傾向主動蒐集相關資訊，因此對政黨的偏好仍係較強。故為求徹底釐清國內有關政治涉入度高者的確切投票取向，本文亦將其設為主要解釋因素，同時並把有無政黨認同視為控制因素放入模型之中，以避免其干擾影響政治涉入度對選區服務的偏好。

至於以年齡來說，雖非本文探討重點，但因既有文獻曾指出其會影響選民投票取向，如年齡愈高的選民，愈傾向以選區服務進行投票抉擇，並較容易受到人際網絡的影響，且年齡愈高者其教育程度亦往往較不高（如受到時代環境或政府政策的影響，如國民義務教育的推行）、年齡愈低者的經濟能力則往往較弱（因尚在發展階段），故為了避免其影響到上述解釋因素對投票取向的關係，遂將其放入模型之中予以控制。

而以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來說，由於曾有文獻指出，在考量政黨認同之後，族群意識與統獨立場仍會影響選民投票取向，且唯有具備鮮明中國意識或臺灣意識，以及贊成獨立的選民，愈傾向以政黨因素投票，甚至可以凌駕選區服務等候選人因素，再加上此一意識形態的分歧可能會影響到政治涉入度高者的投票取向。故為了避免其干擾到解釋因素對投票取向的因果關係，遂將其放入模型之中予以控制。

由上可知，雖然多數文獻認為經社程度愈低以及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愈重視選區服務，但仍有文獻持有疑義，故本文為確切釐清偏好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結構，故將「教育程度」、「經濟水準」、「政治涉入度」視為個體層次選民特性的解釋因素，至於年齡、有無政黨認同、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雖非本文探討重點，但由於曾有文獻指出此些因素會影響選民投票取向，且可能會影響經濟水準、教育程度或是政治涉入度之於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故惟恐其干擾到解釋因素與分析標的之間的關係，遂將其均視為控制因素一一放入模型之中。

2、總體層次

本文有關總體層次環境系絡的解釋因素主要共分為三項，分別是「政黨競爭程度」、「產業結構」，以及「宗教動員力」，並將「泛綠政黨版圖」、「地理區域」視為控制因素。此部分亦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所在，茲述如下。

(1) 地方政治生態對投票取向的直接影響

以政黨競爭程度來說，過去研究發現，當選區政黨競爭程度愈高、選區政黨勢力呈現「膠著」狀態時，由於雙方在該區並不具備任何顯著地政黨優勢，此時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遂成為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所在，所有議題政見均會趨於一致以爭取選票的極大化，故候選人本身的形象遂易成為選戰中凸顯的焦點，以試圖吸引中間選民的選票，再加上，當政黨競爭程度愈高的同時，媒體對選情的關注程度亦會愈高，各方候選人遂無不絞盡腦汁地藉由攻訐、爆料或抹黑對手等方式，既能爭取媒體曝光率，亦可順便打擊對手形象，以爭取更多選民的注意與青睞。因此，當選區的選舉競爭程度愈大時，選民愈會傾向以候選人形象作為投票抉擇時的重要考量，反之，當競爭程度愈小時，由於在日常生活中易形塑利於該

政黨資訊傳播的政治氛圍，選民與該區立委或地方首長亦可能藉由選區服務的頻繁接觸，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關係，而使得選民愈容易傾向以政黨認同或選區服務進行投票抉擇。

而以產業結構而言，曾有研究認為，第二、三級產業愈多的高都市化地區，由於選民與政府的接觸愈頻繁，因而造成選民尋求選區服務的數目較多。如黃秀端（1994）曾指出，臺北市立委所收到的紅白帖即便較其他縣市立委來得多，但農村選區立委對選區服務的壓力卻遠比都會選區來得大，然而其主要是從立委角度解釋，認為臺北市立委因知名度較高，故慕名而來的人較多，而南部農村地區選舉因往往依賴樁腳與家族宗親，故其請託對立委的壓力自然較大，遂造成鄉下立委雖收到的紅白帖數量不多，但卻對「選區服務」的感受壓力較大。

然而筆者認為或許亦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蓋以選民來說，由於農村居民原本就較為重視人情與面子，並相信和看重國會議員所擁有的職權與影響力，遠比地方民意代表（如縣市議員）來得大，故在諸如婚喪喜慶等情事上，能否請到選區立委的蒞臨或是幫忙，遂對農村居民十分重要——不論以面子或是實質效益來說。因此相較於二、三級產業較發達的都會區居民而言，農村居民更為倚賴與重視立委的選區服務，並往往將其視為是日後進行投票行為的依據，故同樣是紅白帖等地方性活動事務，即便都會區因人口眾多，立委所收到紅白帖數量不免相對較多，但因農村居民比較重視，並將選區立委是否親力親為的處理態度視作日後投票抉擇的依據，遂使得農村選區立委感受選區服務的壓力反而遠較都市選區立委來得大；再加上農村地區相較都會區而言，本就因經社水準較差，資源相對短缺，人民接受訊息及自我救濟的管道與能力亦較少，故較倚賴與重視選區服務，因此整體來說，係由於農村居民較為重視選區服務，連帶使得鄉下選區立委不得不隨之重視選區服務。故本文認為，農牧產業結構應會使得其中選民更加重視選區服務，只是在第七屆立委改制之後，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如果實務上候選

人普遍重視選區服務，則產業結構是否還是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偏好態度，作為抉擇候選人的重要因素，即有待本文進一步檢證。

此外，以宗教動員力來說，誠如前文所言，其透過自身作為地方聚集與資訊傳播的功能，藉由居民與居民間、神職人員與居民間的互動過程，建立起一套人際關係網絡；且對地方神祇的崇拜，維繫或復甦了當地居民傳統價值與忠誠度，亦壯大了宗族網絡的力量，再加上其對信徒所擁有的宗教信仰力量，遂使其在地方上具有強大的宗教動員能力，不僅一則在地方上扮演重要的人際交流平臺，二則更可讓政治人物藉由對特定群體（即廟方與信徒）進行選區服務的方式來達到廣增票源的目的。

因此，本文之所以在此放入宗教動員力的主要原因在於，宗教動員力之所以對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偏好態度有所影響，在於政治人物常透過對特定群體（即廟方與信徒）進行選區服務的方式，以增加票源，然而在現今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在不不論個案服務的數量與性質都變得更多且更多元化的時代，政治人物是否還有心力主動透過對寺廟修葺或廟會活動的贊助，以試圖對廟方與信徒此些特定群體進行選區服務以增加票源，尤其耐人尋味。但即便宗教動員力在政治人物心中，喪失其以選區服務進行拉票的有利地位，仍然不排除會有選區服務優勢不如對手強的候選人（尤其是在行政資源上不具優勢的非現任者），希冀透過宗教所具有的人際網絡動員力量，藉以補強票源，因此，寺廟所具有的宗教動員力確實仍可能在地方上繼續發揮其「人際網絡」的動員優勢。故筆者之所以在本研究模型中除了產業結構之外，又放入宗教動員力此一解釋因素，目的即在於區辨宗教動員力在現今立委選舉中，是否僅是扮演人際交流平臺，透過人際網絡動員影響選民，亦或是仍具有讓政治人物以其選區服務吸引特定群體（即廟方與信徒）支持的價值，而讓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取向而投票。

而本文之所以將「泛綠政黨版圖」與「地理區域」作為總體層次的控制變項，以前者來說，主要原因在於其與本文主要解釋因素之一的「政黨競爭程度」關係甚大，蓋政黨競爭程度愈低，即意味著政黨版圖勢力愈鮮明，此時該政黨版圖傾向泛藍或泛綠，將影響政黨競爭程度對選民投票取向的作用，如過去研究曾指出，民進黨之所以在南部勢力屹立不搖，在於其係扮演了弱勢團體利益代理人的角色，故對南部農牧人口較多、經社水準居於劣勢、寄望改變現狀的地區選民較具吸引力。因此當其政治菁英憑藉政策訴求、選舉策略，甚至個人魅力以贏得選舉掌握公職之後，即可藉由施政與領導效能，刺激弱勢團體成員參與政治的意願，並激發與吸納部分潛在選民的認同和支持，而使得該區長久以來屬於民進黨的政黨版圖。此外，實務上民進黨黨內高層人士亦曾指出，民進黨之所以在南部農業縣市具有優勢的政黨版圖，一則是農業社會民眾有志氣，賄選拿歸拿、但投歸投，故都支持民進黨，二則係黨公職經營基層的成果。⁵⁰可見當政黨競爭程度低、但係屬泛綠政黨版圖時，相較於泛藍政黨版圖來說，選民似有更高的可能性因著該區在長期民進黨執政優勢下所奠立的選區服務優勢，而傾向以選區服務為投票取向，投給泛綠候選人。因此，為避免政黨版圖屬性（即泛藍或泛綠）干擾了政黨競爭程度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效果，筆者遂將「政黨版圖」視為是總體層次的控制因素，藉以排除其干擾效果。

而以後者來說，本文之所以將地理區域視為控制因素原因在於，過去研究雖曾指出地理區域似乎會對選民之於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造成影響，但卻有不少研究亦指出，地理區域之所以看似對投票取向造成影響，根本原因在於產業結構。

⁵⁰ 申言之，2012年總統大選的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蘇嘉全亦曾言明，南部的農業縣市相對於都會區來說已成為民進黨的得票重鎮，蓋一則「現在農業社會民眾有志氣，賄選拿歸拿、但投歸投，故都支持民進黨。」二則「南部的轉變是黨公職經營基層的成果，例如嘉義縣，議會、鄉鎮市、農漁會等，民進黨掌握過半數，縣議會正副議長都是民進黨籍，屏東縣也相似。」截錄自自由時報電子報，2012/2/2，網址：

http://www.coa.gov.tw/show_news.php?cat=show_news&serial=coa_diamond_20110923185939。

如黃秀端（1994）該文雖發現南部選民較重視選區服務，但其主要指涉對象實際上是南部農村，且係以農村生活形態與民情為解釋的出發點。至於其他同樣發現地域差異會影響投票取向的相關文獻，多半也是未考量產業結構。因此筆者認為，真正會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投票的關鍵因素仍在於「產業結構」，只是國內農村剛好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區，故為了確切釐清兩者間之關係，亦避免地理區域會影響產業結構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效果，遂將其視為控制因素放入模型之中。

由上可知，雖然曾有文獻認為政黨競爭程度、產業結構以及宗教動員力會影響該區選民對選區服務相較其他投票取向的偏好態度，但在改制後的今天，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此些環境系絡因素是否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則有待進一步探討。故本文為確切釐清究係是哪些環境系絡因素會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投票，故將「政黨競爭程度」、「產業結構」、「宗教動員力」視為總體層次選區環境的解釋因素，至於泛綠政黨版圖以及地理區域的差異，雖非本文探討重點，但由於曾有文獻指出此些因素會影響選民投票取向，且可能會干擾到解釋因素與分析標的之間的因果關係，故將其均視為控制因素一一放入模型之中。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曾指出，候選人是否現任相當程度地會影響選區服務的成效，蓋其能夠運用其公職身分與其行政資源，透過關說、遊說等方式進行肉桶立法以及解決選民紛爭等服務，具有所謂「現任者優勢」，照理說本文應將「該選區是否有現任候選人參選」的情形當作控制因素考慮進去，但由於第七屆立委選舉係立委減半後之單一選區制的第一屆，導致所有選區不論黨派均有現任民意代表參選，因此基於各選區在是否具有現任者上的立基點相同，無區分比較的實益，故本文便不再將其納入模型之中予以控制，特此合先敘明。

（2）地方政治生態對投票取向的間接影響

雖然過去鮮少實證研究探討環境系絡如何間接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投票，但理論上此種影響確實有可能存在，找出此些影響機制將有助於釐清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之間的關係。故筆者將此部分焦點主要是放在產業結構與宗教動員力對於選民之所偏好人際網絡相較選區服務投票取向的間接影響效果，並將分析觸角聚焦於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愈高者的投票取向上，俾藉由探求比較此種類型選民在現代立委選舉中，之所偏好人際網絡或選區服務投票，其所受到環境系絡影響的因素，來進一步凸顯選區服務究係在哪種情境下才能更深入地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亦可順便釐清在經社環境變遷、地方派系式微後的今天，能確實發揮人際網絡動員影響力的主要媒介究係是產業結構亦或是宗教動員力，而其與選區服務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而之所以針對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此兩類型的選民，主要原因在於曾有文獻指出，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其自我判斷能力與自主性愈強，故愈不容易受到周遭親友的影響，但其也較不容易被強調特殊利益的選區服務所打動。可見在此些選民心中，其對人際網絡相對於選區服務投票取向的態度差異，值得玩味，故誠可透過產業結構、宗教動員力與此些選民的互動關係，凸顯產業結構、宗教動員力所具有的系絡效果，因此筆者將其一併納入模型之中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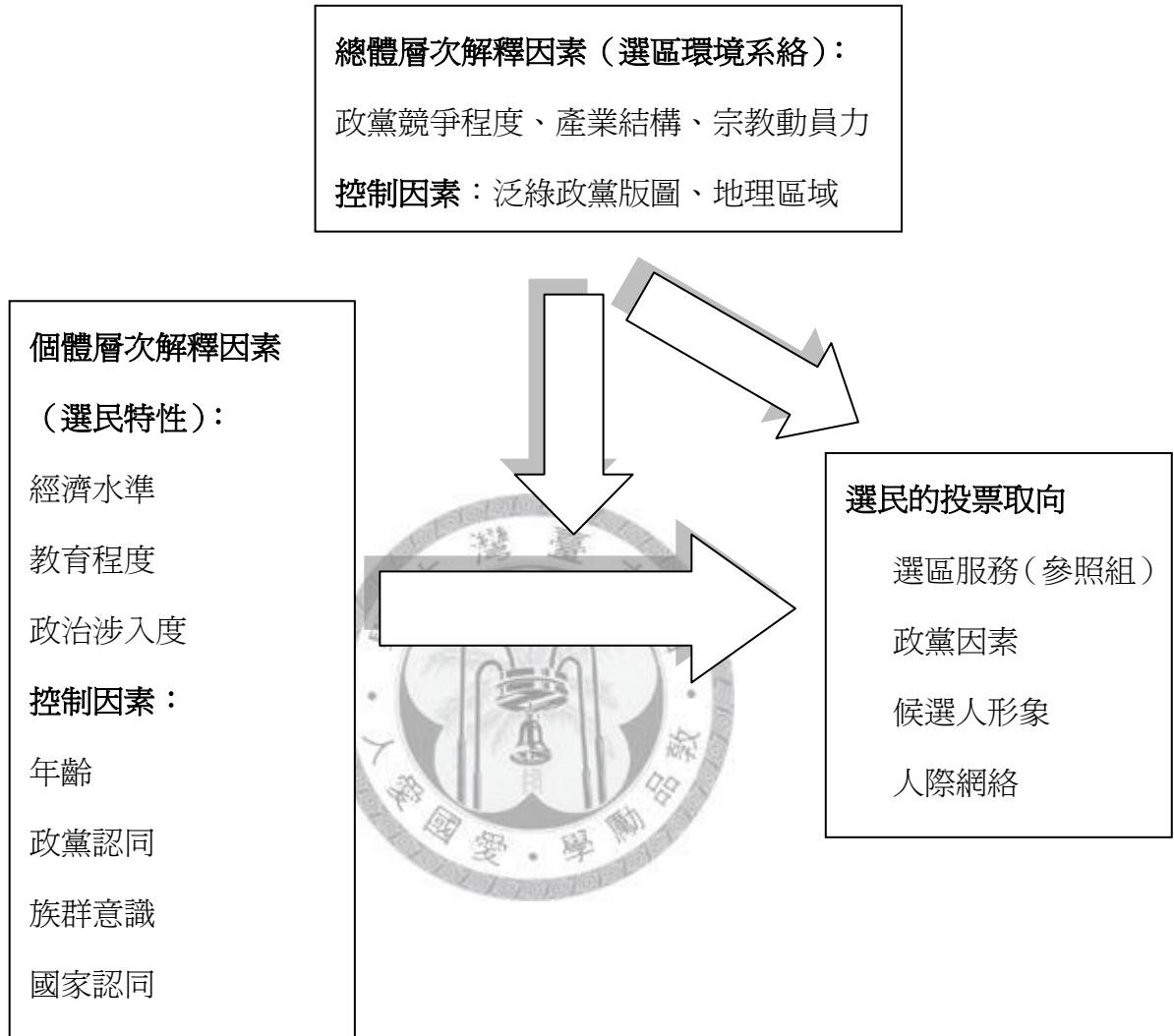
至於其間的因果關係，筆者認為，雖然農村地方選民較為重視人際網絡與選區服務，但由於農村地區中成員流動率較低，容易形塑較為封閉、地域性色彩較重的小生活圈，故對異議聲音的包容性可能較低；再加上農村地區居民本就不習慣主動對政治事務表達看法，除非刻意提及，否則日常話題多半不會圍繞著政治事務。因此，農村的人際網絡型態如要能對投票行為發揮顯著影響力，應以其中居民是否平常即「主動頻繁地討論政治」作為前提要件，故農牧產業結構所帶來人際網絡動員的影響力，應在政治涉入度高的選民身上較明顯——尤其當該選民的政治傾向迥異於週遭聲音時，因農村地區對異議聲音的包容性亦較低，遂使得

人際網絡更容易以「群體壓力」的形式，對政治涉入度高的選民發揮影響力。而對不一定熱衷政治的選民來說，如教育程度愈高者，由於其本就不必然常常與人討論政治，再加上自主性較高，故透過人際交往溝通而影響投票取向的可能性遂較低。

而就宗教動員力來說，過去文獻指出，透過宗教信仰或是宗教活動，可凝聚地方意識，使其所具有的社會動員能力較強，不僅一則可在地方上扮演重要的人際交流平臺，二則更可讓政治人物藉由對特定群體（即廟方與信徒）進行選區服務的方式來達到增加票源的目的。然而誠如前文所言，即便在現今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宗教動員力在政治人物心中，有可能喪失其以選區服務進行拉票的有利地位，但其所具有的另一個「人際網絡」動員優勢，繼續存在的機率卻相對較高。故對於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來說，應會使其愈加重視人際網絡因素。惟尚有文獻指出本土宗教動員在整合之餘，亦具有所謂的包容性，筆者也認為，就臺灣來說，由於此動員力係屬宗教信仰，應不至於會迫使本身已對政治熱衷、具有定見的選民，改變其投票行為，但這一切仍處於筆者自行推論的階段，故有待進一步的檢證。

綜觀來說，本文欲透過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四大類型分析，釐清選區服務作為眾多投票取向之一，究係是何原因影響選民是否以選區服務作為抉擇立委人選的主要考量，故就選民特性來說，以「經濟水準」、「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三項，作為個體層次的解釋因素，而就選區環境系絡而言，則以「政黨競爭程度」、「產業結構」，以及「宗教動員力」作為總體層次解釋因素，並把其他可能會影響解釋因素與分析標的間因果關係的因素，但非本文關心重點者視為控制因素，如個體層次選民的年齡、有無政黨認同、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以及總體層次選區的泛綠政黨版圖、地理區域，並把總體環境系絡的直接與間接效果視為分析重點，俾釐清本文研究主旨。本文整體的研究架構如下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說明：箭頭方向表示概念間的因果關係。

資料來源：該表為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第二節 研究資料

本文此處分成兩大部分，先介紹使用資料的來源出處，再敘及有關多層次模

型下資料樣本結構的適度調整，茲述如下：

(一) 資料來源

就個體層次來說，係採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針對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選後面訪（簡稱 TEDS2008L）的追蹤樣本，共計訪問 47 個選區，1380 份有效樣本數；⁵¹而總體層次資料則取自行政院內政部，以及中央選舉委員會公開提供的資訊。⁵²然而由於多層次模型分析涉及跨層次效果，故樣本結構較為複雜，而為降低因樣本數不足所可能導致的偏誤，故其實際可用選區數及樣本數有重新調整的必要，以下會對此進行詳細的說明。

(二) 資料樣本結構的調整

大體來說，一般學者認為，就多層次分析的樣本結構而言，可援用中央極限定理下的大樣本原則，即採用 30/30 準則，⁵³亦及總體層次不少於 30 組，且每組不少於 30 人（Kreft, 1996），而 Bassiri（1988）、Van der Leeden 和 Busing（1994）亦認為，為獲得理想跨層級交互作用的檢定力，至少總體層次需 30 組，每組要 30 個觀察值。⁵⁴但考量到實際成本，為平衡其與檢定力間之消長難題，有學者利用模擬實驗進一步指出，提高組間樣本數相較提高組內樣本數來說，可獲致較小的偏

⁵¹ 其係從 2004 年立法委員舉選後面訪調查（TEDS2004L）之 2507 份成功樣本全數進行追蹤訪問而來，共計成功訪問 47 個選區，1380 份有效樣本數。

⁵² 值得說明的是，由於此次區域立委選舉的選區劃分係依據縣市人口比例進行，故選區範圍有涵蓋完整單一縣市者（例如：基隆市、花蓮縣等）；亦有在縣市內僅跨及數個完整鄉鎮市區者（例如：臺南市第四選區中的永康市、仁德鄉、關廟鄉、歸仁鄉）；甚至尚有考量人口比例而涉及不同鄉鎮市區中個別村里者，進而造成同一個鄉鎮市區分屬不同選區的情況（例如：臺北市第一選區包括「北投區」及「士林區 13 個里」）。而為解決此種單一選區制下選區劃分涉及行政區劃不一致的情形，原本最適合計算方式係以村里資料針對選區進行加總合併，但考量以村里為計算單位的資料僅 2000 年人口普查提供，距今調查時間過久，故以最近可獲得之人口調查資料，依據選區內各鄉鎮市區或村里所佔選舉人口比例作為權值進行調整，以當作總體層次的資料結構。

⁵³ 前者為總體層次組間樣本數（在本文即選區），後者則是個體層次組內樣本數（在本文則是選區內所抽選人數）。

⁵⁴ 但同時他們也發現，透過組間與組內樣本數的調整亦可達到相當理想的檢定力，如 60/25、150/5，換言之，倘若較重視的是隨機效果檢驗的話，可藉由放寬組間樣本數和減少組內樣本數的方式。

誤與較佳的效能 (Bassiri, 1988; Mok 1995)。如若針對跨層級效果來說，在組數大於 20，且組內樣本數不會太少的情形下，即可達到足夠的檢定力。

惟上述文獻皆於既定設定下（如固定效果、隨機效果或是標準誤不偏情形下的檢定力要求）所作的模擬推論，故沒有一個判定標準或通則，仍須視實際研究設計需要而定，不過大致來說，第二層樣本數在多層分析中係為較重要因素（溫福星、邱皓政，2011）。蓋一則考量到估計法，就第二層誤差項變異數與共變數的估計來說，依最大概似法定義，隨機效果的變異數估計值，其抽樣分配須在大樣本之下，依中央極限定理才能趨近於常態分配，故樣本數最好 30 組以上。二則當第一層平均樣本數越大時，則很小的「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簡稱 ICC）⁵⁵即可造成很大設計效果（design effect）⁵⁶，使得有效樣本數驟減，因此造成檢定力不大（溫福星、邱皓政，2011）。

而由於本文使用的 TEDS2008L 追蹤樣本其組內樣本數實際上大小不一，最小者 1 筆，最大者 88 筆，因此，為兼顧檢定力與估計法，並考量到本文以總體系絡效果與其和個體選民特性的交互作用效果為探討核心，故將著重第二層組間樣本數大小，遂將組內樣本數設定至少 20 筆以上（即個體層次上每個選區至少抽 20 人），而將組數設定至少 30 筆以上（即總體層次至少抽 30 個選區）。而最後以總樣本 1195 筆、共 33 個選區，進行估計分析。

⁵⁵ 組內相關係數係用來衡量組內資料的相依程度，代表任一群體（class 或 group）內任兩位受試者，其結果變項間相關的期望值，故其目的在於檢驗資料是否違反獨立性假設，蓋其會導致型一錯誤（Type I Error）增加，進而高估自變數在假設檢定上的顯著效果（Hox, 2002；Steenbergen and Jones 2002, 219-20）。

⁵⁶ ICC 與樣本大小的關係相對於完全獨立樣本的設計效果為： $\eta = 1 + (\bar{n}_j - 1) \times ICC$ ，其中， \bar{n}_j 為平均組內樣本數，其設計效果的含意是當在集群抽樣設計且存在組內相關時，若想所抽取的組內樣本數 \bar{n}_j 達到完全與 \bar{n}_j 個獨立樣本同樣效果的話，須將樣本增加至 η 倍。換言之，由於 ICC（組內樣本相似性指標），使得 \bar{n}_j 個樣本數所提供的資訊大打折扣，故會對迴歸係數的標準誤產生影響，使其真正標準誤為忽略組內相關時的 η 倍（Kish, 1995）。Hox 即曾引用 Tate and Wongbunhit（1983）實驗結果指出，「組內相關」的忽略雖並不會使得迴歸係數估計產生偏誤，但卻會因為膨脹型一錯誤而造成虛假顯著性結果，而傾向拒絕虛無假設（Hox, 1998）。

第三節 變數建構與測量

以下即針對本文依變項與自變項分別作相關變數建構與測量上的說明。

(一) 依變項

誠如前文所提，本文參照過去學者說法，將選民投票決定的原因視為投票取向的概念型定義。而誠如徐火炎所言（2005），猜測與推定「原因為何」往往是不得以的方法，為了避免對投票取向的基本歸因偏誤⁵⁷，直接了當地去問投票的選民，才可獲得真正與明確的答案。自是，筆者以「選民投予所選立委候選人的主要原因」作為衡量選民投票取向的操作型定義，遂將原本 TEDS2008L 追蹤樣本問卷中有關詢問受訪者「請問您投給這位候選人的主要原因是什麼？」（第 L01D 題）此一開放式問項，參酌實際觀察資料的回答情形，將問項內容依據「選區服務」、「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以及「人際網絡」四大性質加以建構，說明如下：

第一、「選區服務」，係指民意代表為選區選民所作的任何有關利益回饋的工作，因此，問卷中諸如回答「增進地方繁榮」、「做得不錯」、「照顧百姓」、「參加地方活動」、「選民服務」等屬於候選人為「地方選區選民」所作的任何一切行爲，均劃歸為候選人選區服務投票取向底下。

第二、「政黨因素」，主要係指包含政黨認同、特定政黨不認同等情感連繫以及政黨議題等任何有關政黨的考量因素。因此，問卷中諸如回答「支持所屬政黨」、「讓民進黨或國民黨擁有更多席次」等屬於政黨認同者，與「爲了排除其

⁵⁷ 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係指當我們解釋別人的外在行動時，高估個人內在情境，而低估外在社會情境的效應（Ross, 1977: 183）。對此一般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人們之所以會強調行爲的個人因素而忽視情境因素，是因為個人的內在因素比情境因素更突出，更顯眼，更易引起人們的註意。將活動結果歸因於活動者個人的特質反映了人們的一種自然的、習慣性的認識傾向；另一種解釋則認為，人們傾向於作出個人歸因，是由於社會對該種歸因的鼓勵和贊許的態度使然。

他黨」等屬於特定政黨不認同，以及「愛臺灣」、「爲了入聯」、「政黨輪替」、「兩黨制衡」等屬於「政黨議題」者，均劃歸於政黨因素投票取向底下。

第三、「候選人形象」，即「因人投票」(personal vote)中，有關候選人魅力與魄力、正直、清廉、誠信、親和力、問政能力以及包括外表、風格和學經歷等個人背景以及候選人所提議題政見等。因此，問卷中諸如回答「清廉」、「學經歷夠」等個人學識特質、與「有知名度、辨識度」、「不會賄選」、「印象好」等風評形象、和「能力佳」、「專於法案研究」等專業問政能力，以及「政見滿意」、「政治理念看法一致」等屬於候選人議題政見者，均劃歸於候選人形象投票取向底下。

第四、「人際網絡」，指的則是包含藉由私人與社會關係請託影響以及單純因爲某些共同特徵而來的主觀心理認同，因此，問卷中諸如回答「家人都支持」、「所屬團體支持」等屬於人際壓力影響者，與「認識候選人、有交情」、「有人脈」、「他人推薦」等基於人情關係者，以及「在地人」等因共同特徵而來的認同支持者，均劃歸於人際網絡投票取向底下。⁵⁸

至於其他諸如個人特殊原因或是難以判斷分類的，如問卷中回答「沒有原因」、「宗教因素」、「希望未來比較好」以及「對本身職業有利」、「文宣、宣傳」等，由於筆者無法推斷係基於候選人形象或是地方選區服務、甚或是政黨因素而來的投票取向，爲謹慎起見，一律視爲遺漏值。而有關全部完整的詳細內容分類則請參閱附錄二。

⁵⁸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將受訪者回答「走路工」(僅一位)者，亦劃歸於人際網絡投票取向，主要係基於誠如本文前面有關人際網絡概念型定義所言，因中國人基於民族性，往往由於有事相託，而習慣施以小惠作爲答謝，故人際網絡動員過程中是否有無物質利益交換係非重點，蓋真正打動選民投此一票的往往不是表面的禮尚往來，而是人際交往過程中的從眾心理、資訊偏差，甚至是一種信任與信用。因此，以走路工來說，之所以發予報酬，主要在於感謝其特地前往投票而來的人情酬謝，故走路工之所以發揮催票或拉票功能主要在於人際交往過程的人情關係，而非那禮尚往來的小利小惠。

(二) 自變項

以下則針對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所涉及的變項作相關定義與說明，並整理如下表 3-2、3-3：

1、個體層次

(1) 年齡

過去衡量年齡的操作型定義主要有兩種，一為計算受訪者實際年歲，二為考慮不同時代所具有特定政治氛圍與歷史背景，而將實際年歲進一步依據特定年代區分為不同「政治世代」的方式。而本文因僅在探討年紀高低對投票取向的影響，為避免類別變數的分類數額外耗費自由度，故偏好以前者計算受訪者實際年歲此一連續變數的形式作為衡量年齡的操作型定義，遂將原本 TEDS2008L 追蹤樣本問卷中詢問受訪者「民國幾年出生？」的原始問項（第 X01 題），以民國 97 年相減，計算出實際年齡，至於無回答者則視為遺漏值。

(2) 教育年數

過去衡量教育程度的操作型定義主要有兩種，一為計算受訪者受教年數，二為視研究需要分為特定幾類的教育程度，最常見的為低教育程度（包括國中小以下）、中教育程度（包括高中職）與高教育程度（包括專科、大學以上）三分類。而本文因僅在探討教育程度高低對投票取向的影響，為避免類別變數的分類數額外耗費自由度，故偏好以前者受教年數此一連續變數的形式作為衡量教育程度的操作型定義，遂將原本 TEDS2008L 追蹤樣本問卷中詢問受訪者「教育程度是什麼？」的原始問項（第 X06 題），依各階段的教育年數轉碼，分別是「不識字」、

「識字但未入學」為教育年數 0 年，「小學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6 年、「國／初中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9 年、「高中／職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12 年、「專科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14 年、「大學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16 年、「研究所」為教育年數 18 年，其餘訪員漏問與拒答者計為遺漏值。

（3）收入

過去衡量經濟水準的操作型定義主要有兩種，一為詢問受訪者個人的薪資所得，二為詢問受訪者的每月總收入。而本文考慮到問卷中僅有家庭月收入此題足以體現受訪者經濟水準，遂援用此「家庭月收入」作為衡量經濟水準的操作型定義，而把原本 TEDS2008L 追蹤樣本問卷中有關詢問受訪者「請問您家庭每個月總收入大約是：（包括薪資以外的其他收入，如房租、股利等等）」的問項（第 X14 題），依序編碼為：家庭月收入大約在 36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1，在 36001 元到 47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2，在 47001 元到 5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3，在 58001 元到 65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4，在 65001 元到 7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5，在 78001 元到 8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6，在 88001 元到 10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7，在 108001 元到 13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8，在 138001 元到 15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9，在 158001 元以上者編碼為 10，其餘計為遺漏值。

（4）有無政黨認同

在介紹有無政黨認同的操作型定義之前，須先對過去衡量選民政黨認同的操作型定義有一初步地瞭解。其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為傳統上依照在立法院擁有席次或活躍於政壇的政黨分類，歸納為「國民黨政黨認同」、「親民黨政黨認同」、「新黨政黨認同」、「民進黨政黨認同」、「台灣團結聯盟黨政黨認同」、以及

「無穩定政黨認同」六大類，或者視當屆選舉前是否有政黨事先協調統一提名，而依狀況予以適度調整歸併（蕭怡靖、黃紀，2010a）。至於第二類的作法則是將主要政黨歸類為「泛藍」、「泛綠」、以及「中立無偏向」三大面向，前者以國民黨為主，包括親民黨與新黨，後者則以民進黨為代表，包括台灣團結聯盟黨與建國黨。

而本文因主要衡量的概念是「有無穩定政黨認同」，故為了避免類別變數的分類過多而造成自由度的無謂耗費，再加上誠如徐火炎（2005）所言，由於台灣的政黨傳統尚不深厚，即便對特定政黨有所偏好，亦往往不輕易表達，且自 2004 年之後，台灣政壇開始出現所謂「泛藍」與「泛綠」的分別，這樣的政黨聯盟之選舉競爭，無疑地更把選民對各政黨的情感、族群與政治立場等分歧，皆化約投射到同一面向的「泛藍與泛綠」陣營的認同上。因此，筆者認為將具體對各政黨的認同化約為對泛藍、泛綠陣營的政黨認同，並以此反面（即無泛藍、泛綠政黨認同）來探求受訪者是否具有穩定政黨認同，或許更能體現選民實際上是否具有穩定黨派傾向，遂以此作為衡量選民有無政黨認同的操作型定義。

自是，筆者將原本 TEDS2008L 追蹤樣本問卷中詢問有關受訪者泛藍與泛綠傾向的兩題問項，分別是「我們社會上經常有人用「泛藍」與「泛綠」來區分選民的政治傾向，請問您覺得自己是屬於泛藍還是泛綠？」（第 S06A 題）以及「如果您不覺得自己屬於哪一邊，請問您覺得自己比較偏向泛藍還是泛綠？」（第 S06B 題）結合轉碼成對「有無政黨認同（不論泛藍、泛綠）」測量的虛擬變項，其中，將「有屬於或偏向泛藍、泛綠傾向者」視為「有政黨認同」者，編碼為 0（參照組）；將「無屬於或偏向泛藍、泛綠傾向者」則視為是「無政黨認同」者，編碼為 1（觀察組），其餘設為遺漏值。

（5）政治涉入度

誠如前文所言，關於「政治涉入度」的變項建構，因歷來文獻主要聚焦的重點在於受訪公民是否擁有參與政治事務的興趣動機、資訊以及相關的能力技巧，故舉凡「教育程度」、「選舉訊息的接觸」（如閱讀平面新聞、報章、觀看或收聽電視及廣播等）、「參與選舉活動」（如參與後援會或造勢活動等）、「政治興趣」、「政治關心」、「是否與人討論政治或其討論的頻率」、「政治知識」、「是否遊說他人」等皆曾作為其測量的綜合指標之一，只是因著實際資料蒐集的限制或是研究目的而有不同的指標選擇。故本文主要是參考徐火炎（2005）在對2004年總統大選研究中，藉由「政治討論」、「政治關心」、「遊說他人」、「政治知識」、「選舉訊息的接觸」所建構出的認知動員綜合指標，並刪掉「遊說他人」，增加「選舉活動的參與度」此類能夠體現選民對選舉活動的熱忱指標。其中，「選舉訊息的接觸」指的是對報紙以及電視上選舉新聞的注意程度，而「選舉活動的參與度」則包括閱讀選舉公報、參加候選人的後援會或餐會活動等。蓋筆者認為政治涉入度高者，係指選民是否擁有參與政治事務的興趣動機、資訊以及相關的能力技巧，故主動參與選舉活動、瞭解政治事務之餘，卻未必會激進到進一步對他人進行政治遊說，故將「遊說他人」予以刪除。

自是，筆者以四步驟進行處理，第一、先將原本 TEDS2008L 追蹤樣本問卷中有關詢問受訪者「另外，請問您在這次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有沒有從事（台：做）下列活動？」（第 B05_1 到 B05_9 題）的問項中，⁵⁹有參加九項活動中任何一類活動的編碼為 1，無則編碼為 0，再計算每一受訪者總共參加多少項活動（最少者係皆無參加的為 0、最多者則為九項均參加為 9），以視為測量受訪者「選舉活動參與度」的變項。

⁵⁹ 分別是「1. 閱讀選舉公報」、「2. 閱讀候選人的傳單、快報或報刊廣告」、「3. 觀看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或政見發表會」、「4. 擔任候選人或政黨的助選工作人員或義工」、「5. 參加為候選人而舉辦的集會或餐會等活動」、「6. 參加候選人的後援會」、「7. 提醒親友觀看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或政見發表」、「8. 與他人談論候選人的優缺點」，以及「9. 捐款（包括購買餐券、紀念品）」九題。

第二、其次將問卷中關於測量受訪者政治知識的問項（第 K01 到 K05 題），⁶⁰答對者編碼為 1，答錯、拒答與不知道者則編碼為 0，再計算每一受訪者總共達對多少題目（最少者係皆無答對、拒答或不知道的為 0、最多者則為五項題目均達對者為 5），以視為測量受訪者「政治知識」的變項。

第三、再將「請問您對於這次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是非常關心、有點關心、不太關心，還是非常不關心？」（第 B02 題）、「這次立法委員選舉期間，請問您在看報紙時，對選舉新聞是非常注意、有點注意、不太注意，還是一點都不注意？」（第 A01 題）、「這次立法委員選舉期間，請問您在看電視時，對選舉新聞是非常注意、有點注意、不太注意，還是一點都不注意？」（第 A03 題）、「請問您平時會不會與人討論有關政治或選舉方面的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第 B01 題）四道題目皆先轉碼成一致的順向題，如第 B02 題中「4. 非常不關心」轉碼為 1、「3. 不太關心」轉碼為 2、「2. 有點關心」轉碼為 3、「1. 非常關心」轉碼為 4，其餘題目作法以此類推。

第四、最後再以因素分析將上述六道題目整併為一測量「政治涉入度」的綜合性指標。有關因素分析結果見下表 3-1。

表 3-1 「政治涉入度」的因素分析整理表

測量指標	政治涉入度
	因素負荷量係數
政治討論	0.625
政治關心	0.679
政治知識	0.393
對報紙上選舉新聞注意程度	0.730
對電視上選舉新聞注意程度	0.724

⁶⁰ 分別是「請問現在的副總統是誰？」、「請問現在的美國總統是誰？」、「請問現在的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是誰？」、「請問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以及「請問這一屆選出的立法委員一任幾年？」五題。

對選舉活動的參與	0.508
特徵值	2.891
解釋變異量%	48.178
KMO 指標	0.826
Sig. of Bartlett's Test	.000
有效樣本數	783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Ⅲ）：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數據係作者自行計算所得。

（6）族群認同

過去衡量選民有關族群意識的操作型定義主要係探求其關於自我族群的認同類型，本文亦不例外，故仍援用原本 TEDS2008L 追蹤樣本問卷中有關詢問受訪者「在我們（台語：咱）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第 N01 題）此問項，直接依據受訪者答案區分為「台灣人」、「中國人」、「都是」三類，但由於回答「中國人」者比例過少，遂將其與「都是」合併，再將其轉碼為虛擬變項形式，即回答「中國人或都是」為 1（觀察組）、回答「台灣人」為 0（參照組），其餘則設為遺漏值。

（7）統獨立場

過去衡量選民有關國家認同的操作型定義主要係探求其關於國家未來的統獨走向，本文亦不例外，故仍援用原本 TEDS2008L 追蹤樣本問卷中有關詢問受訪者「關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這張卡片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1、儘快統一；2、儘快獨立；3、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6、永遠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第

P01 題) 此一問項，並考量到選項類別過多恐導致單一類別樣本數過少，故先將其整合歸併為三大類，即回答「儘快統一」及「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者歸併為「傾向統一」，回答「儘快獨立」及「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者歸併為「傾向獨立」，至於回答「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以及「永遠維持現狀」者則歸併為「傾向維持現狀」。最後再將其轉為虛擬變項形式，並分別以「傾向統一」為 1 (觀察組)、「傾向獨立」為 1 (觀察組)、「傾向維持現狀」則為 0 (參照組)，其餘則設為遺漏值。

2、總體層次

(1) 政黨得票率邊際差

傳統上對於政黨競爭程度的測量方法，大體可分為兩種途徑，第一種是計算政黨在選舉中的競爭強度(可視為政黨版圖概念)，如針對特定層級的選舉，計算該次政黨得票數/率或歷次同級選舉的政黨平均得票數/率(Cox, 1960; Ranney, 1965; King, 1989)，亦或是計算所有主要公職選舉中，政黨的得票平均數/率(Ceaser and Saldin, 2005: 246)；而第二種則是計算政黨在各種選舉中的接近性(closeness)(即政黨得票的差距)(張佑宗、湯晏甄，2010)，如藉由主要競爭者的得票比率邊際差(marginality)(即當選者之得票率減去第二高票者之得票率)來計算彼此實力的競爭程度，故當得票比率邊際差越小，選舉結果即越接近，競爭程度亦愈大。但在計算時點上，有學者認為藉由當屆選舉結果而來的「事後預測」(ex post)並不合理，蓋選舉結果是發生在選民投票之後，故在因果關係上不宜以「後發生」的事實當作「先發生」行為的因，遂提出應以「事前預測」(ex ante)的方式，如以「前一次選舉結果」的得票情形或是候選人「當次選舉競選支出」等來建構(Reed, 1999)。

因此，本文基於研究需要，為求兼顧衡量政黨競爭程度以及政黨優勢方向在理論和模型估計上的精確性，⁶¹遂採取政黨的得票率邊際差，作為衡量政黨競爭程度的操作型定義，並為了避免「事後預測」(ex post)導致實證資料上的因果錯置，而以「前一屆」立委選舉的政黨得票率作為計算標的。

自是，筆者以中央選舉委員會 2004 年第六屆不分區立委選舉資料庫中，泛藍扣掉泛綠的得票率差，並加絕對值，作為計算政黨得票率邊際差的作法，以衡量該選區政黨競爭程度大小，因此，當該數值愈小時，即意謂政黨競爭程度愈大，泛藍、泛綠彼此愈勢均力敵（即所謂「膠著區」），反之，如數值愈大，即表示政黨競爭程度愈小，該地所具有的某一政黨優勢愈明顯。

(2) 泛綠政黨平均三屆得票率

過去衡量泛綠政黨版圖的操作型定義主要有兩種，一為直接計算前一次選舉的該政黨得票率；二為計算前幾次同一選舉中，該政黨的得票率。而筆者為避免特殊歷史事件影響到該次選舉的政黨正常得票情形，遂採取第二種方式，以前三次同一選舉中的泛綠政黨平均得票率作為衡量泛綠政黨版圖的操作型定義。自是，筆者以中央選舉委員會第四、五、六屆不分區立委選舉資料庫中的三屆泛

⁶¹ 進言之，政黨競爭程度體現的是政黨勢力之間的差距，雖然亦可藉由政黨得票率此一絕對數值來間接顯示，但基於本文研究需要，後者較適合拿來當作「政黨版圖」的衡量指標，以凸顯政黨優勢的「方向」（如係屬泛藍或泛綠），故本文以政黨的接近性指標，作為衡量政黨勢力相對差距的政黨競爭程度（本文主要解釋因素），而以泛綠政黨得票率作為衡量泛綠政黨版圖的方向（本文的控制因素）。值得一提的是，理論上雖或可藉由計算政黨的得票差距，並保留正負號的方式，以同時兼顧凸顯政黨競爭程度與政黨優勢方向兩種特性，但就統計模型上的係數估計角度來說，此指標（如以泛藍減泛綠得票率）僅可以體現當變項數值的正值愈大時，意謂泛藍勢力愈大，泛綠勢力愈小（屬於泛藍政黨版圖），此時政黨競爭程度小，反之，當變項數值的負值愈離開原點時，則意謂泛藍勢力愈小，泛綠勢力愈大（屬於泛綠政黨版圖），此時的政黨競爭程度還是小，雖區分了政黨勢力的方向，但卻無法準確計算當兩黨勢力接近時（即變項數值接近原點），在政黨競爭程度大的情形下，其對分析標的（本文即投票取向）的影響。故本文在此採取政黨接近性指標作為政黨競爭程度的操作型定義，而將泛綠政黨得票率作為衡量分析模型中另一個控制因素——泛綠政黨版圖——的操作型定義。

綠得票率為計算標的，並取其平均值。因此當數值愈小時，即代表該選區泛綠的平均三屆得票率愈高，其政黨版圖愈大（換言之，即意謂著泛藍的平均三屆得票率愈低，其政黨版圖愈小），反之，如數值愈小，即表示該選區泛綠的平均三屆得票率愈低，其政黨版圖愈小（亦即泛藍的平均三屆得票率愈高，其政黨版圖愈大）。

須注意的是，本文之所以分別定義「政黨競爭程度」以及「泛綠政黨版圖」變項的操作型定義，而不以 2004 年不分區立委選舉中，泛藍扣掉泛綠的得票率差，並保留正負號的方式，作為同時衡量政黨競爭程度與政黨版圖的指標，係在於即便保留正負號，但由於具有方向性，因此就統計模型上的係數估計角度來說，此指標（如以泛藍減泛綠得票率）僅可以體現當變項數值的正值愈大時，意謂泛藍勢力愈大、泛綠勢力愈小（屬於泛藍政黨版圖），此時政黨競爭程度小，反之，當變項數值的負值愈離開原點時，則意謂泛藍勢力愈小、泛綠勢力愈大（屬於泛綠政黨版圖），此時的政黨競爭程度還是小，雖區分了政黨版圖（即政黨優勢的方向），但卻無法準確計算當兩黨勢力接近時（即變項數值接近原點），在政黨競爭程度大的情形下，其對分析標的（本文即投票取向）的影響。

自是，即便在政黨得票率邊際差的計算上，保留其正負號，理論上固可反映係屬泛藍或泛綠的政黨版圖，以及政黨勢力的差距，但實際統計分析時，由於無法從中間截取並獨立分析當變項數值愈接近 0 時，所代表政黨勢力彼此愈接近時的「膠著」貌；且同理，如光以泛綠平均得票率作為其政黨版圖指標，亦無法體現並獨立分析當該黨勢力愈接近中間點 50% 時（即泛藍、泛綠彼此勢力愈接近時），其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因此，本文遂分別定義「政黨競爭程度」及「泛綠政黨版圖」兩因素各自的操作型定義，一則為觀察當選區中是否存有優勢政黨，其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即政黨競爭程度指標），二則亦可觀察並控制假使有所謂優勢政黨存在時（即當政黨競爭程度愈小），其版圖屬性——利於泛藍或泛綠——對投票取向所可能帶來不同程度的干擾影響。

(3) 農牧人口比例

傳統上對於產業結構的衡量方式，大多為計算某一產業的人口比例，本文亦不例外，而以農牧產業人口比例為操作型定義，蓋其不僅較能體現一地產業發展結構，更可彰顯社會經濟發展的高低與人際關係較緊密此種居住生活型態。

自是，筆者以 2005 年行政院主計處的「9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縣市鄉鎮資料查詢系統」中各鄉鎮的農牧戶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再以各選區中該鄉鎮選舉人數佔總選舉人數的比例所計算而的權數，加權計算後的數值作為該選區的農牧人口比例，藉以衡量該區的產業結構類型。

(4) 地理區域

過去衡量地理區域的操作型定義主要有兩種，一為單純衡量北部（即基隆市、新北市前身臺北縣、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與南部（即雲林縣、嘉義縣市、合併前臺南縣市、合併前高雄縣市、屏東縣）兩分類，而將中部與東部一律視為遺漏值，多數有關地域政治的相關實證研究皆採取此種方式；二為基於研究需要而將地域細分為三分類（北部、中部、南部）或是四分類（北部、中部、南部與東部）。而筆者由於考量到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筆數本較不多，若再將中部與東部視為遺漏值，恐更形減少統計模型可用來估計分析的樣本數，故採納第二種方式，基於模型需要，仍保留中部與東部，而以北部、中部、南部與東部四大區域作為衡量地理區域的操作型變項。

自是，筆者以將調整後樣本的 33 個選區⁶²依地理區域分成北部（即基隆市、新北市前身臺北縣、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中部（即合併前之臺中

⁶² 詳細各選區請參見附錄三。

縣市、彰化縣、南投縣)、南部(即雲林縣、嘉義縣市、合併前臺南縣市、合併前高雄縣市、屏東縣)與東部(即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並考量到過去有關地域政治的研究文獻多半聚焦於北部與南部間的比較,以及為了減少自由度的耗費,故再把中部和東部併為一組,將其以虛擬變項形式轉碼成三類,分別是「北部」為 1(觀察組)、「中部和東部」為 1(觀察組),「南部」(參照組)為 0,其餘設為遺漏值。

(5) 寺廟數

質言之,過去絕少實證研究論及宗教動員力的操作型定義,故筆者考量國內的文化民情以及既有文獻已指出地方政治勢力長久以來係與寺廟保持極為緊密的互動關係,遂以該選區寺廟數而非教堂數多寡,作為衡量宗教動員力的操作型定義。而之所以不以選區中各寺廟的信徒數目為指標,主要原因在於宗教動員係以寺廟為動員單位,也是「廟埕」在扮演著附近居民平時聚會、活動場所的角色,因此,筆者認為應以寺廟數作為衡量當地宗教動員力指標較妥當。自是,筆者以 2012 年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系統」中有關全國寺廟的資料,⁶³並根據呈報的寺廟地址依村里加總歸併為實際上各選區中的寺廟數,如遇到提供地址未詳盡到村里者(如僅有路名,而無村里名),則以鄉鎮為單位,輔以各選區中該鄉鎮選舉人數佔總選舉人數的比例所計算而的權數,加權計算後而得該選區的寺廟數。

表 3-2 個體層次自變數整理一覽表

⁶³ 之所以用 2012 年的全國寺廟資料,係由於該系統的相關資訊是以當下的統計為主,並無法自行選擇各年度查詢,故以筆者實際查詢時間——2012 年為基準。而主要供奉神祇則以中國民間信仰為主,教別則如佛教、道教、一貫道、理教、軒轅教、天帝教、天德教、儒教、太易教、亥子道、彌勒大道、中華聖教、宇宙彌勒皇教、先天救教、黃中、玄門真宗、天道與其他等。

個體層次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資料來源
年齡	透過民國 97 年減去受訪者的出生年次，將其轉碼成體現實際年齡的連續變項，無回答者則視為遺漏值。	TEDS2008L 追蹤樣本
教育年數	將教育程度依各階段的教育年數轉碼成連續變數，分別是「不識字」、「識字但未入學」為教育年數 0 年，「小學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6 年、「國／初中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9 年、「高中／職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12 年、「專科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14 年、「大學畢（肄）業」為教育年數 16 年、「研究所」為教育年數 18 年，其餘訪員漏問與拒答者計為遺漏值。	TEDS2008L 追蹤樣本
收入	將家庭總月收入依等級編碼成連續變數，分別是約在 36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1，在 36001 元到 47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2，在 47001 元到 5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3，在 58001 元到 65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4，在 65001 元到 7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5，在 78001 元到 8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6，在 88001 元到 10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7，在 108001 元到 13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8，在 138001 元到 158000 元以下者編碼為 9，在 158001 元以上者編碼為 10，其餘計為遺漏	TEDS2008L 追蹤樣本

		值。	
有無 政黨 認同	有政黨認同	將問卷中有關屬於泛藍與泛綠以及偏向泛藍與泛綠兩問項結合轉碼成對「有無政黨認同（不論泛藍或泛綠）」測量的虛擬變項，其中，「無政黨認同」為 1（觀察組），「有政黨傾向」為 0（參照組），其餘則設為遺漏值。	TEDS2008L 追蹤樣本
	無政黨認同		
族群 認同	中國人或都是	將問卷中有關族群認同的問項合併並轉碼為虛擬變項形式，其中「中國人或都是」為 1（觀察組）「台灣人」為 0（參照組），其餘則設為遺漏值。	TEDS2008L 追蹤樣本
	台灣人		
統獨 立場	傾向統一	將問卷中有關統獨立場的問題合併並轉碼為虛擬變項形式，其中「傾向統一」與「傾向獨立」分別各為 1（觀察組），而「傾向維持現狀」則為 0（參照組），其餘設為遺漏值。	TEDS2008L 追蹤樣本
	傾向獨立		
	傾向維持現狀		
	政治涉入度	將有關「政治討論」、「政治關心」、「政治知識」、「對報紙上選舉新聞注意程度」、「對電視上選舉新聞注意程度」、以及「選舉活動參與」的問項以因素分析整併為連續變項形式（分數從-3 到+3），其中數字愈大表示政治涉入度愈高，反之，愈小即表示政治涉入度愈低。	TEDS2008L 追蹤樣本

資料來源：該表為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表 3-3 總體層次自變數整理一覽表

總體層次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資料來源
政黨得票率邊際差	2004 年第六屆不分區立委中，泛藍得票率扣掉泛綠得票率的差距，再加絕對值。		由中選會第六屆立委選舉資料計算而得
農牧人口比例	農牧戶人口數占該選區總人口數的比例。		2005 年行政院主計處
地理區域	北部	將原本分成北部（即基隆市、新北市前身臺北縣、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中部（即合併前之臺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南部（即雲林縣、嘉義縣市、合併前臺南縣市、合併前高雄縣市、屏東縣）與東部（即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的四分類變項，轉為以中、東部為參照組的虛擬變項。	TEDS2008L 追蹤樣本
	南部		
	中部及東部		
寺廟數	各選區內寺廟總數。		取自 2012 年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系統」有關全國寺廟的資料
泛綠政黨平均三屆得票率	第四、五、六屆共三屆不分區立委中，泛綠政黨得票率取其平均值。		由中選會第四、五、六屆立委選舉資料計算而得

資料來源：該表為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第四節 估計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題係在探討第七屆立委選舉中，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間的關係，故主要在統計上的分析方法係以多層次分析法（Multilevel analysis）進行研究，今介紹如下：

由於本文探討重點在於選區環境系絡因素對選民偏好選區服務態度的影響，故採用多層次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又可稱為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以下簡稱 HLM）進行探討。蓋其係種將傳統線性迴歸擴展至階層資料結構的分析方法，適用於分析具巢套（nested）性質的資料結構，一方面可解決因資料鑲嵌而違反誤差獨立且相同分配（independently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簡稱 iid）此一傳統的線性迴歸基本假設，二方面亦可進一步檢定不同層次之間的共變影響以及釐清總體系絡效果（Raudenbush and Bryk, 2002:7），並改善個體層次變數估計的有效性。

本文使用多層次分析的理由有三點：第一、就資料形式上來說，以此次立委選舉而言，選民與選區之間正存在階層性的巢套關係，每位選民必隸屬於其所屬的選區，構成最標準的雙層模型分析架構。意即選民個人為第一層（level 1），即個體層次的分析單位，而選區環境係第二層（level 2），屬總體層次的分析單位；第二、就研究目的來說，人本係鑲嵌於整體外在的環境系絡，其思維與行為邏輯自會受其制約與影響，誠如 Lazarsfeld 等人（1948, 27）所言，「一個人的政治思維乃是取決於其所屬的社會環境」，如逕自以原子論觀點作獨立個體行為的推論，恐忽略不同群體間的因果異質性（casual heterogeneity）（Western, 1998），而失之偏頗，又倘若僅以總體資料推論個體行為，則恐犯了方法論上的區位／生態謬誤（ecological fallacy）。故在研究多層次範疇議題時，如本文的「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間的關係，由於係以環境系絡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力為核心焦點，

故使用階層線性模型實有其必要；⁶⁴第三、就統計上來說，尤以社會科學為例，大部分係採用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的多階段抽樣（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簡稱 PPS），使得資料多半具有鑲嵌特性，極有可能會違反樣本獨立性假設，尤其在實證層次上，倘若所使用資料的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簡稱 ICC）確定很大時，由於已實際上違反樣本獨立性假設，遂無法適用傳統線性模型，而必須改採多層次模型分析（Luke, 2004）。⁶⁵

由上觀之，本文使用多層次分析尤有其必要性，且因為依變項係選民投給所選立委候選人的主因分類，屬無序多項類別變項（multinomial categorical variable），故需要進一步使用「階層推廣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簡稱 HGLM）⁶⁶作分析，今簡述多層次模型如下：

HLM 分析的基本概念，如以典型的二階層模型為例，第一層（level-1）通常指涉的是「個體」單位，如個別選民、個別學生等，而第二層（level-2）則係指「總體系絡」單位，如學校、選區等，其基本概念在於由於分析的對象係鑲嵌於總體的環境系絡中，故行為模式均受外在環境系絡而影響，如研究者欲觀察學生的社會地位與大學指考成績的關聯性，即不能忽略身處於不同學校的系絡背景，蓋不同學校有相異的教學方式或學風，如公、私立學校或是明星高中與一般學校等均會對個人的成績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因此 HLM 主要係在解決當個體資料是巢套

⁶⁴ 過去實證研究在研究個體行為現象時，雖不乏考量環境系絡的影響效果，但多數以使用「虛擬變項」或是「交互作用項」的模型設定來看待個體層次的系絡差異，但卻不免有所限制。以前者來說，Steenbergen and Jones（2002）認為，虛擬變項雖可解釋不同群組間的常數差異，但卻無法進行對不同組別間的迴歸係數的估計與比較，無法對系絡效果提出充分的驗證。而以後者來說，交互作用項雖可解決虛擬變項的組別估計問題，但卻不免忽略組間可能存在的殘差項，使得迴歸係數估計產生問題。

⁶⁵ 申言之，ICC 很大時，因違反樣本獨立性假設，故會高估迴歸係數的顯著效果（Hox, 1998: 147; Steenbergen and Jones, 2002:219-220）。

⁶⁶ 「階層線性模型」在發展之初僅得以連續變數作依變項，後為了滿足各種研究所需，漸與「推廣線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簡稱 GLM）結合，發展出「階層推廣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簡稱 HGLM），利用不同的「連結函數」（link function），藉以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依變項作多層次分析（黃紀，2008；Raudenbush and Bryk，2002）。

(nested) 在總體資料下時，由於已違反誤差獨立且相同分配 (independently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簡稱 iid) 的假設，故無法使用傳統線性模型，此時即須透過 HLM 隨機效果的設計，在迴歸模式中引進總體層次的誤差項，透過變異數來捕捉內屬關係的組內相關，以進行參數的估計與檢定 (溫福興、邱浩政，2009)。基本模型表示如下：

$$\text{Level-1 model: } Y_{ij} = \beta_{0j} + \beta_{1j}X_{ij} + \varepsilon_{ij} \quad (1)$$

$$\text{Level-2 model: }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Z_j + u_{0j} \quad (2)$$

$$\beta_{1j} = \gamma_{10} + \gamma_{11}Z_j + u_{1j} \quad (3)$$

其中，方程式(1)代表第一層的迴歸模式，亦即個體層次自變項 X_{ij} 與個體層次依變項 Y_{ij} 間之關係， ε_{ij} 則是個體層次的誤差項，而方程式(2)、(3)則分別為第二層的迴歸模式， Z_j 為總體層次的自變項， u_{0j} 、 u_{1j} 則分別代表總體層次的誤差項，並假設服從以 0 為平均數、 τ_{00} 與 τ_{11} 為變異數、 τ_{01} 為共變數的二元常態分配。值得注意的是，方程式(2)、(3)係以第一層／個體層次的迴歸參數為依變項，亦即以個體層次迴歸分析的截距項 β_{0j} 與斜率項 β_{1j} 作為第二層／總體層次的依變項，並進行高階迴歸分析，而非以個體層次的依變項 Y_{ij} 作分析，如此才能藉由總體系絡效果的抽繹，進而將 ε_{ij} 、 u_{0j} 與 u_{1j} 均假設為符合誤差獨立且相同分配 (independently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簡稱 iid) 的假設。而倘若將上述三式結合，即可得到其整合方程式，稱為混合模型 (Mixed Model)：

$$\text{Mixed model: } Y_{ij} = \gamma_{00} + \gamma_{10}X_{ij} + \gamma_{01}Z_j + \gamma_{11}X_{ij}Z_j + u_{0j} + u_{1j}X_{ij} + \varepsilon_{ij} \quad (4)$$

其中，方程式(4)中，迴歸係數 γ_{00} 平均截距， γ_{01} 是總體層次自變項 Z_j 對依變項 Y_{ij} 的直接影響或稱為環境係絡的淨效果， γ_{10} 為個體層次自變項 X_{ij} 對依變項 Y_{ij} 的直接影響，而 γ_{11} 則是跨層級的交互作用效果 (cross-level interaction effect)， $(u_{0j} + u_{1j}X_{ij} + \varepsilon_{ij})$ 則是總誤差項，較傳統多元迴歸模型的誤差項多了

u_{0j} 與 $u_{1j}X_{ij}$ ，蓋 HLM 本係藉由添加總體層次的誤差項藉以消泯因巢套資料結構所帶來的組內相關困境，因此如果將 u_{0j} 與 $u_{1j}X_{ij}$ 拿掉，即回到原本的多元迴歸分析。

因此，回到本文研究模型上，誠如前文所言，由於本研究依變項係為選民投給所選立委候選人的主因分類，屬於無序之多項類別變項（multinomial categorical variable），而非一般常見的數字資料，故其第一層抽樣模型已是多項分布（multinomial distribution）而非常態分配，其「連結函數」（link function）則為

$$P(Y_{ij} = m \mid \mathbf{x}_{ij}, \boldsymbol{\xi}_{ij}, \boldsymbol{\delta}_{ij}) = \frac{\exp\{\eta_{ij}^{(m)}\}}{1 + \sum_{l=2}^M \exp\{\eta_{ij}^{(l)}\}}。$$

此外，在測量個體間的相關程度上，因依變項具有「變異異質性」的特性，故無法直接估算「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簡稱 ICC），須透過對第一層模型的隨機成分（即誤差項）為依循平均數為 0、變異數為 $\frac{\pi^2}{3}$ 的「標準勝算對數分布」（standard logistic distribution）的

假設，而將 ICC 公式修正為 $\frac{\sigma_{u_{0j}}^2}{(\sigma_{u_{0j}}^2 + \frac{\pi^2}{3})}$ （HedeKer, 2008: 255-256;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298-334; Leonardo Grilli and Carla Rampichini, 2007），藉以釐清總體環境系絡因素對依變項變異量的解釋程度。因此，本文在結合個體資料（如選民的教育年數、收入、政治涉入度、年齡、有無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統獨立場）與總體資料（如選區的政黨得票率邊際差、農牧人口比、寺廟數、泛綠平均三屆得票率與地理區域）之後，以「階層推廣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簡稱 HGLM）中的「多層次多項勝算對數模型」（The multilevel multinomial logit model）進行分析。今將個體層次模型（Level-1 model）表示如下：

Level-1 model:

Level-1 model:

$$\eta_{ij} = \log \frac{P(Y_{ij}=m \mid \mathbf{x}_{ij}, \boldsymbol{\xi}_{ij}, \boldsymbol{\delta}_{ij})}{P(Y_{ij}=l \mid \mathbf{x}_{ij}, \boldsymbol{\xi}_{ij}, \boldsymbol{\delta}_{ij})} = \eta_{ij}^{(m)} - \eta_{ij}^{(l)} \quad \text{for } m=1 \text{ to } 4, \text{ 其中, } l \text{ 是參照組 (在本文即選區服務因素), } i=\text{選民}; j=\text{選區}; P(Y_{ij} = m \mid \mathbf{x}_{ij}, \boldsymbol{\xi}_{ij}, \boldsymbol{\delta}_{ij}) = \text{選民以特定投票取向}$$

相對於選區服務因素而投給所選候選人的機率

$$\begin{aligned}\eta_{ij} = & \beta_{0j} + \beta_{1j}(\text{年齡}) + \beta_{2j}(\text{教育年數}) + \beta_{3j}(\text{收入}) + \beta_{4j}(\text{有無政黨認同}) \\ & + \beta_{5j}(\text{政治涉入度}) + \beta_{6j}(\text{中國人或都是}) + \beta_{7j}(\text{傾向獨立}) \\ & + \beta_{8j}(\text{傾向統一}) + \varepsilon_{ij}\end{aligned}$$

而在選區的總體層次部分，選區的政黨競爭程度、產業結構、宗教動員力、泛綠政黨版圖以及地理區域五種環境系絡因素，皆可透過人際互動、資訊傳播或是耳濡目染等，不僅會「直接」對選民帶來其特定環境氛圍下的社會心理效果，更是會「間接」影響選民特性對其投票取向間的因果關係，彼此係存在「交互作用」。今根據前文研究假設所建構出的總體層次模型（Level-2 model）如下：

Level-2 model:

(一) If $m=1$ (政黨因素)，則

$$\begin{aligned}\beta_{0j} = & \gamma_{00} + \gamma_{01}(\text{政黨得票邊際差}) + \gamma_{02}(\text{農牧人口比}) + \gamma_{03}(\text{北部}) \\ & + \gamma_{04}(\text{中部及東部}) + \gamma_{05}(\text{泛綠平均三屆得票率}) + \gamma_{06}(\text{寺廟數}) \\ & + u_{0j}\end{aligned}$$

$$\beta_{kj} = \gamma_{ko}$$

(二) If $m=2$ (候選人形象因素)，則

$$\begin{aligned}\beta_{0j} = & \gamma_{00} + \gamma_{01}(\text{政黨得票邊際差}) + \gamma_{02}(\text{農牧人口比}) + \gamma_{03}(\text{北部}) \\ & + \gamma_{04}(\text{中部及東部}) + \gamma_{05}(\text{泛綠平均三屆得票率}) \\ & + \gamma_{06}(\text{寺廟數}) + u_{0j}\end{aligned}$$

$$\beta_{kj} = \gamma_{ko}$$

(三) If $m=3$ (人際網絡因素)，則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text{政黨得票邊際差}) + \gamma_{02}(\text{農牧人口比}) + \gamma_{03}(\text{北部}) \\ + \gamma_{04}(\text{中部及東部}) + \gamma_{05}(\text{泛綠平均三屆得票率}) + \gamma_{06}(\text{寺廟數}) \\ + u_{0j}$$


$$\beta_{2j} = \gamma_{20} + \gamma_{21}(\text{農牧人口比}) + \gamma_{22}(\text{寺廟數})$$

$$\beta_{5j} = \gamma_{50} + \gamma_{51}(\text{農牧人口比}) + \gamma_{52}(\text{寺廟數})$$

$$\text{其餘 } \beta_{kj} = \gamma_{ko}$$

最後藉由多層次模型的分析方法，將上述影響選民投票取向之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相結合成混合模型（Mixed Model）如下：

Mixed model:



$$\eta_{ij} = \gamma_{00} + \gamma_{01}(\text{政黨得票邊際差})_j + \gamma_{02}(\text{農牧人口比})_j + \gamma_{03}(\text{北部})_j \\ + \gamma_{04}(\text{中部及東部})_j \\ + \gamma_{05}(\text{泛綠平均三屆得票率})_j + \gamma_{06}(\text{寺廟數})_j + \gamma_{10}(\text{年齡})_{ij} \\ + \gamma_{20}(\text{教育年數})_{ij} + \gamma_{30}(\text{收入})_{ij} \\ + \gamma_{40}(\text{有無政黨認同})_{ij} + \gamma_{50}(\text{政治涉入度})_{ij} + \gamma_{60}(\text{中國人或都是})_{ij} \\ + \gamma_{70}(\text{傾向獨立})_{ij} \\ + \gamma_{80}(\text{傾向統一})_{ij} + \gamma_{21(3)}(\text{教育年數} * \text{農牧人口比}) \\ + \gamma_{22(3)}(\text{教育年數} * \text{寺廟數}) + \gamma_{51(3)}(\text{政治涉入度} * \text{農牧人口比}) \\ + \gamma_{52(3)}(\text{政治涉入度} * \text{寺廟數}) + u_{0j} + u_{1j}(\text{年齡})_{ij} + u_{2j}(\text{教育年數})_{ij} \\ + u_{3j}(\text{收入})_{ij} + u_{4j}(\text{有無政黨認同})_{ij} + u_{5j}(\text{政治涉入度})_{ij} \\ + u_{6j}(\text{中國人或都是})_{ij} + u_{7j}(\text{傾向獨立})_{ij} + u_{8j}(\text{傾向統一})_{ij} + \varepsilon_{ij}$$

其中， $\gamma_{01} \sim \gamma_{06}$ 係指選區總體層次對選民投票取向之直接影響力， $\gamma_{10} \sim \gamma_{80}$ 係指選民個體層次對其投票取向的影響力，至於 $\gamma_{21(3)}$ 、 $\gamma_{22(3)}$ 、 $\gamma_{51(3)}$ 、 $\gamma_{52(3)}$ 則表示總體選區環境系絡（即農牧人口比與寺廟數）與個體選民特性（即教育年數與政治涉入度）之間的交互作用，其對於選民之所偏好人際網絡相較選區服務間的態度影響，⁶⁷亦即選區環境系絡對選民投票取向的間接影響力。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主要來自資料來源所造成的可能侷限，而有以下三點：

（一）依變項採開放式問項設計的可能缺失

本文之所以使用開放式問項來衡量投票取向的類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筆者將選民投票予所選立委候選人的主因，視作分析標的——投票取向——的操作型定義，而其在相關的調查問卷（簡稱 TEDS2008L）中係以開放式問項的設計方式建構，故本文遂以此作為本研究分析標的的變項建構來源，而無另行選擇的餘地。

然而學術上對於使用開放式問項（open-ended questions）或結構式／封閉式問項（structured/ closed-ended questions）的優劣一直存在著爭論。申言之，開放式問項最早使用且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 Campbell 等人在 1960 年的《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一書。其有關投票決定的分析都是基於「開放題」（open-ended questions）而來，如其直接詢問受訪者「關於某位候選人，是否有特定的原因讓你會想要／不想要投給他？」假使受訪者對特定候選人表達正向或負向觀點，則訪員會進一步接下去詢問探測出更多更明確的答案，並逐字詳細地記錄下來（Shank, 2001）。迨該書出版後，以開放式問項（open-ended questions）來探求選民投票行

⁶⁷ 而係數的下標 3 係表示當投票取向為人際網絡相較選區服務時（即前文的 $m=3$ ）的影響效果。

為的方式即引起廣泛地討論，並引起諸多質疑，主要批評有三點：

第一、其係建立在對選民當下「記憶」的高度信賴上，蓋有學者認為，開放式問項由於並無提供受訪者一個回答參考的依據，故當訪員詢問時，受訪者當下才會去試圖建立組織其對該政黨或候選人的印象，藉以佐證其投票決定（Lewis-Beck, Norpoth, and Jacoby, 2008:54），但由於一般人可能會輕易地忘掉關於政治的重要資訊，故實際上並不擅長重建並組織出真正影響其投票行為的重要因素，亦無法針對候選人或政黨提出具體好或壞的看法，甚至提供兩個以上的訊息或意見（Lewis-Beck, Norpoth, and Jacoby, 2008:54）。

第二、開放式問項由於採取讓選民自由回答的方式，並無提供一個回答的依據或參考，因此往往容易呈現出毫無章法、天馬行空的答案，不利於研究者的研究分析——尤其當研究者已有特定分析目的或議題興趣時。

第三、其後續的研究資料整理需要花費很大功夫，尤其在分類編碼與歸納整理上，格外費時費工，且資料蒐集過程中很可能遇到受訪者拒絕回答或是不知如何回答的窘境。

因此，慢慢地，學界在選舉研究中對於選民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的測量愈來愈傾向使用結構式／封閉式問項（Shank, 2001）。然而有學者對此提出若干回應，其中最主要的莫過於是強調，即便一般選民可能會輕易地忘掉有關政治的重要資訊，但一旦此重要資訊被有效地記憶下來，並連結至關於政黨或候選人的印象時，該資訊即會變得相當重要，而研究者其實也只對那些被有效編碼、保留下的記憶資訊感興趣（Lewis-Beck, Norpoth, and Jacoby, 2008:54）。故開放式問項的設計方式，雖相對於封閉式問項來說，確係存在著若干缺點，但其保留了原始受訪者的記憶連結，如以研究議題框架的彈性和自由度來論，開放式問項誠然仍有其參考價值。所以，即便目前學界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中，仍以結構式／封閉式問

項為主，但亦不乏有透過開放式問項或半開放式問項來加以測量——尤其當研究者對探求議題有想要更深入了解或是建構新概念時。如國外 Bastedo 與 Lodge (1980)、Richardson (1991)、Sanders (1988) 等以及國內徐火炎 (1991)、游盈隆 (1996) 與蔡佳泓 (2007) 等研究，即是透過半開放式或開放式問項的方式，加以測量政黨形象；Miller (1986)、Lodge (1995)、Miller and Shanks (1996) 以及游清鑫 (2003)、金溥聰 (1997) 等亦透過開放式或半開放式問項測量候選人形象；胡佛等人 (1983、1985、2001) 亦透過半開放式問項來測量分析立委選舉中有關選民投票動機與投票取向；徐火炎 (2005) 則透過開放式問項分析 2004 年總統選舉中選民的投票主因。

綜論之，本文雖基於依變項操作型定義的需要，僅能以開放式問項建構其內涵，故難免有上述開放式問項的缺陷與限制，但筆者認為就本文分析主旨來說，第七屆立委選舉正好是第一次改制施行單一選區制後的結果，選民面對新選制後的投票取向與類型遂格外引人注意，但卻無人能保證其投票取向必定介於哪幾種特定的取向之間，故藉由此開放式問項，或許相對於封閉式問項來說，較能提供研究者更彈性的探索空間，對釐清在新選制下，選區服務作為投票取向之一，其與地方政治生態間的關係來說，不啻為可行之道。

(二) 無法增加觀察時間與觀察的樣本數

由於本文係以「選民投票予立委候選人主因」為依變項，而該問項僅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選後面訪 (簡稱 TEDS2008L) 的追蹤樣本涉及，另外同時期「橫斷面調查」(cross-section) 之重新獨立抽樣⁶⁸問卷設計並無此題，而 2012 年問卷亦然 (不論是獨立樣本或是追蹤樣本)，故筆者囿於分析所需，僅得以 2008 年第七

⁶⁸ 其係以全國 73 個單一選區依選民人口比例抽取 38 個選區，並依「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簡稱 PPS) 原則抽取村里後，再以等距抽樣抽出合格受訪對象來進行訪問，共計完成 1238 份有效樣本。

屆 TEDS2008L 的追蹤樣本作為觀察對象，而無法擴及 2008 年的橫斷面調查以及 2012 年的第八屆立委選舉，不僅一則無法增加觀察時間，以進一步分析第七屆、第八屆區域立委選舉中，地方政治生態與選民是否偏好以選區服務取向投票間關係的長時間趨勢，二則，亦無法就此擴大樣本數，以更進一步地增加估計推論的精確性，此係為一大限制。

（三）有非隨機性樣本流失疑慮

誠如前文所述，因囿於本文依變項的問項限制，僅得以 2008 年第七屆立委選舉的追蹤樣本作為觀察對象，遂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非隨機性」之樣本流失與訪問效應⁶⁹的問題，使其分析結果推論上受到侷限（陳陸輝，1999；劉從葦、陳光輝，2006）。尤其當資料的選樣標準與依變項有關係時，此種樣本選擇性偏誤（sample selection bias），將使迴歸係數估計發生偏誤，進而高估或低估自變項的影響效果。若僅與自變項有關係時，則不會影響迴歸係數的估計，但在代表性的推論上將受到限制（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129-38）。

因此，考量到上述有關選樣偏誤所帶來的疑慮，以及誠如前文所述，為因應研究模型所涉及的跨層次以及交互作用效果，已將樣本結構調整為第一層組內樣本數至少 20 筆以上，與第二層組間樣本數至少 30 筆以上，故為謹慎起見，筆者將重新檢定調整後追蹤樣本的代表性。惟本文所用之追蹤樣本問卷題目與獨立樣本問卷題目並不完全相同，故針對相關的主要解釋變項，筆者僅得對教育程度、收入重新進行樣本代表性檢定，至於政治涉入度此一綜合性指標因所涉變項中僅有一題問項在獨立問卷中有出現，⁷⁰遂無法據此進行代表性檢定。

⁶⁹ 所謂「訪問效應」係指受訪者由於曾經接觸過長達半小時以上面對面的政治類訪問，將可能促其之後留意政治新聞與相關資訊，進而改變其後的政治態度以及有限度地提高政治參與程度（劉從葦、陳光輝，2006）。

⁷⁰ 申言之，在獨立樣本問卷中僅有測量「受訪者政治知識」此一問項有完全相同的題目，其餘如政治關心、政治討論、報紙上對選舉新聞注意程度、電視上對選舉新聞注意程度，以及對選舉活動

由下表 3-4 可發現，追蹤樣本與獨立樣本的分布僅在教育程度上有顯著差異，然而在收入上，則無顯著差別。至於在選民投票取向此一依變項上，則因獨立樣本沒有相對應的依變項題目可供檢證，故本文無法據此論斷是否本研究在資料上的選樣偏誤與依變項有關，並進而導致迴歸係數的估計偏誤，誠屬一憾。但筆者認為其與依變項有關的機率應該不大，蓋誠如蕭怡靖、黃紀於〈2008 年立委選舉候選人票之分析：選民個體與選區總體的多層模型分析〉一文中所言，其藉由檢定證實追蹤樣本與獨立樣本僅就受訪者在年齡及教育程度上有顯著差異，然而在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上，則無顯著差別，顯示追蹤樣本的選樣偏誤並不會影響模型變數間因果關係的係數推估（蕭怡靖、黃紀，2010a）。⁷¹而為求謹慎，筆者亦以年齡與族群認同為例，再作一次調整後追蹤樣本與獨立樣本間的樣本代表性檢定，同樣發現兩者僅在年齡此一社會屬性上有顯著不同，而在族群認同此一政治態度上，則無顯著差異（參同表）。因此調整後追蹤樣本其所具有的選樣偏誤應不至於會造成解釋變項迴歸係數的錯估，但在解釋推論上則有偏向低教育程度選民的可能性，此係為另一研究限制。⁷²

的參與五項題目則雖有類似題目，但卻均與原本追蹤樣本問卷中的題目不盡相同。以其中相似度最高的題目為例，如在有關政治討論的題目上，追蹤樣本中係以「請問您平時會不會與人討論有關政治或選舉方面的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第 B01 題）的形式出現，然而卻在獨立樣本問卷中以「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台：厝內的人）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第 F01A 題）、「請問您會不會與朋友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第 F02A 題）、「請問您會不會與鄰居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第 F03A 題）、「請問您會不會與同事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第 F04A 題）的形式呈現。即便在追蹤樣本問卷中在第 B01 題之後，有進一步詢問受訪者討論對象是「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同事」，但其尚且詢問包含「社團組織」、「同學」等其他入，故究其實際並不容易將兩者視為完全相同的題目，並以相同編碼方式進行處理。

⁷¹ 且本文亦檢定過調整前追蹤樣本與調整後追蹤樣本的分布結構，發現兩者並無顯著差異，故或可據此認為調整後追蹤樣本其所具有的選樣偏誤，應同樣僅在選民社會屬性上，而在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上，則無顯著不同。惟此部分礙於篇幅限制，且非本文重點，故僅以文字說明。

⁷² 值得一提的是，有學者曾經質疑樣本代表性檢定對實證分析的重要性，蓋所謂獨立樣本之所以與母體資料特性一致，係在於其係透過「加權」的方式而來，然而其加權之後，所得到符合母體資料分布的選民特性，是否真的即是有實際參與、前往投票的選民，則有待商榷。如洪永泰曾經指出美國民調的選舉預測之所以較國內民調準確，係因為其調查的母體為有可能會去投票的選民，而非全體有投票權的選民，因此較能準確推估出參與投票者的投票意向，而非僅是具有投票權選民的投

表 3-4 追蹤樣本的樣本代表性檢定

		調整後追蹤 樣本 (%)	獨立樣本 (%)	卡方檢定結果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27.8	18.4	$\chi^2=75.164$ df=4 n=1189 p=0.000<0.05
	國、初中	12.2	14.4	
	高中、職	28.8	32.8	
	專科	10.1	13.2	
	大學及以上	21.2	21.2	
收入 (1~10)	平均	3.93	4.05	t=-1.275 df=923 n=924 p=0.203>0.05
年齡層	20-29 歲	11.3	19.3	$\chi^2=110.987$ df=4 n=1195 p=0.000<0.05
	30-39 歲	17.6	22.0	
	40-49 歲	24.4	23.4	
	50-59 歲	20.2	17.9	
	60 歲以上	26.6	17.5	
族群認同	中國人與都是	50.7	51.5	$\chi^2=0.001$ df=1 n=1194 p=0.970>0.05
	臺灣人	49.3	48.5	

票意向。相較於臺灣的民調來說，由於其多半係以具投票權的選民為母體，而非可能會去投票的選民，故透過加權動作而來的樣本代表性的檢定過程，是否真的能使研究結果更貼近現實、有其實證研究上的意義，尤令人深思！

說明：細格內為直行百分比。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Ⅲ）：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數據係作者自行計算所得。

另有兩點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目前有關社會科學使用多層次分析法時，大都僅如上論及總樣本的代表性，鮮少處理第二層的樣本代表性問題，換言之，本文分析的此 33 個選區，究竟最後是否得有效推論至全國 73 個選區中？就政黨當選席次而言是否具有代表性？透過附錄三可發現，所選 33 個選區中，泛藍席次佔 27 席，泛綠佔 6 席，席次比值為 4.5，而在全國 73 個選區中，泛藍實際上則勝選 57 席，泛綠則係 13 席，席次比值則約為 4.4，兩者相差無幾，故或可據以認為此 33 個選區應可有效推論至全國 73 個選區中，而不會有藍綠版圖選樣偏差之虞。

第二、另有學者認為多層次分析就理論上，尚有一研究限制，即其僅處理異質性問題，但無法解決第二層迴歸誤差可能存有相關性問題，亦即第二層總體層次單位間，或有自相關存在，尤其是該單位代表的是不同地理區域時，此問題更顯嚴重（鄧志松，2008）。然而筆者認為，多層次分析的優點在於其可解決巢套資料下，下層樣本結構違反 iid 假設的問題，故倘若今天使用模型僅二層，第二層資料就統計上勢必無法解決或有違反 iid 假設的問題，除非多套疊第三層上去，然而如此即會陷入循環困境。不過若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在同一時期之下，就區域立委選舉而言，第二層分析單位選區間，其要具有空間自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的機率並不高。蓋空間自相關係藉由地理上之便利性，靠著人際互動而來的潛移默化，進而產生所謂鄰近效應，⁷³故實際上已橫跨數鄉鎮的「選區」，其彼此藉由鄰近關係而來的空間擴散效果並不強，再加上本文僅分析 33 個選區，大部分選樣

⁷³ 如鄧志松所指出，在進行空間分析時，如果關心的是「鄰近效應」，以鄉鎮、村里作為分析單位是必須的（鄧志松，2008）。

選區彼此並不相鄰或甚至在不同縣市，其空間擴散效果可能性更低，故或可忽略其誤差間的自相關問題。

第六節 研究假設

今筆者針對本模型設計中有關各變項的統計關係，分成二大脈絡進行論述，第一大脈絡係從個體層次切入，檢證不同類型選民是否影響其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偏好態度，第二大脈絡則是從總體層次著手，分別檢證環境系絡對選民投票取向所造成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效果，今說明如下：

(一) 個體層次

本文有關個體層次主要解釋變項共三項，分別是「教育年數」、「收入」與「政治涉入度」。而誠如前文所言，多數文獻認為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愈低的選民由於較關心日常生活的切身利益，以期望他所支持的候選人日後可以成為請求協助解決私人問題的對象，故較重視選區服務，但仍有少部分文獻持有疑義，認為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係較常和立委接觸、反映自身意見。然而筆者亦認為那些較常和立委接觸、反映自身意見的高經社程度者，實際上卻不一定會重視甚至以選票回饋，蓋其較明瞭立委身為中央民意代表所應具備的職責與角色，故不至於會被此些特殊利益所打動，因此教育程度與經濟水準愈高的選民，應愈會傾向以政黨因素或候選人形象投票，而非選區服務。至於經社程度較高的選民，其對於人際網絡相較選區服務的態度取向，筆者則認為即便經社程度較高者自主性較高，似乎不容易被人際網絡動員所影響，但以臺灣一向重視人際關係和諧的民情來說，其若重視人際網絡甚過選區服務，亦非不可能，蓋選區服務僅涉及一時一地的特殊利益交換，但人際關係卻會影響到不論在工作職場或群體生活中升遷或是交友等的順利與否，因此，筆者認為，教育程度與經濟水準愈高的

選民，應會較傾向政黨因素或候選人形象甚至是人際網絡投票，而非選區服務。

而以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來說，誠如前文所言，既有文獻雖大都認為政治涉入度的高低與其之所偏好以選區服務取向投票之間的關係密切，但國內外對其影響方向係無定論。或指出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較積極去蒐集相關政治資訊、並主動與立委接觸、提供政治意見，故應較重視選區服務，而非依賴政黨指令或週遭親友的言論；但尚有文獻認為政治涉入度愈高者，愈重視並能理性判別政黨的作用，與其所提出的議題；也有學者指出，國內所謂政治涉入度高者，只是由於具有強烈政黨認同、對政治抱有較高熱忱，遂傾向主動蒐集相關資訊，因此對政黨的偏好仍係較強。

然而由於本文已控制住有無政黨認同對政治涉入度高之於投票取向的干擾，故可排除政治涉入度高者，因對政黨偏好仍較強故而傾向政黨因素投票的可能性，而單純分析政治涉入度對於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態度的影響。因此，筆者認為，政治涉入度愈高者由於善於主動蒐集資訊並自我判斷，應會較偏向選區服務，而非倚賴政黨認同或政黨指令等政黨因素而投票；至於會不會重視政黨議題，則因曾有文獻指出，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政黨絕少提出全國性議題供選民抉擇，故筆者據以認為在立委選舉中，要能重視政黨議題進而以政黨因素而非選區服務投票的可能性較低。而有關對候選人形象相較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由於兩者均屬廣義的候選人因素，係需要藉由主動蒐集資訊才能加以評斷，故難以判斷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在蒐集瞭解相關資訊之後，會一定比較重視候選人的形象還是選區服務——尤其筆者已將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視為解釋因素之一、同放在模型之中，某種程度相當於排除了經社背景對高政治涉入度者對於投票取向的影響，故不會有高政治涉入度但低經社程度者偏好選區服務而非候選人形象的疑慮。所以筆者認為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對於候選人形象的偏好態度，應與選區服務相差不多。

自是，本文假設「收入」與「教育年數」愈低的選民，應較傾向採取「選區服務」投票，而非「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而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則較傾向「選區服務」投票，而非「人際網絡」或「政黨因素」，至於對候選人形象的偏好態度，應與選區服務相差不多（假設一）。

（二）總體層次

本文有關總體層次環境系絡的主要解釋變項共分為三類，分別是「政黨得票率邊際差」、「農牧人口比例」以及「寺廟數」，茲述如下。

1、政黨得票率邊際差

前文曾述及，當選區政黨競爭程度愈高，選區政黨勢力呈現「膠著區」時，選民會愈傾向以候選人形象作為投票抉擇時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反之，當競爭程度愈小時，即意謂著政黨版圖勢力愈鮮明，選民則愈容易傾向以政黨認同或選區服務進行投票抉擇。自是，筆者假設**政黨得票率邊際差愈小的選區（即所謂政黨競爭程度愈高）**，選民愈傾向採取「候選人形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假設二）。其中，由於本模型有放入「泛綠政黨版圖」變項，故某種程度上已可排除因政黨版圖屬性（即泛藍或泛綠），所造成對投票取向不一致影響的干擾。

2、農牧人口比例與寺廟數

整體來說，由於盛行農牧產業結構的農村地區，其物質水準較低，所能接觸與運用的資源資訊亦相對較第二、三級產業盛行的都會區來得匱乏，故居民會較為倚賴並重視選區服務。故本文認為，農牧產業結構應會影響選區選民是否重視選區服務的傾向，只是在第七屆立委改制之後，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如果實

務上候選人普遍重視選區服務，則產業結構是否還是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偏好態度，作為抉擇候選人的重要因素，即有待本文進一步檢證。但筆者仍先假設，**農牧人口比例愈高的選區，其選民愈傾向採取「選區服務」投票，而非「政黨因素」或「候選人形象」（假設三）。**

至於有關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間的關係，因過去文獻雖曾指出，傳統農牧產業愈密集的鄉村，相較於都會區而言，在較重視選區服務的同時，也因為人際關係較緊密，故容易受到人際網絡動員而影響其投票行為，但亦有文獻指出，在經社環境變遷、地方派系式微之後，選區服務仍然是立委最重視的工作，而能否進行人際網絡動員，反而變得不再那麼重要。因此，筆者認為，就現今立委選舉來看，農牧產業結構應會使其選區選民傾向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甚過人際網絡動員。

反觀寺廟數來說，過去研究曾指出，宗教寺廟透過自身作為地方聚集與資訊傳播的功能，藉由居民與居民間、神職人員與居民間的互動過程，建立起一套人際關係網絡，不僅一則在地方上扮演重要的人際交流平臺，二則更可讓政治人物藉由對廟方與信徒此一特定群體進行選區服務的方式來達到增加票源的目的。只是在目前不論個案服務的數量與性質都變得更多且更多元化的時代，政治人物是否還有心力透過對寺廟修葺或廟會活動的贊助，以試圖對廟方與信徒此些特定群體進行選區服務以增加票源，令人存疑。但即便宗教動員力在政治人物心中，喪失其以選區服務進行拉票的有利地位，仍然不排除會有選區服務優勢不如對手強的候選人，希冀透過宗教所具有的人際網絡動員力量，藉以補強票源。故筆者認為，宗教動員力在現今立委選舉中所具有的主要角色，應較傾向人際網絡的動員，而非基於對廟方與信徒此一特定、廣大群體進行選區服務之功能。因此，本文假設**農牧人口比例愈高的選區，其選民則較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投票；至於寺廟數愈高的選區，其選民愈傾向採取「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

投票（假設四）。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文獻雖並未言明寺廟數多寡與農牧產業形態間的關係，但筆者認為，一則就理論意涵上來說，寺廟數多寡主要涉及當地居民宗教信仰的多元與否，當一地區居民祖籍地所崇奉的神明、所屬族群或是產業類別愈趨多元時，該地居民對各種性質的神祇信仰亦趨多元，如閩南人拜五福王爺、客家人拜義民爺、漳州人拜開漳聖王、潮州人拜三山國王等，⁷⁴而漁業聚落則較盛行祭拜媽祖、農業聚落則對土地公與有應公的祭拜較為常見，故即便寺廟林立係為傳統社會較常看到的現象，但並無法據此認為其與農牧人口比所代表的意涵相同。二則如就本文實證資料來看，兩者的相關係數達 0.518，僅是中度非高度相關，足見兩者不論就理論意涵或統計上相關性來看，均有所差異，誠可放入模型之中予以探究，而不至於會產生高度共線性而讓兩者均喪失統計上的顯著性。

3、環境系絡與政治涉入度、教育年數的交互作用

誠如前文所言，由於農村地區中的成員流動率較低，容易形塑較為封閉、地域性色彩較重的小生活圈，故對異議聲音的包容性可能較低；再加上農村居民本就不習慣主動對政治事務表達看法，除非刻意提及，否則日常話題多半不會圍繞著政治事務，故本文認為，農牧產業結構應會與政治涉入度產生交互作用，間接使其轉而重視人際網絡因素。而對不一定熱衷政治的選民來說，由於其本就不必然常常主動表達自身政治態度，故透過人際交往溝通而影響投票取向的可能性遂較低——尤其是對教育程度愈高此種本身即不易受到他人說服影響的選民來說。

⁷⁴ 申言之，漳州府籍移民拜開漳聖王、廣惠尊王、武德尊侯；泉州府同安籍移民拜保生大帝、霞海城隍；泉州府三邑籍移民拜青山王（惠安）、廣澤尊王（南安）、龍山寺千手觀音（晉江）；泉州府安溪籍移民拜清水祖師、董公祖師、法主真君、雙忠尊神（尙公）；永春籍移民拜顯應祖師；興化府籍移民拜媽祖；福州府籍移民拜照天君、董真人、裴真人、開閩聖王、白馬尊王、五福王爺、臨水夫人、懿德夫人；汀州府籍移民拜定光古佛、伏虎禪師；潮州籍移民拜三山國王；至於其他客家籍移民則主要供奉義民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檢閱日期 2013/01/13）。

故本文假設在農牧人口比例愈高的選區，愈會使得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降低傾向採取「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的投票取向；而對教育年數愈高的選民來說，則不會使其更增強傾向採取「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的投票取向（假設五）。

反觀寺廟數所代表的宗教動員力來說，雖同時具有人際交往平臺，以及讓政治人物藉由對特定群體（即廟方與信徒）進行選區服務以增加票源的雙重意涵。但由於目前實務上不論個案服務的數量與性質都變得更多且更多元化，政治人物是否還有心力付出或是需要仰賴對此一特定群體的選區服務以增加票源，令人存疑。故筆者認為，宗教動員力在現今立委選舉中的主要角色，應回歸於其原本核心的人際網絡動員，而非藉由對特定群體選區服務以建立特定票源此一附加價值。再加上其無須以「頻繁地政治討論」來達到動員效果，故即便居民不一定主動與人談論政治，只要所處環境寺廟眾多，在長期參與廟會活動、往來寺廟之後，遂多少容易受到宗教動員的影響——即便是對教育程度愈高此種本身不易受到他人說服影響的選民來說。⁷⁵而值得注意的是，尚有文獻指出本土宗教在凝聚地方意識的同時，亦具有廣泛的包容力，筆者也認為，由於此動員力係屬宗教信仰，似不容易對政治涉入度高、對政治極為熱衷的選民造成強烈的人際壓力，甚至是迫使其改變投票行為——即便該選民的政治傾向迥異於週遭聲音。故本文大膽假設處在寺廟數愈多的選區，對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來說，則並不會降低其採取「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的投票取向；至於對教育年數愈高的選民來說，則會使其增強傾向採取「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的投票取向（假設六）。

自是，筆者將本文的研究假設依二大脈絡整理如下，並繪製成下表 3-5：

⁷⁵ 申言之，因臺灣本係政教相通，宗教寺廟與地方政治勢力的關係早就存在地方政治生態中，故有廟宇的地方，多少會受到政治勢力的介入，故即使居民不一定主動與人談論政治，只要所處環境寺廟眾多，在長期往來寺廟之後，遂多少容易受到宗教動員的影響。

一、個體層次

假設（一）「收入」與「教育年數」愈低的選民，應較傾向採取「選區服務」投票，而非「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而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則較傾向「選區服務」投票，而非「人際網絡」或「政黨因素」，至於對候選人形象的偏好態度，應與選區服務相差不多。

二、總體層次——選區環境系絡的直接與間接影響

假設（二）政黨得票率邊際差愈小的選區（即所謂政黨競爭程度愈高），選民愈傾向採取「候選人形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

假設（三）農牧人口比例愈高的選區，其選民愈傾向採取「選區服務」投票，而非「政黨因素」或「候選人形象」。

假設（四）農牧人口比例愈高的選區，其選民則較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投票；至於寺廟數愈高的選區，其選民愈傾向採取「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

假設（五）在農牧人口比例愈高的選區，愈會使得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降低傾向採取「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的投票取向；而對教育年數愈高的選民來說，則不會使其更增強傾向採取「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的投票取向。

假設（六）處在寺廟數愈多的選區，對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來說，則並不會降低其採取「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的投票取向；至於對教育年數愈高的選民來說，則會使其增強傾向採取「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的投票取向。

表 3-5 研究假設整理表（僅列出主要解釋變項）

固定效果	以選區服務為參照組		
	政黨因素	候選人形象	人際網絡
個體層次			
<i>選民特性</i>			
收入	+ (H1)	+ (H1)	+ (H1)
教育年數	+ (H1)	+ (H1)	+ (H1)
政治涉入度	- (H1)	X (H1)	- (H1)
總體層次			
<i>選區環境</i>			
農牧人口比	- (H3)	- (H3)	- (H4)
政黨得票率邊際差		- (H2)	
寺廟數			+ (H4)
交互作用			
教育年數 * 農牧人口比			X (H5)
教育年數 * 寺廟數			+ (H6)
政治涉入度 * 農牧人口比			+ (H5)
政治涉入度 * 寺廟數			X (H6)

說明：「+」代表其對該投票取向相對於選區服務因素來說，係為正向影響；「-」則表示其對該投票取向相對於選區服務因素來說，係為負向影響；而「X」則代表其對該投票取向相對於選區服務因素來說，係不具任何顯著影響。至於後面括號內則是本文研究假設的號次。

資料來源：為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文主旨係在透過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選後面訪（簡稱 TEDS2008L）資料，探究不同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是否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影響，故本節將針對此次分析所用資料中的每一個變項先進行樣本分布的基本介紹，並分為自變項與依變項兩大部分，之後第二節再以多層次模型進一步分析，茲述如下：

第一節 第七屆立委選舉之樣本分布

（一）自變項

在經過前面應模型分析需要所進行的樣本結構調整之後，筆者再將各變項重新編碼與處理之後，將自變項樣本資料的敘述統計值依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整理如下。

就個體層次來說，由表 4-1 可知，首先就年齡而言，其平均數係 49.55 歲，標準差則是 15.52 歲；其次是教育程度，平均受教年數則是 10.52 年，標準差是 4.94 年。第三則是家庭總收入，以一到十共分十個等級來看，平均收入係在 3.93，約第四個等級，即將近於 58000 元到 65000 元間，至於標準差則是 2.92，約相當於 48001 元到 58000 元之間。第四則是政治涉入度，平均數是 0，標準差則是 0.90。第五是政黨認同的有無，總計有政黨認同（不論泛藍、泛綠）者高達 71.6%，而不具穩定政黨認同的中立者則僅佔 28.4%。至於族群認同，則是傾向自認是中國人或都是者，佔 50.7%，而傾向臺灣人認同者則佔 49.3%。最後是統獨立場，其中，傾向維持現狀的選民比例最高，佔 56.2%，其次分別是傾向獨立者，佔 28.5%，最少則是傾向統一者，僅佔 15.3%。

表 4-1 個體層次自變項資料的敘述統計表

連續變項	有效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年齡	1195	49.55	15.52	89.00	24.00
教育年數	1189	10.52	4.94	18.00	0.00
收入(1~10)	924	3.93	2.92	10.00	1.00
政治涉入度	783	0.00	0.90	2.30	-2.35
間斷變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數
有無政黨認同	有政黨認同		589	71.6	823
	無政黨認同		234	28.4	
族群認同	中國人或都是		428	50.7	844
	臺灣人		416	49.3	
統獨立場	傾向獨立		226	28.5	793
	傾向統一		121	15.3	
	傾向維持現狀		446	56.2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II)：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數據係作者自行計算所得。

而就總體層次來說，由下表 4-2 可發現，首先，選區中平均的政黨競爭程度為 11.08%，亦即第六屆不分區立委中，泛藍與泛綠間得票的平均差距在 11.08%，標準差則是 8.77%。其次是農牧人口比例，其平均數為 13.30%，標準差則是 13.50%。第三則是寺廟多寡，本資料中每一選區的平均寺廟數為 201.82 間，標準差則是 158.66 間。至於第四則是泛綠政黨平均三屆得票率，其平均數是 39.42%，意謂著平均來說，每一選區中，泛綠政黨自第四屆到第六屆立委的平均得票率係 39.42%，標準差則是 6.82%。最後則是地理區域，共計北部(即基隆市、新北市前身臺北縣、

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選區佔 45.5%，南部（即雲林縣、嘉義縣市、合併前臺南縣市、合併前高雄縣市、屏東縣）選區則是 33.3%，至於中部（即合併前之臺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與東部（即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選區則佔 21.2%。

表 4-2 總體層次自變項資料的敘述統計表

連續變項	有效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政黨得票率 邊際差	33	11.08	8.77	34.32	0.50
農牧人口比	33	13.30	13.50	40.29	0.24
寺廟數	33	201.82	158.66	694.00	30.00
泛綠政黨平均 三屆得票率	33	39.42	6.82	50.94	26.66
間斷變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數
地理區域	1. 北部		15	45.5	33
	2. 南部		11	33.3	
	3. 中部及東部		7	21.2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Ⅲ）：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數據係作者自行計算所得。

（二）依變項

本文以 TEDS2008L 問卷中，針對詢問受訪者「請問您投給這位候選人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此問項，來建構本文依變項，並將其依性質分為四大類，即「選區服務」（即專屬於特定候選人，但傾向於特殊性的利益連結，如增進地方繁榮、選民服務等）、「政黨因素」（包含政黨認同、特定政黨不認同以及其他有關政

黨政治考量或議題的因素，如政黨輪替與兩黨制衡）、「候選人形象」（即專屬於該特定候選人的能力特質，且不具特殊性利益的傾向，如能力形象、所提理念政見等），以及「人際網絡」（包含藉由私人與社會關係請託影響以及單純因為某些共同特徵而來的主觀心理認同，前者如家人支持、所屬團體支持、他人推薦等，後者則如在地人）四大類進行研究。

如下表 4-3 所示，在各類選民投票取向類型中，比率最高者是基於候選人形象的理由，佔 33.1%，其次分別是選區服務因素(29.1%)，第三則為政黨因素(24.8%)，至於人際網絡的因素則佔最少，僅達 13.0%。可見在採行單一選區制後，因為候選人形象、選區服務等候選人取向而投票的比例反而比政黨因素來得高。至於不同選民類型是否會影響對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以及其在不同環境系絡因素下又會出現哪種行為模式，則有待第二節和第三節進一步地分析與檢證。

表 4-3 選民投票取向分類的次數分配表

投票取向類型	人數	原始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選區服務	236	27.4	29.1
政黨因素	201	23.3	24.8
候選人形象	268	31.1	33.1
人際網絡	105	12.2	13.0
有效樣本數	810	94.1	100.0
遺漏值樣本	51	5.9	
總樣本數	861	100.0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Ⅲ）：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數據係作者自行計算所得。

第二節 第七屆立委選舉的變異數分析

此節主要是初步瞭解不同經濟水準、教育程度、政治涉入度的選民，與其所偏好的投票取向之間是否存有特定關係，而非進行嚴謹的因果關係檢證，故考量到經濟水準、教育程度、政治涉入度均係連續變項，而非類別變項，如強加分類以適用交叉分析，恐不免喪失一些資訊，遂仍採用變異數分析觀察偏好不同投票取向背後的選民類型是否有所差異，⁷⁶並將其整理至同表格之內方便統一說明。今介紹如下：

透過下表 4-4 的變異數分析可知，實證資料顯示，在 95%信心水準下，整體來說，不同投票取向的選民，其在收入、教育年數以及政治涉入度上均係有顯著差別。而以收入來說，多重比較結果顯示，以政黨因素投票的選民，其平均收入係顯著高於以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而以候選人形象投票的選民，其平均收入亦顯著高於以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至於其他投票取向間的平均收入差異則無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顯示較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其經濟水準應係較低，甚至低於以政黨因素或是候選人形象投票的選民，而與人際網絡相差不多。

而以教育年數而言，多重比較結果亦顯示，以政黨因素投票的選民，其平均教育年數係顯著高於以人際網絡或是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而以候選人形象投票的選民，其平均教育年數亦顯著高於以人際網絡或是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惟獨就政黨因素與候選人形象間，以及人際網絡與選區服務間而言，其選民平均教育年數係無顯著差異。可見，較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其教育程度應係較低，甚至低於以政黨因素或是候選人形象投票的選民，而與人際網絡相差不多。

⁷⁶ 申言之，有學者主張說交叉分析必須適用在自變項是類別變項，而依變項亦是類別變項的資料形式上，故因本文依變項是投票取向，係類別變項，然而自變項的教育年數、收入與政治涉入度，卻均係連續變項，故須加以分類，才能適用之。但筆者以為，由於此處僅是在初步觀察不同投票取向背後的選民類型是否有所差異，以探求不同類型的選民，與其所偏好的投票取向之間是否存有特定關係，而無任何因果關係的假定，故不妨以變異數分析進行觀察，以免因對選民類型的強加分類（如將教育年數或收入分為低、中、高三類），而喪失某些資訊。

以政治涉入度來說，多重比較結果顯示，以政黨因素投票的選民，其平均政治涉入度係顯著高於以人際網絡或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而以候選人形象投票的選民，其平均政治涉入度亦顯著高於以人際網絡投票的選民。至於以人際網絡投票的選民而言，其平均政治涉入度則顯著低於以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可見，較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其政治涉入度不若以政黨因素投票者來得高，但仍比人際網絡來得高，並和候選人形象取向相差不多。

表 4-4 收入、教育年數、政治涉入度與投票取向的變異數分析

選民投票取向		平均收入差距 (前減後)		
政黨因素	候選人形象	0.28417	F _{3,649} =8.502*** N=652	
	人際網絡	0.76546		
	選區服務	1.45258***		
候選人形象	人際網絡	0.48129		
	選區服務	1.16842***		
人際網絡	選區服務	0.68713		
選民投票取向		平均教育年數差距 (前減後)		
政黨因素	候選人形象	0.61593		F _{3,805} =13.061*** N=808
	人際網絡	2.38524***		
	選區服務	2.39085***		
候選人形象	人際網絡	1.76931*		
	選區服務	1.77493***		
人際網絡	選區服務	0.00562		
選民投票取向		平均政治涉入度差距 (前減後)		
政黨因素	候選人形象	0.05838283	F _{3,743} =11.795*** N=746	
	人際網絡	0.59542733***		
	選區服務	0.27809242*		
候選人形象	人際網絡	0.53704450***		
	選區服務	0.21970959		
人際網絡	選區服務	-0.31733492*		

說明：因收入、教育年數與投票取向的變異數齊一性檢定結果均小於0.05，故多重比較分析係皆以

變異數假設不齊一中的Dunnnett C檢定。而政治涉入度與投票取向的變異數齊一性檢定結果由於大於0.05，故多重比較分析係以變異數假設齊一中的Scheffe檢定進行。***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Ⅲ）：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數據係作者自行計算所得。

綜上觀之，初步分析顯示在尚未控制其他變項不變的情形下，在 95%信心水準時，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其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係較低，甚至低於政黨因素或候選人形象，而和人際網絡相差不多；而在政治涉入度上，偏好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其政治涉入度雖低於以政黨因素投票的選民，但卻比偏好人際網絡投票的選民來得高，且和候選人形象相差不多。凡此可見，不同投票取向背後的選民類型係有所差異，且多數和本文的假設預期一致，惟兩部分與本文原本預期有所差異，即偏好人際網絡與選區服務的選民，其經濟水準和教育程度係相差不多，以及傾向以政黨因素投票的選民，其政治涉入度係較偏好以選區服務取向投票者來得高。但由於此分析僅是觀察偏好不同投票取向的選民，其在經濟水準、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上是否有所差異，而無控制其他不論個體層次或是總體層次的變項，故確切的因果關係仍有待下一節以多層次分析進一步考量其他條件後，以更嚴謹的方式進行檢證。

第三節 第七屆立委選舉投票取向的多層次分析

本文係以不同地方政治生態與選民是否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之間的關係為研究主題，故將「選民投票取向」作為依變項，並依其性質分為「選區服務」、「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以及「人際網絡」，並分別以選民特性（即收入、教育年數和政治涉入度），以及選區的環境系絡因素（即政黨得票率邊際差、農

牧人口比例、寺廟數) 為個體層次和總體層次的解釋變項，並控制其他如個體選民的年齡、有無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統獨立場，與總體選區的泛綠平均三屆得票率、地理區域。而以「階層推廣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簡稱 HGLM) 中的「多層次多項勝算對數模型」(The multilevel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進行統計分析。

此外，由於本文探討重點在選區環境系絡因素對選民偏好選區服務態度的影響，故先循序漸進地以「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探討在不考慮任何環境系絡因素的情形下，不同選民類型對其偏好選區服務投票的影響模式，接著再納入環境系絡因素，進行「多層次多項勝算對數模型」(The multilevel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的分析，一則可先在個體層次檢定本文在投票取向的分類上，是否有違反選項間彼此不相關的假定(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 簡稱 IIA)，⁷⁷二則亦可初步觀察在尚未考量總體環境系絡時，選民自身特性與其投票取向間的關係。

如下表 4-5 的多項勝算對數分析表所示，本文在依變項分類上，四項取向類型均無違反 IIA 檢定，顯示筆者在投票取向上分為選區服務、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以及人際網絡四大類，彼此係屬獨立無關，可進行不同投票取向間的解釋因素比較。而有關不同類型選民對選區服務的偏好差異來說，大致上可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且尚未考量任何環境系絡因素時，「收入」與「教育年數」愈低的選民，愈顯著傾向以「選區服務」投票，而非「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而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則愈顯著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因素投票。至於此投票模式在不同環境系絡下，又會出現何種變化，則有待進一步多層次模型的分析，而這也是本研究核心所在，今筆者將其分為直

⁷⁷ 之所以在這邊先作無序多分類依變項的選項在分類上的獨立性檢定，即所謂不相關選項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 簡稱 IIA)假定的檢定，係由於在多層次模型中無法針對跨層級資料變項進行此種檢定，故筆者遂先在單純個體層次的多項勝算對數模型中進行。

接影響效果與間接影響效果介紹。

表 4-5 選民投票取向之多項勝算對數分析

	以選區服務為參照組					
	政黨因素		候選人形象		人際網絡	
	B	Exp	B	Exp	B	Exp
截距	-1.634 ⁺ (0.868)		-1.335 ⁺ (0.807)		-3.058** (1.079)	
收入	0.096* (0.046)	1.100	0.088* (0.043)	1.092	0.111 ⁺ (0.057)	1.118
教育年數	0.079 ⁺ (0.041)	1.082	0.082* (0.038)	1.086	0.087 ⁺ (0.050)	1.091
政治涉入度	0.158 (0.152)	1.171	0.119 (0.140)	1.126	-0.410* (0.188)	0.663
年齡	0.000 (0.011)	1.000	0.004 (0.010)	1.004	0.014 (0.013)	1.015
有無政黨認同 (有政黨認同為參照組)						
無政黨認同	-1.062*** (0.319)	0.346	-0.158 (0.256)	0.854	-0.011 (0.336)	0.989
族群認同 (台灣人為參照組)						
中國人或都是	0.576* (0.274)	1.779	0.078 (0.248)	1.081	0.185 (0.335)	1.204
統獨立場 (傾向維持現狀為參照組)						
傾向獨立	0.722* (0.307)	2.058	0.324 (0.282)	1.383	0.148 (0.378)	1.160
傾向統一	0.260 (0.329)	1.297	-0.037 (0.321)	0.963	-0.471 (0.479)	0.624
N	573					
LR χ^2 (df)	72.770(24)					
p-value	0.000					
Pseudo R ²	0.119					
IIA test	四項均通過					

說明：***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II)：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數據係作者自行計算所得。

而在進行多層次模型分析之前，透過下表 4-6 的零模型可知，在尚未放入任何自變項時，其「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簡稱 ICC) 分別為 4.09%、2.70% 以及 4.32%，顯示選區總體環境系絡因素對於選民之所基於政黨因素而非選區服務投票，佔有 4.09% 的解釋程度，而對於其內選民之所選擇候選人形象而非選區服務者，則佔有 2.70% 的解釋程度，至於對選區內選民偏好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者，則係佔有 4.32% 的解釋程度。顯示總體環境系絡因素對選民偏好不同投票取向的變異量解釋程度係不為 0，不同選區的確會因環境系絡上的差異，進而導致選民有不同的投票取向，足以說明本文在探究不同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是否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影響模式，係不論就學理上或是方法論上來說，均有其適當性與重要性。故本文接下來即針對不同環境系絡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依序分成直接與間接效果來看。

表 4-6 選民投票取向之零模型分析

固定效果	以選區服務為參照組					
	政黨因素		候選人形象		人際網絡	
	B	Exp	B	Exp	B	Exp
截距	-0.138 (0.118)	0.8708	0.161 (0.105)	1.174	-0.852*** (0.139)	0.4266
隨機效果	Var.	$\chi^2(df)$	Var.	$\chi^2(df)$	Var.	$\chi^2(df)$
$u_{0j(m)}$	0.140	42.491 ⁺ (32)	0.091	42.305 ⁺ (32)	0.1486	38.298 (32)
ICC(%)	4.09		2.70		4.32	

說明：***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

究規劃(Ⅲ):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數據係作者自行計算所得。

如下表 4-7 所示，模型一代表環境系絡對選民投票取向的直接影響效果，模型二則是繼續考量環境系絡對選民投票取向的間接影響效果。而由概似比檢定後的結果，不難發現多層次模型的解釋力係顯著地愈來愈好，故可認為增加環境系絡與不同教育程度、政治涉入度的選民之交互作用，確實會對模型的解釋力有所貢獻，從而有助於吾等更進一步瞭解哪些因素會影響選民在不同地方政治生態中的選區服務投票偏好，今針對模型一與模型二的檢證結果依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說明如下：

(一) 個體層次——選民特性的影響

在個體層次部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收入」與「教育年數」愈低的選民，依然愈顯著傾向以「選區服務」投票，而非「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與前面僅論及個體層次選民特性時的研究結果無異，且和本文假設一大致相同。此顯示「選區服務」不論相對於「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甚至是「人際網絡」來說，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愈低者顯然較重視「選區服務」，並以其作為抉擇立委候選人的主要取向，反之，經濟水準以及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則愈傾向「不」以「選區服務」作為投票主因的考量。

蓋知識水準不高、生活物質條件較差的選民，因較關心日常生活的切身利益，故本身即較具有「工具利益導向」的投票動機，以期望他所支持的候選人，日後可以成為請求協助解決私人問題的對象(高世垣，2001；趙永茂，1989：64-65)。因此，經濟水準以及教育程度愈不高的選民，會顯著傾向選擇得以提供特殊利益、實際解決週遭困難的「選區服務」作為抉擇候選人的主要原因。此足以顯示一則真正需要並會以選票回饋候選人選區服務的選民類型，係那些經社程度愈低的選民；二則對於教育程度與經濟水準愈高的選民來說，即便社經地位較高、較具獨

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基於理性抉擇考量，理當最不容易受到人際網絡的動員影響而投票，但相較於強調特殊利益的選區服務表現，由於人終究係一群居動物，無法無視於群體壓力與人情關係等社會和諧的考量——尤其對中華文化此一特別重視人際交往的民情來說。故權衡之下，其寧願選擇基於「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此雖迥異於過去西方學術主流的論述，但對於臺灣選舉文化來說，卻是在情理之中，顯示至少對臺灣來說，經濟水準和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其對於強調特殊利益的選區服務之反感，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甚至足已凌駕於人際網絡因素。

而以政治涉入度來說，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則愈顯著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因素投票，但卻對於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相對選區服務間的偏好程度相差不多，不完全符合本文假設一。蓋本文原本預期政治涉入度愈高者因愈擁有理解與處理政治資訊的知識能力與技巧，且往往主動與議員接觸、反映自身意見，並相信自身對政治資訊的判斷結果，因此除了較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投票之外，也不會盲目依賴政黨認同或政黨指令而決定投票抉擇。

而筆者認為之所以政治涉入度愈高者對於政黨因素的偏好與選區服務相差無幾，可能原因在於，即便本文已控制住其他如政黨認同的有無與族群意識、國家認同等條件，對政治涉入度愈高者投票取向的干擾，故可排除國內政治涉入度愈高者，或因對政黨、統獨意識形態偏好較強，而造成傾向政黨因素投票的可能。但由於本文的政黨因素此一投票取向，實際上包含了政黨議題等任何有關政黨的考量因素。尤其在立委改採單一選區制後，遂可能因政黨對決競爭趨勢的強化，而使得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傾向以政黨議題等原因投票，導致其對於政黨因素與選區服務的偏好係相差不多。至於對候選人形象相較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由於兩者均屬候選人因素，且本文已排除經社背景對高政治涉入度之於投票取向的影響，故不會有高政治涉入度但低經社程度者偏好選區服務而非候選人形象的疑

慮，因此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在蒐集瞭解相關資訊之後，對於候選人形象與選區服務之間的偏好態度係相差不多，惟獨不傾向以人際網絡因素投票，此符合本文預期。

（二）總體層次——環境系絡的影響

1、環境系絡的直接影響效果

而在總體層次部分，如先就環境系絡對選區內一般選民的影響效果來看，當政黨得票率邊際差愈小，表示政黨競爭程度愈大、選區政黨勢力愈呈現「膠著」狀態時，該選區選民則愈傾向以「候選人形象」與「政黨因素」投票，而非「選區服務」。以前者「候選人形象」相較於「選區服務」因素而言，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當政黨得票率邊際差愈低，即代表政黨競爭程度愈大，選區政黨勢力愈呈現「膠著」狀態，此時因雙方在該區並不具備任何顯著地政黨優勢，故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遂成為決勝的關鍵所在，故不僅所有議題政見均會趨於一致以爭取選票的極大化，連帶媒體對選情的關注程度亦會愈高，使得選情愈趨白熱化，各種與候選人相關的事情由此被爆料、揭露的可能性因而愈大，遂使得候選人形象（如清廉、是否有外遇、問政能力佳等）成為選戰中能夠也是唯一被凸顯的焦點，以試圖吸引中間選民的選票。因此，當政黨競爭程度愈大時，選民愈傾向以「候選人形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⁷⁸此符合本文假設二。

而以後者政黨因素相對於選區服務來說，筆者認為可能原因在於，誠如前文所言，在單一選區制後，因無形中強化兩黨競爭趨勢，在政黨競爭愈趨白熱化時（即政黨競爭程度愈大），遂可能一則強化政黨議題在選舉中的重要性，選民因

⁷⁸ 須注意的是，由於本文政黨競爭程度的操作型定義係為 2004 年不分區立委中，泛藍得票率扣掉泛綠得票率之差的絕對值，因此政黨競爭程度如愈低時，實際變項數值（即兩黨得票差）愈大，表示愈有一優勢政黨存在，反之，當政黨競爭程度如愈高時，實際變項數值（即兩黨得票差）愈小，表示愈沒有一優勢政黨存在，呈現兩黨勢力膠著化的現象。

而傾向以「政黨因素」而非「選區服務」投票；二則誠如 Duverger (1966) 所言，選民會爲了避免浪費選票，而傾向將選票轉投予原本不支持的兩大黨中較不厭惡的一方，以防止其最厭惡者當選，是謂棄保效應或策略性投票，此時特定政黨不認同即發揮影響力，趨使選民愈傾向以「政黨因素」而非「選區服務」投票。

而以農牧人口比例來說，模型顯示農牧人口比例愈高的選區，其選民雖看似因物質生活較差、所能進行行政救濟或是資訊提供的管道亦較匱乏，故會重視並傾向以選區服務投票，而非政黨因素或候選人形象，符合本文假設三預期方向，但此種差異卻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可能原因在於，在第七屆立委改成單一選區制之後，國會選舉的地方化造成實務上候選人普遍愈發重視選區服務，遂使得選民無論是否居於農村地區，其在對候選人抉擇的關鍵考量上，選區服務不再扮演最主要的影響角色，導致產業結構無法繼續成爲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偏好態度作爲投票取向的區辨因素。

至於人際網絡相對選區服務之間的關係，模型顯示農牧人口比愈高的選區，雖看似會使得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投票，但使種差異卻也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與本文假設四前半段相違；反觀寺廟數愈多的選區，則愈會造成選民顯著傾向以人際網絡因素而投票，而非選區服務，係與本文假設四後半段相符。筆者認爲，以前者來說可能原因在於，一則誠如前文所言，因實務上候選人普遍愈發重視選區服務，遂使得產業結構無法繼續成爲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偏好態度作爲投票取向的區辨因素。二則農牧人口愈多的農村地區，雖因物質生活水準較低，所能接觸與運用的資源資訊亦相對不如第二、三級產業盛行的都會區，故居民會較爲倚賴並重視選區服務；但也由於農村居住生活形態使然，使其居民人際關係較爲緊密，故在重視選區服務的同時，亦較容易受到人際網絡動員而影響其投票行爲，遂導致農牧產業結構對其選區選民之所偏好選區服務相對人際網絡的影響效果係相差無幾。顯示即便在經社環境變遷、地方派系式微之後的今天，農

村選民對選區服務強烈需求的出口已轉移到立委身上，成為立委最重視的工作之一，但農村地區依然利於候選人進行人際網絡動員，而使得以人際網絡進行拉票的成效可以在農村選民身上呈現出來，進而與選區服務並駕齊驅。

而以後者來說，由於宗教寺廟係透過自身作為地方聚集與資訊傳播的功能，藉由居民與居民間、神職人員與居民間的互動過程，建立起一套人際關係網絡，且對地方神祇的崇拜，維繫或復甦了當地居民傳統價值與忠誠度，亦壯大了宗族網絡的力量，再加上對信徒所擁有的宗教信仰力量，遂使其在地方上具有強大的宗教動員能力，不僅在地方上扮演重要的人際交流平臺，更對地方居民投票行為的形塑扮演一定程度的影響性。故使得寺廟數愈多的選區，其選民較顯著傾向以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而投票。此顯示由於實務上目前不論個案服務的數量與性質都變得更多且更多元化，使得政治人物已無多餘心力付出甚或是需要仰賴對廟方與信徒此一特定群體的選區服務以增加票源，遂使得宗教動員力在現今立委選舉中的主要角色，已回歸到原本核心的人際網絡動員，而非藉由對特定群體選區服務以建立特定票源此一附加價值。

2、環境系絡的間接影響效果

如就環境系絡對選區內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愈高選民的影響效果來說，由同表模型二可知，農牧人口比僅會對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顯著「削弱」其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的投票取向，卻不會對教育年數愈高的選民，產生任何顯著的影響，與本文假設五相符合；反觀寺廟數來說，其雖不會對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投票取向產生顯著的影響，但卻會對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增強」其傾向採取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的態度，亦符合本文假設六的預期。

筆者認為之所以如此，在於農牧產業結構與宗教動員力兩者，雖皆利於人際

網絡的動員，但彼此的動員性質與成效卻有所差異。蓋農村地方選民較為重視人際網絡與選區服務，且因成員流動率較低，容易形塑較為封閉、地域性色彩較重的小生活圈，故對異議聲音的包容性可能較低；再加上農村居民本就不習慣主動對政治事務表達看法，除非刻意提及，否則日常話題多半不會圍繞著政治事務。故筆者認為，農村的人際網絡型態要能對投票行為確實發揮影響力，使其凌駕於對週遭生活利益的重視（即選區服務），主要係取決於居民平常是否「頻繁地討論政治」。

因此，即便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其係較傾向採取「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的投票取向，但是若該選民處在民風較為封閉、較重視人際網絡、又對異議包容性較低、群體壓力較大的農村地區時，遂容易透過「頻繁地人際溝通討論」而影響其投票行為，轉而偏向以「人際網絡」因素投票，而非「選區服務」。至於對教育年數愈高的選民來說，即便其本就不傾向以選區服務投票，但也不必然對政治熱衷、常與人談論政治，故即便處在農村地區，要受到人際交往溝通進而更形強化其以人際網絡動員而投票的可能性遂較低。

而以寺廟數而言，誠如前文所言，因宗教動員力在現今立委選舉中的主要角色，已回歸到原本核心的人際網絡動員，而非藉由對特定群體選區服務以建立特定票源此一附加價值，故不僅其所具有的人際網絡動員成效非選區服務所能撼動，更無須以「頻繁地政治討論」來達到動員效果，蓋宗教寺廟與地方政治勢力的關係早就存在臺灣地方政治生態中，故有廟宇的地方，多少會受到政治勢力的介入，因此即便居民不一定主動與人談論政治，只要所處環境寺廟眾多，在長期參與廟會活動、往來寺廟之後，遂多少容易受到宗教動員的影響。

因此，即便對原本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來說，因其所能接觸資訊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較強，再加上較明瞭中央民代本身的角色與職責，遂並不特別重視強調特

殊利益的選區服務，故相對於「選區服務」此一投票取向，其寧願以「人際網絡」作為投票抉擇時的主因考量，倘若又處在寺廟數眾多的地方，由於日常休閒多圍繞著寺廟，容易受到人際網絡影響的可能性也較大，故愈「增強」其傾向以「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因素投票。然而，亦正由於此動員力係由宗教信仰而來，在凝聚地方意識的同時，亦具有廣泛的包容力，故不容易對政治涉入度高、自主性強的選民造成強烈的人際壓力，甚至是迫使其改變投票行為——即便該選民的政治傾向迥異於週遭聲音。這也是為何宗教動員力愈強的地方，既不會削弱也不至於會增強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投票的原因。

凡此顯示即便在經社環境變遷、司法改革與民智開展、地方派系式微之後的今天，農村選民對選區服務強烈需求的出口已轉移到立委身上，成為立委最重視的工作之一，但農村地區仍具有人際網絡動員的優勢——只是需要透過另一種「群體壓力」的形式方能在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身上顯著表現出來，進而使其轉向以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故大體來說，人際網絡動員雖然仍在現今立委選舉中對選民投票行為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其所憑藉的最有效途徑，已逐漸從過去大家所普遍認知的農牧產業形態轉移到宗教動員此一社會文化因素。蓋宗教動員力在現今立委選舉中的主要角色，已回歸到原本核心的人際網絡動員，而非藉由對廟方與信徒此一特定群體選區服務以建立特定票源，故其所具有的影響效果，係較農牧產業結構來得直接與廣泛。

表 4-7 選民投票取向之多層模型分析（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

固定效果	以選區服務為參照組											
	模型一（直接效果）						模型二（間接效果）					
	政黨因素		候選人形象		人際網絡		政黨因素		候選人形象		人際網絡	
	B	Exp	B	Exp	B	Exp	B	Exp	B	Exp	B	Exp
截距	0.537 (1.608)	1.711	0.496 (1.436)	1.642	-2.935 (1.953)	0.053	0.440 (1.611)	1.553	0.418 (1.443)	1.519	-1.854 (2.068)	0.157
選民特性												
收入	0.102* (0.048)	1.107	0.087+ (0.045)	1.091	0.116+ (0.059)	1.123	0.101* (0.048)	1.106	0.086+ (0.045)	1.090	0.122* (0.060)	1.130
教育年數	0.088* (0.043)	1.092	0.087* (0.040)	1.091	0.104* (0.052)	1.110	0.086* (0.043)	1.090	0.086* (0.040)	1.090	-0.009 (0.078)	0.991
政治涉入度	0.171 (0.154)	1.187	0.152 (0.141)	1.164	-0.429* (0.194)	0.651	0.172 (0.154)	1.187	0.150 (0.142)	1.161	-0.761* (0.329)	0.467
年齡	-0.001 (0.011)	0.999	0.003 (0.010)	1.003	0.013 (0.014)	1.013	-0.001 (0.011)	0.999	0.003 (0.010)	1.003	0.014 (0.014)	1.014
有無政黨認同 (有政黨認同為參照組)												
無政黨認同	-1.035** (0.322)	0.355	-0.093 (0.259)	0.911	0.030 (0.342)	1.031	-1.026** (0.322)	0.358	-0.084 (0.259)	0.919	0.038 (0.348)	1.039
族群認同 (臺灣人為參照組)												

中國人或都是	0.586*	1.798	0.052	1.054	0.085	1.089	0.591*	1.806	0.055	1.057	0.107	1.113
	(0.279)		(0.254)		(0.345)		(0.279)		(0.254)		(0.352)	
統獨立場												
(維持現狀為參照組)												
傾向統一	0.242	1.273	-0.038	0.963	-0.459	0.632	0.246	1.279	-0.032	0.968	-0.507	0.602
	(0.335)		(0.326)		(0.488)		(0.335)		(0.326)		(0.499)	
傾向獨立	0.707*	2.028	0.292	1.339	0.039	1.040	0.713*	2.041	0.299	1.349	0.032	1.032
	(0.309)		(0.285)		(0.387)		(0.309)		(0.285)		(0.393)	
選區環境												
政黨得票率邊際差	-0.030 ⁺	0.971	-0.043*	0.957	-0.022	0.979	-0.029 ⁺⁷⁹	0.971	-0.043*	0.958	-0.019	0.982
	(0.018)		(0.016)		(0.022)		(0.017)		(0.016)		(0.022)	
農牧人口比	-0.007	0.993	-0.006	0.994	-0.012	0.988	-0.006	0.994	-0.006	0.994	0.013	1.013
	(0.014)		(0.012)		(0.018)		(0.014)		(0.013)		(0.041)	
寺廟數	-0.000	1.000	0.000	1.000	0.003 ⁺	1.003	0.000	1.000	0.000	1.000	-0.004	0.99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4)	
泛綠平均三屆得票率	-0.041	0.960	-0.032	0.968	-0.016	0.984	-0.040	0.961	-0.031	0.969	-0.014	0.986
	(0.029)		(0.025)		(0.037)		(0.029)		(0.025)		(0.036)	
地理區域												
(南部為參照組)												

⁷⁹ 在模型二中，因加入環境系絡的間接影響效果後，而使得政黨得票邊際差的 P 值升至 0.104，但由於仍處於邊際水準 0.10 附近，故筆者將其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三位後，仍將其視為顯著（即 $P \leq 0.10$ ）。

北部	-0.318 (0.369)	0.728	0.064 (0.324)	1.066	0.222 (0.457)	1.249	-0.291 (0.368)	0.747	0.084 (0.325)	1.088	0.213 (0.455)	1.237
中部與東部	-0.365 (0.372)	0.694	-0.205 (0.327)	0.815	0.416 (0.422)	1.515	-0.338 (0.370)	0.713	-0.182 (0.327)	0.834	0.362 (0.432)	1.436
<i>交互作用</i>												
教育年數 * 農牧人口比											-0.002 (0.003)	0.998
教育年數 * 寺廟數											0.001* (0.000)	1.000
政治涉入度 * 農牧人口比											0.024+ (0.014)	1.024
政治涉入度 * 寺廟數											-0.001 (0.001)	0.999
隨機效果	Var.				χ^2 (df)		Var.				χ^2 (df)	
$u_{0j(1)}$	0.0547				22.910 (26)		0.051				23.035 (26)	
$u_{0j(2)}$	0.008				18.904 (26)		0.009				18.985 (26)	
$u_{0j(3)}$	0.037				21.139 (26)		0.030				20.481 (26)	
模型優劣比較						LR χ^2(df)						
LR test						21.148 (4) ***						

說明：***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固定效果中的括號內數值係標準誤。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Ⅲ）：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數據係作者自行計算所得。



第五章 結論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係透過對 2008 年第七屆區域立委選舉的研究，瞭解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候選人在實務上普遍重視選區服務，那哪些類型的選民會如候選人所想般，基於選區服務而投票？哪些類型的選民不會？又是什麼投票取向能凌駕於選區服務？以及選民之所以如此考量，背後又究係受到不同環境系絡因素的何種影響，包括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效果。俾釐清經濟水準、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對選民偏好選區服務投票與否的確切影響模式，以及選民之所以如此考量，背後又究係受到不同環境系絡因素（如農村地區等）的何種影響，包括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效果。

自是，有別於傳統針對候選人勝選因素的綜合評估或是僅從立委角度針對選區服務對其當選或連任影響作探討，本文係以選民的「投票取向」為分析標的，而以選民的「經濟水準」、「教育程度」與「政治涉入度」三項，作為個體層次的解釋因素，而以選區的「政黨競爭程度」、「產業結構」，以及「宗教動員力」作為總體層次環境系絡的解釋因素，並把其他可能會影響解釋因素與分析標的間因果關係的因素，但非本文關心重點者視為控制因素，如個體層次選民的年齡、有無政黨認同、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以及總體層次選區的泛綠政黨版圖、地理區域，並把總體環境系絡的直接與間接效果視為分析重點，進行「多層次多項勝算對數模型」（The multilevel multinomial logit model）分析，俾釐清本文主旨。

研究顯示，本文分析結果多數和前文假設相符，如在個體層次上，選民「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愈高」者愈顯著傾向以「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甚至是「人際網絡」作為抉擇候選人的主因，而非「選區服務」。而「政治涉入度」愈高者，則愈顯著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作為投票取向，至於對「政

黨因素」和「候選人形象」的偏好，則係與「選區服務」相差不多——即便已控制住其他如政黨認同的有無與族群意識、國家認同等條件。可見，一則立委改採單一選區制後，因政黨對決競爭趨勢的強化，而使得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傾向以政黨議題等原因投票，導致其對於政黨因素與選區服務的偏好係相差不多；二則因候選人形象與選區服務兩者均屬候選人因素，再加上已排除經社背景對高政治涉入度對於投票取向的影響，故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在蒐集瞭解相關資訊之後，對於候選人形象與選區服務之間的偏好態度係相差不多。

而在總體層次上，以環境系絡的直接效果來說，當政黨競爭程度愈大、選區政黨勢力愈呈現「膠著」狀態時，該選區選民則愈傾向以「候選人形象」與「政黨因素」投票，而非「選區服務」。而宗教動員力愈強的選區，其選民即愈顯著傾向以「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而投票。如就環境系絡的間接影響效果而言，本身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若處在農牧人口比愈多的農村地區，則會「削弱」其「不」傾向採取「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的態度；反觀宗教動員力雖因本身廟埕性質與廟會活動所扮演資訊傳播和人情交流的角色，故會顯著「直接」影響一般選民傾向以「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而投票，但對「政治涉入度愈高」者而言，因宗教在凝聚地方意識的同時，也具有廣泛的包容力，反倒讓那些「政治涉入度高」的選民得以保留或維持心中定見，而「不會」就此削弱其傾向「選區服務」而非「人際網絡」投票的態度。然而對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來說，因其本身即傾向以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而投票，故處在寺廟愈普遍的選區，更會「增強」其傾向採取「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的態度。

總而言之，透過本文研究不難發現在第七屆區域立委選舉中，有幾點係值得吾人深思：

第一、此次選舉中，基於「候選人形象」抉擇立委人選的選民比例最高，佔

33.1%，其次分別是「選區服務」（29.1%）、「政黨因素」（24.8%）與「人際網絡」（13.0%）因素，可見在採行單一選區制後，因為候選人形象、選區服務等候選人取向投票的選民比例，反而比政黨因素來得高。至於選區服務之所以僅列居第二，可能原因在於區域立委選舉規模的縮小，雖不可避免帶來選區服務重要性的相對提升，但充其量僅對教育程度與經濟水準不高的弱勢選民較具吸引力。這或許可用來說明，為何之後民進黨即便提名基層實力雄厚的現任立委或縣市長參選，但是在某些經社水準較高的選民居多數的地區，其得票結果仍是未如國民黨來得亮眼。⁸⁰

第二、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愈低的選民因知識水準不高、生活物質條件亦較差，故較關心日常生活的切身利益，以期望他所支持的候選人，日後可以成為請求協助解決私人問題的對象，故會傾向以「選區服務」投票，而非「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甚至是「人際網絡」。此足以證明一則真正需要並會以選票回饋候選人選區服務的選民類型，係那些經社程度愈低的選民。二則顯示至少對臺灣來說，經濟水準和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其對於強調特殊利益的選區服務之反感，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甚至足已凌駕於人際網絡因素。蓋由於人終究係一群居動物，無法無視於群體壓力與人情關係等社會和諧的考量——尤其對中華文化此一特別重視人際交往的民情來說。故權衡之下，其寧願選擇基於「人際網絡」的人情壓力投票，而非「選區服務」此一強調特殊利益的表現。此雖有違一般西方學術主流的論述，但對於臺灣選舉文化來說，卻是在情理之中。

第三、就產業結構來說，農牧比例愈多的農村地區，其居民對「選區服務」相較於「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甚至是「人際網絡」來說，雖皆符合本文預期方向，但卻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除了顯示誠如前文所提，因國會選舉

⁸⁰ 如台南市國民黨籍立委候選人蘇俊賓在文教區的選票即小贏民進黨籍前任市長許添財一千多票，從而拉近兩者的得票差距。

的地方化造成實務上候選人普遍愈發重視選區服務，而使得選民無論是否居於農村地區，其在對候選人抉擇的關鍵考量上，選區服務不再扮演最主要的影響角色，導致產業結構無法繼續成爲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偏好態度作爲投票取向的區辨因素。更進一步意味著即便農牧產業結構無法成爲區辨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作爲投票取向的關鍵要素，但農村地區選民仍對選區服務具有一定的重視程度，遂使其略甚於人際網絡動員一籌，只是其差異未達統計上顯著性。

第四、大體來說，在經社環境變遷、司法改革與民智開展、地方派系式微之後的今天，農村選民對選區服務強烈需求的出口已轉移到立委身上，成爲立委最重視的工作之一，但農村地區仍具有人際網絡動員的優勢——只是需要透過另一種「群體壓力」的形式方能在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身上顯著地表現出來，進而使其轉向以人際網絡而非選區服務投票。故人際網絡動員雖然仍在現今立委選舉中對選民投票行爲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其所憑藉的最有效途徑，已逐漸從過去大家所普遍認知的農牧產業形態轉移到宗教動員此一社會文化的因素，蓋宗教動員力在現今立委選舉中的主要角色，已回歸到原本核心的人際網絡動員，而非藉由政治人物對廟方與信徒此一特定群體進行選區服務以建立特定票源的功能，故其所具有的影響效果，係較農牧產業結構來得直接與廣泛。

總括來說，透過本文可以發現，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是否偏好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影響力確實是不容忽視且值得深究，蓋選區規模的銳減，的確讓某些原本傳統上認爲會促使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投票的環境系絡角色，爲之一變。且實務上立委所強調的「里長級服務」，事實上亦僅對經社程度較低的此類選民具有顯著的吸引力，而當選區政黨競爭程度愈大時，政黨因素與候選人形象的影響性即可勝過選區服務，甚至人際網絡因素更可以透過選區宗教動員的力量，進而凌駕傳統社會中選民偏好選區服務投票的現象——這亦是爲何既然實務上候選人普遍重視選區服務，其仍無法無往不利地凌駕於政黨因素、候

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的原因。

至於此種在不同環境系絡底下，所形塑出選民對選區服務相異的偏好模式，是否屬於一種長時間「穩定趨勢」，本文無法有效回答，蓋由於區域立委選舉中，候選人人數眾多，故筆者為建立一個涵蓋各種投票取向且普遍適用於全國的投票模型，僅得以選民投票予所選立委候選人的主因作為衡量投票取向的操作型定義，故囿於問項限制，遂以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選後面訪的追蹤樣本分析，而無法擴及 2008 年的橫斷面調查以及 2012 年的第八屆立委選舉，不僅無法增加觀察樣本、或避免追蹤資料所可能帶來有關樣本代表性與訪問效應的疑慮，亦無法進一步分析此現象在第七屆、第八屆區域立委選舉中的長期趨勢，是為一大缺憾。



參考文獻

壹、中文書目

丁仁方，1999，〈統合化、半侍從結構、與台灣地方派系的轉型〉，《政治科學論叢》，10：59-82。

中央選舉委員會，2012，〈選舉資料庫網站〉，<http://db.cec.gov.tw/cehead.asp#>，查閱時間：2012/3。

王均，2010，《我國南部選民投票行為之研究-2008年總統選舉分析》，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

王見川，2000，《臺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台北：博揚文化。

王金壽，1997，〈國民黨候選人買票機器的建立與運作：一九九三年風芒縣長選舉的個案研究〉，《台灣政治學刊》，2：3-62。

王金壽，2004a，〈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為例〉，《台灣社會學》，第七期，頁 177-207。

王金壽，2004b，〈重返風芒縣：國民黨選舉機器的成功與失敗〉，《台灣政治學刊》，第八卷，第一期，頁 99-146。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王順民，2007，〈神威、顯赫、大甲媽！！——兼論變遷中的宗教福利〉，「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2007/05/07，社會(研)096-004 號，網址：<http://www.npf.org.tw/post/2/2163>。

王業立，1998，〈選舉、民主化與地方派系〉，《選舉研究》，5（1）：77-94。

王業立，2006，〈棄保成功否，民調最重要〉，《聯合報》，12月3日，版 A15。

- 王業立、彭怡菲，2004，〈分裂投票：一個制度面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8（1）：3-45。
- 王業立、蔡春木，2004，〈從對立到共治：台中縣地方派系之轉變〉，《政治科學論叢》，21：189-216。
- 王鈺婷，《藍綠版圖之空間分布與變遷：第三屆至第七屆立委選舉結果之探討》，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鼎銘，2003，〈政策認同下的投票效用與選擇：空間投票理論在不同選舉制度間的比較〉，《選舉研究》，10（1）：171-206。
- 王鼎銘，2003，〈策略投票及其影響之檢測：2001年縣市長及立委選舉結果之探討〉，《東吳政學報》，16：95-123。
- 王鼎銘、郭銘峰、黃紀，2008，〈選制轉變過程下杜佛傑心理效應之檢視：從日本眾議院選制變革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與研究》，47（3）：1-28。
- 世界宗教博物館，2013，〈台灣民間信仰〉，http://www.mwr.org.tw/tw_religion/，查閱時間：2013/1。
- 仇德哉，1983，《台灣之寺廟與神明》，台中：台灣省文獻會。
- 包正豪，1997，《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新黨競選策略之研究：以台北市、台北縣與桃園縣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包正豪，2011，〈原住民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1992-2008 立委選舉的總體資料分析〉，《選舉研究》18（2）：1-24。
- 朱雲漢，1994，「成也財團黑道，敗也財團黑道」，中國時報，十二月三十日，版 11。
- 朱雲漢，2008，〈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II)：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96-2420-H-002-025，台北：行政院國科會。

江肇國，2004，《金錢與選舉動員》，台北：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行政院內政部，2012，〈全國宗教資訊系統〉，<http://religion.moi.gov.tw/web/04.aspx>，

查閱時間：2012/8。

行政院主計處，2012，〈9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縣市鄉鎮資料查詢系統〉，

http://ebas1.ebas.gov.tw/agr/ics_main.asp，查閱時間：2012/3。

何金銘，1995，〈勝選因素：北高兩市二屆立委選舉比較研究〉，《選舉研究》，1(2)：163-198。

何金銘，1995，〈賄選現象與賄選效果：高雄市第二屆立委選舉的個案分析〉，《政治科學論叢》，6：109-144。

何思因，1994，〈台灣地區選民政黨偏好的變遷：1989-1992〉，《選舉研究》，1(1)：39-52。

余光弘，1982，〈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3：67-105。

吳忠晏，2009，《第七屆立法委員候選人競選策略之研究：以屏東縣第三選區候選人潘孟安個案分析》，私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

吳芳銘，1996，《地方派系的結盟與分化變遷之研究：以嘉義縣和高雄縣為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重禮、許文賓，2003，〈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以二〇〇一年台灣地區選民政黨認同的決定因素為例〉，《政治科學論叢》，18：101-140。

吳重禮、許玉芬，2005，〈選民「垂直式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投票行為：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的實證分析〉，《臺灣民主季刊》，2(2)。

吳重禮、黃紀，2000，〈雲嘉南地區賄選案例判決的政治因素分析：層狀勝算對數模型之運用〉，《選舉研究》，7(1)：87-113。

- 吳重禮、鄭文智、崔曉倩，2006，〈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2001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的實證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4）：599-638。
- 吳偉立、洪永泰，2005，〈第五屆立委選舉台聯候選人的得票分布：三種得票離散程度衡量工具的分析〉，《選舉研究》，12（2）：189-212。
- 吳親恩，2008，〈地方議會金權政治的變化：司法判決書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2（2）：165-212。
- 吳親恩，2012，〈立法委員選舉的賄選誘因與效果：從SNTV到FPTP〉，《臺灣民主季刊》，9（1）：41-80。
- 吳親恩、李鳳玉，2012，〈政黨因素還是候選人因素：單一選區制下選民的投票抉擇〉，尚於期刊審核階段。
- 李世宏，2008，〈台北市民進黨忠誠支持者變化之初探：1994年、1998年市長選舉與2000年、2004年總統選舉之差異比較〉，《政治科學論叢》35：95-126。
- 杜慶承，2005，〈中央政權輪替對地方派系的影響—彰化縣個案研究〉，《選舉研究》，第十二卷，第一期，頁117-145。
- 沈體雁、馮等田、孫鐵山，2010，《空間計量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 周宗禎，2007，〈11寇多落榜 地下電台歡呼〉，《聯合報》電子新聞，轉載自「苦勞網」，2007/5/18，網址：<http://www.cooloud.org.tw/node/2726>。
- 周明慧，1991，《美國現任眾議員連任優勢之研究：選區服務與國會選舉》，私立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應龍，2012，《台灣南部綠色政治版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 林岳賢，2009，《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競選策略之研究—以宜蘭縣立法委員林建榮為例》，國立佛光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長志，2010，《立委選制變遷對選民投票行為之影響：投票穩定與變遷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啓耀，2011，〈票房良藥或毒藥？探討馬政府施政滿意度對立委補選之影響〉，《選舉研究》，18（2）：31-57。
- 林國政，2007，《影響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選民投票行為因素分析—以桃園縣第 4 選區（桃園市）為例》，私立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林新輝，2007，〈小選區「民代地方化」像選村里長〉，《聯合報》，11 月 5 日，轉引自 <http://blog.udn.com/pospo/1349839>。
- 林瓊珠，2008，〈議題、候選人評價、黨派意識—2006 年台北市長選舉投票行為研究〉，《台灣民主季刊》，5（2）：59-87。
- 林繼文，1999，〈地盤劃分與選舉競爭：對應分析法在多席次選舉研究上之應用〉，《選舉研究》，5（2）：103-128。
- 邱莉莉，2009，《選制變革對選舉動員的影響——台南縣市民進黨立委候選人個案分析》，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邱雅萍，2009，《政治媒介使用、人際傳播網絡與投票抉擇相關性因素探討：以 2006 年高市長選舉為例》，私立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 金溥聰，1998，〈報紙的形象設定效果研究：以民國八十三年台北市市長選舉為例〉，《新聞學研究》，55：203-223。
- 金耀基，1992，《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俞振華，2012，〈探討總統施政評價如何影響地方選舉——以 2009 年縣市長選舉為例〉，《選舉研究》，19（1）：69-95。
- 洪永泰，1994，〈選舉預測：一個以整體資料為輔助工具的模型〉，《選舉研究》，1（1）：93-110。

- 洪永泰，1995，〈分裂投票：八十三年台北市選舉的實證分析〉，《選舉研究》2（1）：119-145。
- 洪永泰，1999，〈傳統與現代：八十六年桃園縣長選舉的選後評估〉，《選舉研究》，6（2）：1-21。
- 洪永泰，2001，〈政黨認同、領袖魅力與選舉競爭〉，「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2001/10/22，內政（研）090-051號，網址：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IA/090/IA-R-090-051.htm>。
- 洪永泰，2003，〈真有「南方政治」嗎？〉，「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2003/08/19，內政（評）092-154號，網址：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IA/092/IA-C-092-154.htm>。
- 洪永泰，2005，〈TEDS 面訪成功定義之探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方法工作坊」學術研討會，3月26、27日，台北：政治大學。
- 胡幼偉，1997，〈選舉新聞的第三者效果〉，「中華傳播學會第一屆年會」論文，臺北：中華傳播學會。
- 胡佛、陳德禹、朱雲漢、洪永泰、張佑宗，2001，〈投票行為與選舉實務的評估——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中央選舉委員會。
- 胡佛、游盈隆，1983，〈選民的投票取向：結構與類型的分析〉，《政治學報》，11：225-278。
- 胡佛、游盈隆，1985，〈選民的投票動機〉，《社會科學論叢》，33：1-29。
- 徐火炎，1991，〈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台灣地區選民對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4（1）：1-57。
- 徐火炎，2001，〈一九九八年二屆臺北市長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分析：選民的黨派抉擇與分裂投票〉，《東吳政治學報》，13（9）：77-127。

- 徐火炎，2005，〈認知動員、文化動員與台灣 2004 年總統大選的選民投票行爲——選舉動員類型的初步探討〉，《臺灣民主季刊》，2（4）：31-66。
- 徐永明，2000，〈「南方政治」的形成？台灣政黨支持的地域差別，1994-2000〉，《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2（4）：167-196。
- 徐永明，2001，〈政治版圖：兩個選舉行爲研究途徑的對話〉，《問題與研究》，40（2）：95-115。
- 徐永明，2011，〈台北雙城記？一個選舉地理的考察〉，《東吳政治學報》，29（2）：181-217。
- 徐永明、林昌平，2008，〈統計方法與理論驗證的繆誤相關：以政治版圖變遷的研究為例，1989-2004〉，《東吳政治學報》，26（2）：83-115。
- 徐永明、陳鴻章，2004，〈地方派系與國民黨：衰退還是深化？〉，《台灣社會學》，8：193-228。
- 耿曙、陳陸輝，2003，〈兩岸經貿互動與台灣政治版圖：南北區塊差異的推手？〉，《問題與研究》，42（6）：1-27。
- 袁易，1994，〈地方意識、區域認同與華南農民之社群動員〉，《中國大陸研究》，37（8）：5-20。
- 高世垣，2001，〈選區服務與個人選票之建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高永光，2000，〈城鄉差距與地方派系影響力之實證研究：年台北縣縣議員與鄉鎮市長選舉之個案分析〉，《選舉研究》，7（1）：55-88。
- 張世仁，2001，〈政治版圖之強度與穩定度分析：以台北縣 1995 年、1998 年、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張世澤，1999，〈「都市化」、「派系得票率」及「選舉投票率」關係之研究：新竹縣（市）的個案分析〉，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世澤，2000，〈地方派系得票率之分析--1998年新竹縣（市）立法委員選舉的個案研究〉，《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8（2）：119-155
- 張佑宗、周宛蓉，2009，〈邁向地方型或全國化的選舉競爭？台灣 2008 年立委選舉政黨得票變異的分析〉，發表於《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畫》（TEDS 2008L）學術研討會，台北：台大社科院國際會議廳，2009 年 1 月 17-8 日。
- 張佑宗、湯晏甄，2010，〈選舉競爭與投票率的變化：台灣第七屆立委補選結果的分析〉，發表於《新區劃、新思維：2010 年地方自治新局的開創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系，2010 年 6 月 18 日。
- 張佑宗、趙珮如，2006，〈社會脈絡、個人網絡與台灣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選民的投票抉擇〉，《台灣民主季刊》，3（2）：1-38。
- 張志仲，2007，〈台北縣汐止市政治版圖變遷之分析：2001-2004 的立法委員選舉為例〉，佛光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張茂桂、陳俊傑，1986，〈現代化、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投票率之關係--自由派理論再檢討〉，《投票行為與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治學會。
- 張益超，1999，〈選民投票穩定程度之研究：嘉義市第四屆與第五屆市長選舉之分析〉，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曹瑞泰，2005，〈日本選制發展與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施行之研究〉，《立法院新聞》，33（10），臺北：立法院院聞出版社。
- 梁漱溟，1982，《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台北：九鼎出版社。
- 盛杏媛，1999，〈政黨配票與立委候選人票源的集散度：1983 至 1995 立法委員之分析〉，《選舉研究》，6（2）：73-102。

- 盛杏媛，2005，〈立法院委員會分配的影響因素與政治後果〉，林繼文主編，《政治制度》，頁 361-399，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 盛杏媛，2008，〈如何評估選制變遷對區域立委的代表角色與行為的影響：研究方法的探討〉，黃紀、游清鑫主編，《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頁 223-247，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盛杏媛，201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定群追蹤資料的運用〉，《選舉研究》，17（2）：1-33。
- 盛杏媛、陳義彥，2003，〈政治分歧與政黨競爭：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10（1）：7-40。
- 盛治仁，2000，〈總統選舉預測探討：以情感溫度計預測未表態選民的應用〉，《選舉研究》，7（2）：75-107。
- 盛治仁，2001，〈總統選舉預測探討—以情感溫度計預測未表態選民的應用〉，《選舉研究》，7（2）：75-107。
- 莊天憐，1999，《我國獨立選民的發展與變遷（1989~1999）》，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天憐，2001，〈我國獨立選民的發展與變遷：1989?1999〉。《選舉研究》，8(1)，71-115。
- 莊淑媚、洪永泰，2012，〈特定政黨不認同：臺灣地區民意調查中關於政黨認同的新測量工具〉，《選舉研究》，18（2）：1-29。
- 許文賓，2003，《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以二〇〇一年台灣地區選民政黨認同的決定因素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陳世敏，1996，「臺灣選舉文化之世俗化」，投票行為與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治學會，頁 206-238。
-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

- 陳明通、朱雲漢，1992，〈區域性聯合獨佔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一項省議員候選人背景分析〉，《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1)：77-97。
- 陳東升，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陳政聞，2004，《候選人競選策略與選舉動員之研究---2002年高雄市長選舉謝長廷個案分析》，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昭凱，1997，《立法委員連任之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陳美華，1995，《台灣地下電台之研究—成因與問題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若蘭，2001，〈台北市選民投票變遷之研究：民國八十三年與八十七年台北市長選舉之分析〉，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清河，2005，《台灣地下電台角色的變遷（1991-2004）》，私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陸輝，1999，〈「固定樣本連續訪談法」(Panel studies)樣本流失問題之探討〉，《選舉研究》，6(1)：175-204。
- 陳陸輝、耿曙，2008，〈政治效能感與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以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為例〉，《台灣民主季刊》，5(1)：87-118。
- 陳惠玲，2007，《女性獨立選民的政黨形象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義彥，1994，〈我國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從民國82年縣市長選舉探析〉，《政治學報》，23：81-132。

- 陳嘉彰，2004，〈地下電台管理政策研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
2004/08/17，教文（研）093-006 號，網址：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EC/093/EC-R-093-006.htm>。
- 陳錦榮，1997，《政治信念、策略抉擇與選舉效能：1994 年臺北市長三個個案之
比較分析》，私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陳譽文，2011，〈選民與政治人物連結類型與其變遷——以 2004 年及 2008 年總
統選舉與立委選舉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曾國鈞，2001，《地方政治生態與市地重劃關係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台中：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游盈隆，1993，〈政治信念、競選策略與選舉動員：臺灣地區二屆立委候選人競
選模式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2：375-395。
- 游盈隆，1994，〈政黨形象、意識型態與台灣選舉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集刊》，78：61-99。
- 游盈隆，1996，《民意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
- 游清鑫，2003，〈探?台灣選民心目中?想的候選人：以 2000 年總統選舉為例〉，
《東吳政治學報》，17：93-120。
- 游清鑫，2006，〈分裂投票解釋觀點與台灣選舉之應用：以 2002 年高雄市長與市
議員選舉為例〉，《台灣政治學刊》，8（1）：47-98。
- 費孝通，1993，《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台北：風雲時代。
- 鈕則勳，2002，《競選傳播策略：理論與實務》，台北：韋伯文化。
- 飯島清著，張福興、陳鴻基譯，1985，《選舉戰術與策略——由行銷看選舉》，
中華民國日本研究學會。
- 黃玉瑩，2008，《高雄市民選舉政黨認同傾向區域差?之研究-以 1994 年-2006 年行
政首長選舉為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黃光國，1988，〈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收錄於《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臺北：巨流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黃秀端，1994，《選區服務：立法委員競選連任的基礎》，台北：唐山出版社。
- 黃秀端，1996，〈決定勝負的關鍵：候選人特質與能力在總統選舉中的重要性〉，《選舉研究》，3（1）：103-135。
- 黃秀端，1997，〈政治文化：過去、現在與未來〉，《東吳政治學報》，8:47-85。
- 黃秀端，2002，〈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下的選民策略投票〉，《東吳政治學報》，13：37-75。
- 黃信豪，2006，〈多層模型於選民投票行為研究的應用：以 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東吳政治學報》，22：161-205。
- 黃紀，2001，〈一致與分裂投票：方法論之探討〉，《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3（5）：542。
- 黃紀，2005a，〈多層抽樣設計芻議〉，「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方法工作坊」學術研討會，3月26、27日，台北：政治大學。
- 黃紀，2005b，〈投票穩定與變遷之分析方法：定群類別資料之馬可夫鍊模型〉，《選舉研究》12（1）：1-35。
- 黃紀，2008，〈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下選民之投票抉擇：分析方法之探討〉，黃紀、游清鑫主編，《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黃綺君，2001，《台南縣選民投票穩定與變遷之分析：1997年與2001年縣長選舉的實證研究》，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德福，2003，〈新世代的投票行為已跳開意識形態〉，轉引自《新臺灣新聞週刊》，2003/1/13，第355期，網址：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12008>。

- 黃德福，1994，〈現代化、選舉競爭與地方派系：一九九二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第一卷，第一期，頁 75-89。
- 楊弘娟 2007，《高雄市選民投票抉擇因素之研究---2006 年第四屆高雄市長選舉個案》，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秀慧，2007，《地方政黨政治之形成與發展-以高雄市為例》，私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楊靜華，2002，《民進黨地方政治生態之研究：以南投縣為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溫福星、邱皓政，2009，〈多層次模型方法論：階層線性模式的關鍵議題與試解〉，《台大管理論叢》，19（2）：263-294。
- 葉高華，2011，《台灣總統的選舉脈絡》，台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論文。
- 詹青蓉，2003，《二〇〇四年宜蘭縣立法委員選舉競選策略之研究》，國立佛光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雷競璇，1989，《選舉制度》，臺北：洞察出版社。
- 趙永茂，1989，〈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一個概念架構的分析〉，《中山社會科學季刊》，4（3）：58-80。
- 趙永茂，1996，〈臺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政治科學論叢》，第 7 期：39-55。
- 趙永茂，1998a，〈地方政治生態與地方行政的關係〉，《政治科學論叢》，9：307。
- 趙永茂，1998b，〈消弭黑、白共生結構的途徑〉，收錄於《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的理論與實際：兼論臺灣地方政府的變革方向》，臺北：翰盧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 297。

- 趙永茂，2001，〈新政黨政治形勢對台灣派系政治的衝擊：彰化縣與高雄縣個案及一般變動趨勢分析〉，《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四期，頁 153-182。
- 劉從葦、陳光輝，2006，〈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固定樣本（TEDS panel）之代表性探討〉，《選舉研究》，13（2）：75-116。
- 潘俊英，2004，《台灣農民運動初探（1895-200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學位論文。
- 蔡佳泓，2007，〈政黨形象的測量尺度初探〉，《政治學報》，43：101-121。
- 蔡偉祺，2003，《政黨輪替後的競選策略：2001 年花蓮縣長選舉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慶同，1996，《當運匠聽到地下電台：論地下電台與社會運動之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鄧志松，2006，〈選舉的空間因素——以三次總統選舉為例〉，《國家發展研究》，6（1）：89-144。
- 鄧志松、吳親恩，2008，〈立委選舉地盤估計：GIS 與空間分析的應用〉，黃紀、游清鑫主編，《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頁 49-85，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2005，〈2004 年總統選舉中的候選人因素〉，《台灣民主季刊》，2（2）：31-70。
- 蕭怡靖，2006，〈「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再測信度之分析〉，《選舉研究》，13（2）：117-144。
- 蕭怡靖，2009，〈「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之政黨認同測量的探討〉，《選舉研究》，16（1）：67-93。
- 傅恆德，1996，〈決定投票選擇的結構、心理和理性因素：民國八十五年總統選舉研究〉，《選舉研究》，3（2）：157-185。

- 蕭怡靖、黃紀，2010a，〈2008年立委選舉候選人票之分析：選民個體與選區總體的多層模型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4（1）：3-53。
- 蕭怡靖、黃紀，2010b，〈單一選區兩票制下的一致與分裂投票—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的探討〉，《台灣民主季刊》，7（3）：1-43。
- 蕭惠娟，2009，〈台灣2008年立法委員與總統選舉的空間分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賴映潔，2011，〈台灣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變對補助款分配之影響〉，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進貴、葉高華、張智昌，2007，〈投票行為之空間觀點與空間分析：以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為例〉，《選舉研究》14（1）：33-60。
- 鮑彤，1999，〈選舉地盤：候選人票源凝聚程度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謝復生，1992，〈政黨比例代表制〉，臺北：理論與政策雜誌社。
- 謝復生、牛銘實、林慧萍，1995，〈民國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中之議題投票：理性抉擇理論之分析〉，《選舉研究》，2（1）：77-92。
- 顏詩耕，2011，〈綠營傳統票倉？臺灣南部選舉政治分析〉，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羅清俊、廖建良，2009，〈選制改變前選區規模對立委分配政策提案行為的影響〉，《台灣政治學刊》，13（1）：3-53。
- 羅清俊、謝瑩時，2008，〈選區規模與立法委員分配政策提案關聯性的研究：第三、四屆立法院的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46：1-48。

貳、英文書目

- Abramowitz, Alan I. 1980.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Culture under Stress."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177-211.
- Abramson, Paul R., and Charles W. Ostrom. 1991. "Macropartisanship: An Empirical Reassess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85, 1: 181-192.
- Achen, Christopher H. 1992. "Social Psychology,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Linear Regression: Breaking the Iron Triangel in Voting Research." *Political Behavior* 14, 3: 195-211.
- Alford, John H. and David W. Brady. 1993. "Personal and Partisan Advantage in U.S.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1846-1990." in Lawrence C. Dodd and Bruce I. Oppenheimer, ed., *Congress Reconsider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 Alvarez, R. Michael and Jonathan Nagler. 1998. "When Politics and Models Collide: Estimating Models of Multiparty El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55-96.
- Alvarez, R. Michael and Jonathan Nagler. 2000. "A New Approach for Modelling Strategic Voting in Multiparty Ele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57-75.
- Ames, Barry. 1994. "The Reverse Coattails Effect: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 in the 1989 Brazil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1): 95-111.
- Arnold. 1990. *The logic of Congressional a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rtels, Larry M. 1988. *Presidential Primaries and the Dynamics of Public Choi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stedo, R. W., and M. Lodge. 1980. "The Meaning of Party Labels." *Political Behavior* 2(3): 287-308.
- Batto, Nathan. 2001. "Geographical Voting Base and the Stability of Candidates' Voter Coalitions (1989~1998)." , 《選舉研究》 , 8 (1) : 211-255 。
- Beck, Paul Allen, Ruessell J. Dalton, Steven Freene, and Robert Huckfeldt. 2002. "The Social Calculus of Voting: Interpersonal, Media, and Organization Influences on Presidenti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1):57-73.
- Beck, Paul Allen, Lawrence Baum, Aage R. Clausen, and Charles E. Smith. 1992. "Patterns and Sources of Ticket Splitting in Subpresidential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4: 916-928.
- Berelson, Bernard R., Lazarsfeld, Paul F., and William N. McPhee. 1954.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wes, J. E. and Strentz, H. 1978. "Candidate image: Stereotyping and the 1976 debates." in B. Rube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391-406.
- Brian J. Gaines. 1998. "The Impersonal Vote?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British Elections, 1950-92."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3, 2 (May): 167-195.
- Burden, Barry C., and David C. Kimball. 1998.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icket Split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3: 533-544.
- Burnham, Walter Dean. 1975. "Insulation and Responsiveness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0, 3 (Fall): 411-435.

- Cain, Bruce, John Ferejohn, and Morris Fiorina. 1987. *The Personal Vote: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Electoral Independ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A. 1966. "Interpreting the Presidential Victory", in M. C. Cunnings Jr., ed., *The National Election of 1964*.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 Chilcote, Ronald H. 1994.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Reconsidered*. Westview Press.
- Converse, Phillip.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David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Converse, Philip. 1966. "The Concept of a Normal Vote." In A. Campbell, P. E. Converse, W. E. Miller and D. E. Stokes, eds.,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Cox, Gary W. 1990.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Incentives in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4): 903-935.
- Cox, Gary W.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x, Gary W. and Jonathan N. Katz. 1996. "Why did the Incumbent Advantage in U.S. House Elections Grow?"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487-497.
- Cox, Gary, Frances Rosenbluth and Michael Thies. 1999.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Fate of Factions: The Cost of Japan's LDP."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33-56.

- Crewe, Ivor. 1976. "Party Identification Theor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in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e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Representations of Voting and Party Competition*. Hoboken, NJ: John Wiley and Sons.
- Dalton, Russell J. 1984. "Cognitive Mobilization and Partisan Dealignmen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46(1):264-284.
- Dalton, R., Flanagan, S. and Beck, P. 1984. *Elector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ussell J. 1996. *Citizen Politics: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2nd 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 Davison, W. P. 1983.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0: 1-15.
- Deci, E. L., and Ryan, R. M. 1985.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Plenum Press.
- Deci, E.L. 1975. *Intrinsic motivation*. New York: Plenum Publishing Co.
- Donald E. Stokes. 1962. "Party Loyalty and the Likelihood of Deviating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4: 689-702.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Duverger, Maurice. 196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3rd ed., London: Methuen.
-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1974.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2): 43-51.

-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1977. "Turbulences in the Climate of Opinion: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1: 143-158.
- Enelow, James M., and Melvin J. Hinich. 1984. *The Spatial Theory of Vo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pstein, Leon D. 1964. "Eletoral Decision and Polocy Mandate: An Empirical Exampl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8: 564-572.
- Estrada, Luis. 2004. "Negative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Mexico.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ulau, Heinz and Paul D. Karps. 1978. "The Puzzle of Representation: Specifying Components of Responsiveness." in Heinz Eulau and John C. Wahlke, eds.,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Continuiti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 55-72.
- Fenno, Richard. 1978. *Home Sty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s*.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 Finifter, Ada W. 1974. "The Friendship Group as a Protective Environment for Political Devia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2): 607-625.
- Fiorina, Morris. 1978. *Congress: Keystone of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iorina, Morris.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irth, Raymond. 1975. "Introduction to Factions in Indian and Overseas Indian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 2191-2215.

- Garand, James C., and Marci Glascock Lichtl. 2000. "Explaining Divided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esting An Intentional Model of Split-Ticket Vot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1: 173-91.
- Gary King. 1991.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Incumbency Advantag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119-128.
- Gary W. Cox and Jonathan N. Katz. 1996. "Why Did the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U.S. House Elections Grow?"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2 (May): 478-497.
- Gelman, Andrew, and Gary King. 1993. "Why ar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ls So Variable When Votes Are So Predictab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409-51.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and Pierson, Christopher. 1998.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ber, Doris A. 1988.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3rd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 Hahn, D. F. & Gonchar, R. M. 1972. "Political myth: The image and the issue." *Today's Speech* 20: 57-69.
- Hedeker, Donald. 2008. "Multilevel Models for Ordinal and Nominal Variables." in *Handbook of Multilevel Analysis*, eds., Jan de Leeuw and Erik Meijer. New York, NY: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 Hellweg, Susan A., Dionisopoulos, George N., and Kugler, Drew E. (1989). "Political candidate image: A state-of-the-art review."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9: 43-78.

- Hox, Joop. 1998. "Multilevel Modeling: When and Why." in *Classification, Data Analysis, and Data Highways*, eds., Ingo Balderjahn, Rudolf Mathar and Martin Schader. New York, NY: Springer.
- Hox, J. J. 2002. *Multilevel analysi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Mahwah, NJ: Erlbaum.
- Hsieh, John Fun-sheng, and Emerson M. S. Niou. 1996. "Issue Vot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s 1992 Legislative Elec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 13-27.
- Huckfeldt, R., Plutzer, E., and Sprague, J. 1993. "Alternative Contexts of Political Behavior: Churches, Neighborhoods, and Individuals." *Journal of Politics* 55(2):365-381.
- Huckfeldt, Robert, and John Sprague. 1987. "Network in Context: The Social Flow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4): 1197-1216.
-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keles, A. 1974. "Participant Citizenship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L. Bowman and G. R. Boynton, eds., *Political Behaviour and Public Opinion*. Comparative Analyses, New York: Englewood Cliffs.
- Jacobson, Gary C. 1983. *The Politics of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Jacobson, Gary C. 1991. "Explaining Divided Government: Why can't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4(4): 640-643.
- John R. Hibbing. 1984. "The Liberal Hour: Electoral Pressures and Transfer Payment Vo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6: 846-865.

- Johnston, Ron J., and Charles J. Pattie. 2005. "Putting Voters in Their Places: Local Context and Vot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in Alan S. Zuckerman (ed.),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ersonal Networks as Contexts for Political Behavio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84-208.
- Jones, K., Ron J. Johnston, and Charles J. Pattie. 1992. "People, Places and Regions: Exploring the Use of Multi-Level Modelling in the Analysis of Electoral Dat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3): 343-80.
- Karp, Jeffrey A., Jack Vowles, Susan A. Banducci, and Todd Donovan. 2002. "Strategic Voting, Party Activity, and Candidate Effects: Testing Explanations for Split Voting in New Zealand's New Mixed System." *Electoral Studies* 21(1): 1-22.
- Kelly, Stanley, Jr. and Thad W. Mirer, 1974. "The Simple Act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572-591.
- Kessel, John H. 2004. "Views of the Voters." in Herbert F. Weisberg and Clyde Wilcox, ed., *Models of Voting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y, V. O. 1955.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17, February:3-18.
- Kinder, Donald R., and David O. Sears. 1985.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3r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714-716.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nd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g, Gary. 1997. *A S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Inference Probl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sh, L. 1995. *Surveying sampling*. New York: Wiley.
- Kitschelt, H and Wilkinson, S. 2006. "Citizen-politician Linkagws: A Introduction."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Kitschelt, H and Wilkin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9.
- Kohno, Masaru. 1997. "Voter Turnout and Strategic Ticket-Splitting Under Japan's New Electoral Rules." *Asian Survey* 37, 5: 429-440.
- Karmer, Gerald H. 1971.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U.S. Voting Behavior, 1896-196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1): 131-43.
- Kreft, I. G. G. 1996. *Are multilevel techniques necessary? An overview, including simulation studies*. Manuscrip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s Angeles.
- Lancaster, T. D. 1986 . "Electoral Structures and Pork Barre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 1:67-81.
-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48.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rilli, L., and Rampichini C. 2007. "A multilevel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graduates' skills."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Springer: 16: 381-393.
- Lewis-Beck, M., and Paldam, Martin. 2000. "Economic voting: an Introduction." *Electoral Studies* 19:113-121.
- Lewis-Beck, Michael S., and Richard Nadeau. 2004. "Split-Ticket Voting: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Madisonianism." *Journal of Politics* 66, 1: 97-112.
- Lewis-Beck, M., Norpoth, H., and Jacoby, W. 2008. *The American Voter Revisite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in, Tse-min, James M. Enelow, and Han Dorussen 1999. "Equilibrium in Multicandidate Probabilistic Spatial Voting." *Public Choice* 98: 59-82.
- Lipset, S. M., Lazarsfeld, P. F., Barton, A. H., and Linz, J. J. 1954. "The psychology of voting: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behavior." in G. 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 1124-1175.
- Lipset, Seymour M.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Lodge, Milton. 1995. "Toward a Procedural Model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In Milton Lodge and Kathleen, eds., *Political Judgment: Structure and Process McGraw*.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uke, Douglas A. 2004. *Multilevel Model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arkus, G. B., and P. E. Converse. 1979. "A Dynamic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of Elector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 1055-1070.
- Meyer, Allen. 1962. "The Independent Voter." In William McPhee and William Glaser, eds., *Public Opinion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 Mayhew, David. 1974a.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18-26.
- Mayhew, David. 1974b.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The Case of Vanishing Marginals." *Polity* 6 (Spring): 296-317.
- McGrath, J. E. and McGrath, M. F. 1962. "Effects of partisanship on perceptions of political figur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6: 236-248.
- McKean, M., and Scheiner, E. 2000. "Japan's new electoral system: La plus ca change...." *Electoral Studies* 19: 447-477.
- Milbrath, L., and Goel, M. 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 Miller, W. E. and Levitin, T. E. 1976. *Leadership and Chang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rom 1952 to 197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inthrop Publishers, Inc.
- Miller, Arthur H. 1990. "Public judgments of Senate and House Candidate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5(November): 525-542.
- Miller, A. H., Wattenberg, M. P., and Malanchuk, O. 1986. "Schematic assessments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2): 521-540.
- Miller, Warren E., and J. Merrill Shanks. 1996. "Evaluations of the Candidates' Personal Qualities." in Warren E. Miller and J. Merrill Shanks, eds., *The New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14-437.
- Miller, W. E., and Shanks, M. J. 1996. *The new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ok, M. 1995. "Sample size requirements for a 2-level design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Multilevel Modelling Newsletter* 7(2): 11-15.
- Moser, Robert G. and Ethan Scheiner. 2004. "Mixed Electoral Systems and Electoral System Effect: Controlled Comparison and Cross-National Analysis." *Electoral Studies* 23: 575-599.
- Mutz, D. C. 1989. "The influence of perceptions of media influence: Third-person effects and the public expression of opin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 3-23.
- Mutz, Diana. 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Cross-Cutting Network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4): 838-855.
- Niemi, Richard G., Harold W. Stanley and Ronald J. Vogel. 1995. "State Economies and State Taxes: Do Voters Hold Governors Account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936-957.

- Nimmo, Dan, and Robert L. Savage. 1976. *Candidate and Their Images: Concepts, Methods, and Finding*. 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Norris, Pippa. 1997. "Choosing Electoral Systems: Proportional, Majoritarian and Mixed System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3): 297-312.
- Ordeshook, P. 1986. *Game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Page, Benjamin I. 1978. *Choices and Echoe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ge, Benjamin I., and Richard A. Brody. 1972. "Policy Voting and The Electoral Process: The Vietnam War Issu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3): 979-995.
- Popkin, Samuel L. 1991. *The Reasoning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e, Douglas W. 197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amseyer, J. Mark and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1993. *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udenbush, Stephen W., and Anthony S. Bryk.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eed, Steven R. 1999. "Strategic Voting in the 1996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2): 257-270.
- Remmer, Karen and G lineau, Francois. 2003 "Subnational electoral choice: economic and refer ndum voting in Argentina (1983-1999)"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7): 801-821.
- Richardson, B. M.. 1991. "European Party Loyalties Revisite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3): 751-775.

- Robert Moser and Ethan Scheiner. 2005. "Strategic Ticket Splitting and the Personal Vote in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30: 259-276.
- Rose, Richard, Mishler, William. 1998. "Negative and Positive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Electoral Studies* 17(2): 217-234.
- Ross, L. D. 1977.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Distortion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anders, A. 1988. "The Meaning of Party Image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1(3): 583-599.
- Searing, Donald. 1994. *Westminster's world.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o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ank, M. 2001. "What about Issues." in Katz, E. and Warshel, Y., eds., *Elections Studies: What's Their Use?* Westview Press.
- Shyu, Huoyan. 1996. "Reasoning and Choice in Taiwan's Gubernatorial Ele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Hong Kong, February 8-9.
- Sniderman, Paul M., Richard A. Brody, and Philip E. Tetlock. 1991. *Reasoning and Cho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afford, D. 1972. "Electoral Systems and voter's behaviour." *Comparative Politics* 5: 129-134.
- Steenbergen, Marco R., and Bradford S. Jones. 2002. "Modeling Multilevel Data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1): 218-37.
- Steenbergen, Marco R., and Bradford S. Jones. 2002. "Modeling Multilevel Data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1): 218-37.

- Stipak, Brian, and Carl Hensler. 1982. "Statistical Inference in Contextu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1): 151-75.
- Stone, W. F., and Schaffner, P. E. 1988.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Talcott, Parsons. 194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ang, Ding-ming. 2001. "The Impacts of Policy Issues on Voting Behavior in Taiwan: A Mixed Logit Approach."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8(2): 95-123.
- Western, Bruce. 1998. "Causal Heterogeneit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 Bayesian Hierarchical Modeling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1233-1259.
- Westlye, Mark C. 1991. *Senate Elections and Campaign Intens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u, Chung-li. 2008. "A Simple Model for Predicting the Outcome of the 2008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in Taiwan." *Issues and Studies* 44(4): 1-28.
- Yu, Ching-hsin. 2004. "Direction and Strength of Voter's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after 2000."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39-70.

附錄

附錄 一 依變項原始問項次數分配表

投給	Frequency	Valid Percent

此候選人主因			
開放式 問項	1 做的不錯	86	7.2
	2 增進地方繁榮	32	2.7
	3 不想選其他人	32	2.7
	4 家人都支持	19	1.6
	5 照顧百姓	24	2.0
	6 支持所屬政黨	149	12.5
	7 爲了排除其他黨	25	2.1
	8 在地人	32	2.7
	9 欣賞此人	48	4.0
	10 本土化	7	.6
	11 不會賄選	3	.3
	12 候選人老實	11	.9
	13 兩黨制衡	8	.7
	14 走路工	1	.1
	15 沒有原因	30	2.5
	16 候選人積極正直	11	.9
	17 形象佳、清新	47	3.9
	18 清廉	7	.6
	19 宗教因素	3	.3
	20 政黨輪替	9	.8
	21 選民服務	63	5.3
	22 候選人能力佳	28	2.3

23 換人做做看	19	1.6
24 候選人來拉票	5	.4
25 學經歷夠	21	1.8
26 認識候選人、有交情	30	2.5
28 政見滿意	26	2.2
29 只認識他	4	.3
30 因為所屬團體支持	3	.3
31 文宣、宣傳	5	.4
32 專於法案研究	2	.2
33 希望未來比較好	10	.8
35 親和力、親民	7	.6
36 沒有政黨包袱	3	.3
37 做了很久	3	.3
38 他人推薦	10	.8
39 政治穩定、安定	1	.1
40 再給民進黨一次機會	1	.1
41 給現任繼續做	2	.2
42 爲了入聯	1	.1
43 對本身職業有利	1	.1
44 有知名度、辨識度較高	2	.2
46 政治理念不錯	4	.3
48 怕一黨獨大	1	.1
49 必須要投票	1	.1

50 讓國民黨更多席次	1	.1
52 台灣人	2	.2
53 有人脈	1	.1
54 參加地方活動	1	.1
55 看法、理念一致	3	.3
56 候選人的家人做的不錯	1	.1
57 讓民進黨更多席次	1	.1
58 愛台灣	2	.2
59 讓馬英九當選	3	.3
61 反映百姓心聲	3	.3
62 A 錢 A 的比較少	1	.1
63 風評不錯	1	.1
65 相信他	1	.1
66 認為他會當選	1	.1
67 印象好	2	.2
90 訪員漏問	3	.3
95 拒 答	41	3.4
98 不 知 道	31	2.6
99 跳題	259	21.7
Total	1195	100.0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Ⅲ）：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

附錄 二 依變項選民投票取向分類與原始問項回答對照表

投票取向分類	問項原始回答
政黨因素	支持所屬政黨（149）、爲了排除其他黨（25）、政黨輪替（9）、兩黨制衡（8）、怕一黨獨大（1）、再給民進黨一次機會（1）、爲了入聯（1）、讓國民黨更多席次（1）、讓民進黨更多席次（1）、愛台灣（2）、讓馬英九當選（3）。
候選人形象	不想選其他人（32）、本土化（7）、候選人老實（11）、形象佳、清新（47）、候選人能力佳（28）、政見滿意（26）、專於法案研究（2）、有知名度、辨識度較高（2）、台灣人（2）、候選人的家人做的不錯（1）、風評不錯（1）、印象好（2）、欣賞此人（48）、不會賄選（3）、候選人積極正直（11）、清廉（7）、學經歷夠（21）、親和力、親民（7）、政治理念不錯（4）、看法、理念一致（3）、A 錢 A 的比較少（1）、相信他（1）、沒有政黨包袱（3）、認爲他會當選（1）。
選區服務	做的不錯（86）、增進地方繁榮（32）、照顧百姓（24）、做了很久（3）、反映百姓心聲（3）、選民服務（63）、給現任繼續做（2）、換人做做看（19）、參加地方

	活動 (1)。
人際網絡	家人都支持 (19)、在地人 (32)、走路工 (1)、候選人來拉票 (5)、認識候選人、有交情 (30)、只認識他 (4)、因為所屬團體支持 (3)、他人推薦 (10)、有人脈 (1)。
遺漏值	沒有原因 (30)、宗教因素 (3)、希望未來比較好 (10)、政治穩定、安定 (1)、對本身職業有利 (1)、必須要投票 (1)、文宣、宣傳 (5)。

說明：括號內數值係為回答該原因的人數。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II)：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

附錄 三 樣本選區分布與其實際獲勝政黨

		Frequency	Valid Percent	實際獲勝政黨
Valid	*1 台北市第一選區	26	1.9	國民黨
	2 台北市第二選區	12	.9	
	*3 台北市第三選區	27	2.0	國民黨
	*4 台北市第四選區	20	1.4	國民黨
	5 台北市第五選區	14	1.0	
	6 台北市第六選區	13	.9	
	*7 台北市第七選區	32	2.3	國民黨

8 台北市第八選區	15	1.1	
*9 高雄市第一選區	20	1.4	國民黨
10 高雄市第二選區	14	1.0	
11 高雄市第三選區	11	.8	
12 高雄市第四選區	19	1.4	
*13 高雄市第五選區	20	1.4	民進黨
*14 台北縣第一選區	62	4.5	國民黨
*16 台北縣第三選區	20	1.4	民進黨
*17 台北縣第四選區	21	1.5	國民黨
*19 台北縣第六選區	20	1.4	國民黨
20 台北縣第七選區	15	1.1	
21 台北縣第八選區	17	1.2	
*22 台北縣第九選區	23	1.7	國民黨
24 台北縣第十一選區	19	1.4	
*26 宜蘭縣	54	3.9	國民黨
*28 桃園縣第二選區	22	1.6	國民黨
*29 桃園縣第三選區	25	1.8	國民黨
*30 桃園縣第四選區	32	2.3	國民黨
32 桃園縣第六選區	9	.7	
*33 新竹縣	58	4.2	國民黨
*34 苗栗縣第一選區	36	2.6	國民黨
35 苗栗縣第二選區	1	.1	
*38 台中縣第三選區	36	2.6	國民黨

*39 台中縣第四選區	61	4.4	國民黨
*41 彰化縣第一選區	47	3.4	國民黨
43 彰化縣第三選區	1	.1	
*44 彰化縣第四選區	62	4.5	國民黨
*48 雲林縣第二選區	44	3.2	國民黨
*49 嘉義縣第一選區	88	6.4	國民黨
*53 台南縣第三選區	35	2.5	民進黨
*55 高雄縣第二選區	62	4.5	國民黨
56 高雄縣第三選區	18	1.3	
*57 高雄縣第四選區	28	2.0	國民黨
*60 屏東縣第三選區	21	1.5	民進黨
*62 花蓮縣	24	1.7	國民黨
*64 基隆市	28	2.0	國民黨
*68 台中市第三選區	37	2.7	國民黨
*69 嘉義市	32	2.3	國民黨
*70 台南市第一選區	36	2.6	民進黨
*71 台南市第二選區	36	2.6	民進黨
74 平地原住民	7	.5	
Total	1380	100.0	

說明：反黃者表示該選區抽取樣本數因小於 20 筆而被剔除，不納入本文多層次分析的選區；而打星號者則為樣本數至少 20 筆以上而被保留，納入本文多層次分析的選區。

資料來源：1. 樣本選區分布的次數與百分比：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之「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Ⅲ）：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2. 實際獲勝政黨：中央選舉委員會（2012）。

附錄 四 問卷題目原始問項

一、 出生年次

X01. 「請問您民國幾年出生？」

二、 教育程度

X06.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什麼（您讀到什麼學校）？」

1=「不識字」

2=「識字但未入學」

3=「小學肄業」

4=「小學畢業」

5=「國、初中肄業」

6=「國、初中畢業」

7=「高中、職肄業」

8=「高中、職畢業」

9=「專科肄業」

10=「專科畢業」

11=「大學肄業」

12=「大學畢業」



13=「研究所」

三、 收入

X14. 「請問您家庭每個月總收入大約是：（包括薪資以外的其他收入，如房租、股利等等）」

1=大約在 36000 元以下

2=36001 元到 47000 元以下

3=47001 元到 58000 元以下

4=58001 元到 65000 元以下

5=65001 元到 78000 元以下

6=78001 元到 88000 元以下

7=88001 元到 108000 元以下

8=108001 元到 138000 元以下

9=138001 元到 158000 元以下

10=158001 元以上



四、 有無政黨認同

S06A. 「我們社會上經常有人用「泛藍」與「泛綠」來區分選民的政治傾向，請問您覺得自己是屬於泛藍還是泛綠？」

1=泛藍

2=泛綠

3=不屬於任何一邊

4=不認同此種分法

5=紅衫軍

S06B. 「如果您不覺得自己屬於哪一邊，請問您覺得自己比較偏向泛藍還是泛綠？」

1=泛藍

2=泛綠

3=都不偏向



五、 族群認同

N01. 「在我們（台語：咱）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1=台灣人

2=都是

3=中國人

4=中華民國

5=黃種人

六、 統獨立場

P01. 「關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這張卡片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1、儘快統一；2：儘快獨立；3、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6、永遠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七、 對選舉活動的參與度

B05_1 到 B05_9. 「另外，請問您在這次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有沒有從事（台：做）下列活動？」

1 = 閱讀選舉公報

2 = 閱讀候選人的傳單、快報或報刊廣告

3 = 觀看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或政見發表會

4 = 擔任候選人或政黨的助選工作人員或義工

5 = 參加為候選人而舉辦的集會或餐會等活動

6 = 參加候選人的後援會

7 = 提醒親友觀看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或政見發表

8 = 與他人談論候選人的優缺點

9 = 捐款（包括購買餐券、紀念品）



八、 政治知識

K01. 「請問現在的副總統是誰？」

K02. 「請問現在的美國總統是誰？」

K03. 「請問現在的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是誰？」

K04. 「請問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

K05. 「請問這一屆選出的立法委員一任幾年？」

1=答對

2=答錯

3=知道，但忘記了



九、 政治關心

B02. 「請問您對於這次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是非常關心、有點關心、不太關心，還是非常不關心？」

1 = 非常關心

2 = 有點關心

3 = 不太關心

4 = 非常不關心

十、 對報紙上選舉新聞的關注

A01. 「這次立法委員選舉期間，請問您在看報紙時，對選舉新聞是非常注意、有點注意、不太注意，還是一點都不注意？」

1 = 非常注意

2 = 有點注意

3 = 不太注意

4 = 一點都不注意

十一、 對電視上選舉新聞的關注

A03. 「這次立法委員選舉期間，請問您在看電視時，對選舉新聞是非常注意、有點注意、不太注意，還是一點都不注意？」

1 = 非常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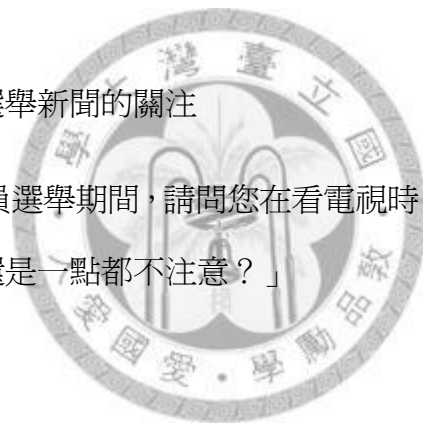
2 = 有點注意

3 = 不太注意

4 = 一點都不注意

十二、 政治討論

B01. 「請問您平時會不會與人討論有關政治或選舉方面的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



1 = 時常討論

2 = 有時討論

3 = 很少討論

4 = 從來不討論

